

#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 16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六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北京·一九八五年



封面题字：舒 同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六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5.5 千字

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198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85,000 册

书号 11310·23 定价 1.25 元

**内部发行**

# 目 录

## 文 献

晋西北之今昔.....贺 龙 ( 1 )

## 陈云同志对两个问题的答复

陈云同志谈泸定桥会议,

.....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 11 )

对遵义会议纪念馆请示恢复陈云同志

当年居室旧址的答复.....陈 云 ( 12 )

## 回 忆 录

真假和谈的斗争

——记北平和谈.....李维汉 ( 13 )

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

..... 乌兰夫 ( 35 )

从苏北到东北.....黄克诚 ( 56 )

——新四军第三师进军东北参加东北解放战争的回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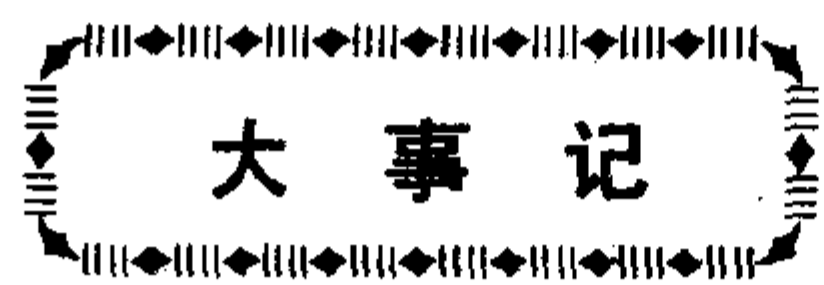
李聚奎回忆录 (摘登) ..... ( 82 )

平江起义 ..... ( 82 )

留守井冈山 ..... ( 103 )



返回湘鄂赣 .....	(117)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辽东根据地 .....	江 华 (131)
在坚持黔东斗争的岁月里.....	段苏权 (155)
我所了解的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前后国共 合作的有关情况.....	钱之光 (174)
解放战争时期云南武装斗争概略.....	郑伯克 (196)


  
**大事记**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大事记.....	黄修荣 (216)
-------------------	-----------

# 晋西北之今昔

贺 龙

## 一 一二〇师与晋西北有血肉相关的联系

一二〇师自从改编以后北上抗日开到山西最前线的那一天起，首先就在晋西北与穷凶极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作无情的斗争。为了保卫中国，保卫华北，保卫晋西北而英勇地流血牺牲。一二〇师的部队在晋西北，粉碎了敌人三次对晋西北的大举进攻；开展了汾河平原及雁北的游击战争，支持了晋西北的抗战。从开始到现在，一二〇师的部队不怕严寒，不怕酷暑，不怕一切艰难困苦，以血肉创造了与保卫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因此，一二〇师和晋西北有着血肉相关的联系，对晋西北当前与今后的发展也感觉格外的关切。

记得当一二〇师开始进入晋西北地区的时候，山西前线已经发生了严重危机。由于李服膺不战而逃，致使大同失陷，跟着雁北也沦入敌手。不久，敌人又跨进长城，突破了雁门一线的国防工事，并继续南下，连占代县、崞县<sup>①</sup>、

<sup>①</sup> 崞县在山西省，一九五八年改为原平县。



宁武，伸至原平、忻口一带。由于敌人的长驱直入，政权被敌人摧毁了，地方官吏逃亡了，汉奸政权——维持会产生了，而溃兵又到处骚扰，居民惶惶不安，这种情况在晋西北前线和接近前线的后方，造成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当时摆在一二〇师面前的紧急任务，就是挽救战局，克服危机。

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没有呢？今天检查起来，我们是完成了这个任务。

首先，我们派遣了宋支队深入雁北<sup>①</sup>，收复了平鲁、右玉，摧毁了伪政权，开展了雁北地区的游击战争。主力则参加忻口战役，配合友军，打击敌人。我们在敌人的侧背与敌后，经过大小战斗数十次，收复了宁武、神池、平鲁、右玉等县城，不仅使敌人遭受很大的损失，并且兴奋了友军和群众。我们收复了失地，摧毁了汉奸政权，恢复了我们的政权，适当的安置与收容了散兵游勇，并将其组织起来归送友军编制，建立了地方的秩序，使民心得以安定，然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开展晋西北的游击战争，在保卫晋西北的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敌人第二次对晋西北大举进攻的战役中，开始又是敌人长驱直入，连陷五寨、宁武、神池、偏关、河曲、保德等县城，继续向岢岚前进，后来又占领了岢岚。敌人的铁蹄正毫无顾忌地践踏着晋西北的土地和人民，企图以强

---

①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一二〇师开赴晋北抗日前线，以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团长宋时轮率领该团第二营及团直侦察连等部组成宋支队，进入雁北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大的兵力来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当时我们一二〇师的部队正在太原以北切断同蒲路，配合我军阻敌南下风陵渡及协助友军进攻太原，此任务将完成，适值敌开始向晋西北大举进攻，乃不避艰险，不畏饥寒，兼程赶往岢岚，迎击进攻的敌人。在我们全体指战员为国牺牲的高度的决心下，英勇地与敌人搏斗，一周之内，连克七城。连续进行了四十一日的流血的胜利战斗，最后又将敌人赶出了杨方口，使这块土地上重新飘扬起来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保卫晋西北的战役中，这次光荣的成绩同样是不可磨灭的。

去年年底，我们一二〇师主力一部开往冀中，仍留一部分部队（三五八旅）在晋西北，继续坚持晋西北的抗战。他们与这次进攻晋西北的敌人艰苦鏖战，把失去的土地反复地从敌人的手里夺回来。一直到现在，仍然在晋西北广大群众的拥护与帮助之下，和敌人周旋着。他们这种坚决奋斗的精神，英勇壮烈的行动，充分的表现了他们对于国家民族无限的忠心。

我们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完全是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一切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出发，和友党、友军、政权和群众进行友好的团结。不管少数投降分子顽固分子怎样来限制我们，破坏我们，和我们找磨擦，不管这些人的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活动是怎样不断的花样翻新的进行着，我们始终抱定了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原则，以诚恳、坦白、亲密的态度，与友党、友军、政权和群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我们在晋西北和友军同生死，共患难。如象我们在乃合堡配合三十五军作战，在偏关掩护友军的战斗，在战场上所流的血交融成一片。我们尽力的帮助了友军、政权和群众团体，同时也得到了友军、政权和群众团体的帮助，特别是晋西北广大群众热烈的拥护。

我们在晋西北所作的，所建设的，是真正的三民主义。我们和友党、友军精诚团结，打击日本鬼子，建立和保卫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我们协同政权实施民主，建立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改选贪污腐化的村长、区长以及工作人员；我们协同群众团体改善民生，实行合理负担，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进行秋收春耕等。这些事情，不仅与真正的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没有丝毫违背，而且正是真正实行三民主义政纲与抗战建国纲领。就在这一基础上，当时晋西北是向着进步的、光明的、胜利的前途迈进的。

## 二 晋西北进步中的逆流

可是，这些进步，在它的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竟遇到逆流的阻碍。

逆流的阻碍表现在那里？表现在反共、反八路军的投降妥协的阴谋在晋西北活动着。这种反共、反八路军的妥协投降的运动，比过去更加紧的向着一切进步的力量进攻，特别向着抗日最坚决的共产党和八路军进攻。他们利用每一机会向八路军找磨擦，他们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他们制造各种挑拨离间造谣诬蔑的勾当，来破坏八路军与政权

和群众的关系，破坏八路军与友军的团结；他们甚至不许群众供给粮食与我们一二〇师在晋西北的部队——三五八旅，而使这些抗日的部队饿肚子，他们企图用这种卑鄙龌龊的手段来压迫我们这些部队退出晋西北去。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的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屡挫敌锋，取得了很多胜利，严重打击与消耗了敌人，更加坚强的支持了晋西北的抗战；因为我们一二〇师是保卫晋西北的主力，它坚持团结，与晋西北的军队、政权和广大群众坚决为保卫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而斗争，它与晋西北的土地和人民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还因为我们一二〇师是一支坚强抗战到底，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勾当的进步的力量，所以准备向日本鬼子投降的分子，就要排斥这一个力量，压迫这一个力量，破坏这一个力量，使这一个力量不能在晋西北坚持抗战，不能再和晋西北的友党、友军、政权、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去打击敌人，保卫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不能再在晋西北反对他们投降妥协的阴谋活动。只有破坏了这座保卫晋西北的长城，才能使他们的阴谋实现，才能达到他们向敌人投降妥协的目的。

目前反共反八路军的阴谋在晋西北的活动，就是山西“汪精卫”向日本鬼子投降妥协的准备工作。他们准备把晋西北的土地奉给日本帝国主义去蹂躏践踏！他们准备把晋西北的人民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去压迫、剥削，去作奴隶！

而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知道，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不仅最为横暴野蛮，同时还极狡猾阴险。由



于我国坚持长期抗战，两年多来，使日本帝国主义遭受严重的损失，它的“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也不得不因此破产。但日本并不因此而改变它灭亡中国的目的（而且也不会改变的）。敌人实现灭亡中国的目的之手段，是软硬兼施的。自武汉失守后，敌人除了军事上的进攻以外，更加紧其政治上诱降的阴谋。敌人首先要在中国进行分裂活动，特别是要分裂国共两党的合作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活动与汉奸的策动投降，在晋西北的表现是什么呢？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在山西的一贯宣传“只打八路军，不打晋绥军”，“只打中央军，不打晋绥军”。日寇这一个政治阴谋，就是企图破坏晋绥军与八路军的团结，破坏晋西北各个抗日部队之间的团结，使这些抗日部队发生分裂，不能再同心协力地抗战，以便于日寇各个击破。

第二，日寇的走卒苏体仁（即太原伪省长）、南桂馨等汉奸，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指使之下，利用其历史的社会的关系，策动投降活动。

第三，日寇汉奸的策动投降正与山西内部准备投降的分子在配合着活动。这些准备投降的分子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面活动，企图先造成一种反共反八路军的潮流作为其投降的准备，以便在公开投降敌人的时候有所借口。这些分子正和毛泽东同志所揭穿的那些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唱双簧和装红白脸与汉奸汪精卫作里应外合的“张精卫、李精卫”相同，他们是“山西的汪精卫”。这些“山西的汪精

卫”，反共反八路军的投降妥协的活动，是与日寇的诱降，汉奸的策动投降的阴谋，互相配合进行的。

所有晋西北这一切反共、反八路军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反动分子的活动，其目的：

第一个是分裂我们内部的团结。分裂国共两党的合作，拆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共产党、八路军与山西与晋西北的友党、友军、政权和群众的团结，最后使晋西北的抗战失败，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变成敌人继续向我大西北进攻的根据地。

第二个是向后倒退。使一二〇师协同友党、友军、政权和群众在晋西北建设三民主义所得的一些成绩毁消，使一切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战实现民主与改善民生的设施废除，使晋西北的人民再沦入落后的黑暗的地位，以破坏全民抗战的力量。

第三个是准备投降。准备把晋西北人民的田园、家屋变成敌寇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场所；把筱面、山药蛋从我们的人民手里夺回来，去喂敌人的马；把晋西北的土地断送给日本帝国主义，使它变成敌人“以战养战”的资源地。

总之，这一个逆流，不是一个平常的逆流，而是有它新的意义与内容的。它是在阻碍晋西北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阻碍着晋西北向光明的胜利的前途进步，也就是在破坏着整个的抗战，拉着全中华民族向后分裂倒退与准备投降。这对于中华民族绝对有害，这只有对于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有利。不仅我们要反对，全晋西北的人民要反对，全山西全中国的爱国同胞要反对。

### 三 怎样坚持晋西北的抗战

晋西北是支持华北抗战的重要的战略根据地，它是支持华北抗战主要堡垒之一，是大西北的屏障。坚持晋西北的抗战，不仅威胁着敌人在山西的主要交通线——同蒲铁路，对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起着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而且牵制着进攻大西北的一大部分敌人，成为保卫大西北的屏障。所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坚持敌后抗战，保卫大西北，特别在战略相持、准备战略反攻的今天，是具有伟大的意义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为着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正利用一切方法在晋西北破坏我们团结，阻碍我们进步，引诱投降，来摧毁这个抗日根据地的晋西北；而民族败类，汉奸汪派、托派，为了图谋私利，也正利用一切方法破坏团结，阻碍进步，策动投降，来出卖这个抗日根据地。至于晋西北的准备投降分子，则为了达到其投降敌人的目的，也正利用一切方法进行反共、反八路军的活动，破坏团结，阻碍进步，准备投降。在目前，反共反八路军、反一切进步力量，准备投降妥协的阴谋活动，是主要的危险。

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使它在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中能够担负其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

第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抗战是政府已定的国策，是全国民众一致拥护的国策，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与活动，不论其用何种面目出现，实际上都是起着汉奸作



用。这类的分子，应该无条件的受到国法的制裁和全体民众的唾弃。

第二，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我们要坚持国共两党的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把晋西北的军队、政权和广大群众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我们要以铁的团结去粉碎敌寇、汉奸、汪派、投降分子的一切挑拨离间、阴谋、破坏。只要我们能够团结，胜利就会有把握。

第三，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晋西北必须在军、政、民的同心协力之下，就原有的基础上加紧实行三民主义政纲，切实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战。使人人有组织，人人有饭吃，没有一个站在抗战之外，坚决反对那些顽固的、阻碍进步的分子，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政治上向着建设三民主义共和国胜利前途前进。

我们一二〇师在晋西北的部队，坚决为保卫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而战斗，我们要号召广大的群众认识这一投降妥协的严重危机，认识反共、反八路军、反进步力量的阴谋活动是投降的准备，我们坚决反对那些“山西的汪精卫”，反共、反八路军破坏团结，阻碍进步准备投降的阴谋活动，并且要在群众的面前予以无情的打击。“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这是共产党的基本态度，也是我们的基本态度。我们以这种态度去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加强进步力量，克服以反共、反八路军反进步来准备投降妥协的阴谋。

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晋西北投降妥协的危机，

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继续向着进步的、光明的、胜利的前途迈进，向着新中国的前途迈进。

（《解放》杂志一九三九年版第100期17页—20页）

## 陈云同志谈泸定桥会议

一九八五年二月，我委向陈云同志了解长征途中泸定桥会议的情况。陈云同志答复说，那次会是红军夺取泸定桥的当天晚上<sup>①</sup>，在过了泸定桥的一个地方（是在房子里，不是在外面）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张闻天、王稼祥和他，少奇、博古、刘帅是否参加记不清了。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就是那次会议后，他离开长征队伍，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护送下，经成都、重庆前往上海。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

<sup>①</sup>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 对遵义会议纪念馆请示恢复 陈云同志当年居室旧址的答复

(一九八二年九月三十日)

陈 云

一、我没有在遵义会议会址住过，刘伯承同志也没住过，我们开完会都回到卫戍区司令部去住。

二、不要恢复遵义卫戍区司令部旧址，那个地方现在做什么用就继续做什么用，如果改变是很错误的。否则，我要给遵义党委写信，表明我的这个意见。

三、只要在遵义会议会址的说明词上写上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我住在什么地方，现在那里做什么用，这就足够了。不必再搞什么纪念室，我历来不赞成搞这种东西。以前有人提出把我老家的房子搞成纪念馆保留起来，我就没有同意。今后也不能搞。

# 真假和谈的斗争

## ——记北平和谈

李 维 汉

**编者按：**李维汉同志生前嘱我们转告读者，对他的回忆录“敬请提出批评建议”。意见请寄本刊编辑部。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央指派我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我党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进行了二十天的和平谈判。围绕着北平和谈所进行的近四个月的和谈斗争，是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我党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场重要的政治斗争，即真和谈与假和谈的斗争。现将此次和谈的前后经过回顾于后。

### 一、美蒋策划假和谈阴谋。

#### 我党的基本方针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然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的

内战。战争的头一年，我军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一九四七年夏，我军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从一九四八年秋至一九四九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进行。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精锐部队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至此，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

伴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惨败，其经济、政治也陷入全面危机。

在经济方面，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连续倍长，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日益破产，人民苦难深重，民不聊生。

在政治方面，虽然国民党反动派加紧镇压，但在我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爱国民主运动继续高涨，浪高一浪。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美帝侵略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反对横征暴敛为主要内容的农民抗粮抗捐抗税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间阶级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也更加不满。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形成了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震撼和动摇着反动统治的根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愈演愈烈。

凡此种种表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为了挽救行将崩溃的命运，美蒋反动派又一次玩弄起假和谈的阴谋。他们企图利用和谈，欺骗全国人民，阻止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争取军事上的喘息时间，以便重整旗鼓，伺机反攻。



美帝国主义除了同国民党反动派积极策划假和谈的阴谋外，又积极拉拢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有联系，又同我党有联系的中间派右翼，准备在其无法阻止的人民革命胜利后的联合政府中，形成反对派，从而使革命就此止步，或带上温和的色彩。

在国民党内部，以桂系为首的一些国民党地方势力，则企图利用对蒋介石的不利形势，取蒋而代之。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和三十日，白崇禧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举行和谈，实质是逼蒋下野。与此同时，程潜、张轸及河南、湖北、湖南的参政会都致电蒋介石，表达了同样的主张。以后，白崇禧还一度策划湘鄂赣豫黔“五省联盟”，促蒋下野，以李宗仁出面，代表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我“和谈”。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发出文告，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保障……则我个人无复他求……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

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对美蒋反动派的假和谈阴谋有着不同的反应。广大民众饱受剥削压迫，迫切希望将革命进行到底，翻身作主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对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虽已有较清醒的认识，但仍有一部分人对美帝和李宗仁有幻想，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活动。如有一个包含了一部分较有名望

的工商界和工程技术界人士的中国工程师学会曾写信给国共双方，要求“迅速达成全面和平之使命”。民主党派中也有少数人持中间道路思想，有的幻想通过和谈，保留国民党的一部分力量，以巩固自己的中间派地位；有的幻想吸收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以壮大自己；有人并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多给李宗仁、白崇禧保留一些东西。

我党对这一和谈阴谋以及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是密切注意的。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一九四九年元旦，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分析了形势，指出虽然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文章尖锐地指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

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了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文章还以“农夫与蛇”的故事，寓意生动地告诫人们决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新年献词的发表对于揭露美蒋的阴谋，争取教育各阶层人士起了重大的作用。此时，已有一部分民主人士为了筹备召开新政协，应我党邀请陆续来到解放区的哈尔滨市和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中央统战部所在地）两地。新年献词发表后，他们进行了多次热烈的讨论。我参加了李家庄的讨论并作了报告。一月七日，在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韩兆鹗、翦伯赞、刘清扬、楚图南、田汉、胡愈之等人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沙千里等人，认为民主人士在当前必须认清三点：一、“养痍貽患，芟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复辙。”二、“熏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决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可言。”三、“经纬万端，实有赖于群策群力，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与团结所有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并提议：“倘荷赞许，尚祈诸公率先发起联衔向国外发表严正声明。”

一月五日，新华社发表《评战犯求和》，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一月一日文告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发表具有重要意义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蒋介石要确保其宪法、法统、国体和军队“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同时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能够消灭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残余力量，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行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我们愿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八条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声明说：“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么，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声明的发表，使我们无论是谈是打，都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

声明一出，立即得到广泛的拥护。一月十五日，在李家庄的部分民主人士召开讨论会。大家说：和平有两种，一种是维护反动势力和战犯利益的“南北朝”式的假和平；一种是毛泽东提出的维护人民利益的真和平。因此，只有将八条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才能实现人民所要求的真正的、民主的、彻底的、永久的和平。与会者一致同意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联系，共同起草一个支持毛泽东八项条

件的声明。翌日，周建人、胡愈之、楚图南、符定一、田汉、吴晗等联名致电哈尔滨方面，略谓：（一）“毛主席所提的八条实为完成中国革命之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二）“中国人民正注视着所谓国际干涉阴谋之酝酿，并坚决反对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借调停为名而干涉中国内政”；再次提议“以上两点倘蒙赞许，请连同前电所陈意见，由诸公发起，联衔向国内外发表声明。”同日，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等就符定一、周建人等一月七日电复电云：“顷奉来电，对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提出宝贵意见三点，高瞻远瞩，谋国情深，业经详细讨论，一致决议发表告国人文件，严正表示吾人对革命进行到底之态度。”一月二十二日，抵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五十五人联合发表声明，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声明说：“八项条件，正是对于蒋介石所提的无耻要求的无情反击，我们是彻底支持的。毫无疑问，全国人民的公意是在这儿反映出来了。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全民主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务须一致团结，采取必要的行动，坚决执行人民的公意，而使这八项和平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主救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和团体，香港、海外各界民主人士以及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教授们，也纷纷发表声明，热烈响应。

蒋介石内外交困，在全国人民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于一月二十一日宣布由李宗仁代总统，实际上是退居幕后操纵，玩弄假和谈、真备战的手法。

## 二、李宗仁的“谋和”活动， 我党的斗争策略

李宗仁代总统后，便积极进行“谋和”活动。他摆出开明姿态，一方面下令“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启封停刊报纸”；另一方面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去南京，又派邵力子、甘介侯去上海访晤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罗隆基、张澜等。（李宗仁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说：“这些人对我还友好，似乎不怀恶感。我若得到他们的支持，定能造成第三种力量，以制造反共之舆论。这样共产党就不得不放弃毫无意义的把内战打到底的目的。”）对李宗仁的“谋和”活动，我党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一月二十五日即以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指出：“对国民党的伪善，人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日，中央发电指示上海、香港党组织，要求“迅即将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的声明及我党上述谈话，连同我党一月十四日声明向国民党各大城市广为启（散）发，使广大群众不受美帝及国民党的欺骗。尤其要注意争取中间分子。”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又致电上海党组织，要他们同尚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交换意见。电文谓：“如果南京反动政府及李（宗仁）、孙（科）、邵（力子）、

张（群）等接受毛主席的八项条件，并即逮捕各主要战犯（如蒋介石、陈立夫一大批等），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那就是好的；如果只提出要南京反动政府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恢复民主同盟活动及容许被封的报纸、杂志复刊等等，那就是很危险的。因为对前项要求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不一定肯提出，而对后项要求既易为张、黄、罗等赞同，又易为南京在形式上接受，结果转使民主人士陷入被动，且有承认反动统治之嫌。”要求着重说服他们坚持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声明的立场。

已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周建人、翦伯赞、田汉、胡愈之、韩兆鹗、严信民、吴晗、楚图南等联名致电张澜、黄炎培、史良、陈铭枢、罗隆基等人。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也致电香港的民主人士，请他们坚持正确的立场。

与此同时，中央还向上海等地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他们配合这一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发动工人、学生等群众运动，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工会、学生会等团体可公开活动，被启封的报纸可自动复刊，并注意使中间阶层人士的民主运动和群众运动相配合，以揭露李宗仁和平谈判的欺骗性。实际上，李宗仁虽然想采取一些旨在争取中间力量的做法，但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抵制下，所谓“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启封停刊报纸”等命令，多未兑现。这样，就在广大人民面前暴露了国民党并无和平诚意，反使李宗仁处于政治上更加被动的地位。在上海、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亦未受其蒙骗，



李宗仁争取第三方面的企图基本失败。

李宗仁这时仍未放弃假和谈的基本立场，但迫于形势，于一月二十七日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以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

在此前后，为了试探我方的反应，李宗仁还安排了一些人士直接与我接洽。

一月十二日，白崇禧派黄绍竑飞抵香港，想托李济深帮忙，促成桂系方面单独与我和谈。但此时李济深已来解放区了，黄即通过我在港负责干部，致电李济深，表示为促蒋下野，“尤宜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方为有利”。李宗仁代总统后，一月底派黄启汉、刘仲华为代表抵平，叶剑英接待了他们。黄、刘转达李宗仁的话说：李宗仁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具体办法是：（一）实现局部和平；（二）切实在八项条件之上内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叶剑英答应将其谈话内容转陈中央。二月一日，中央致电彭真、叶剑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指出：黄启汉、刘仲华的谈话“是有政治内容的，且有文章可做”，“如刘仲华尚在北平，望令其迅速返宁，面告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如李、白托黄、刘转告之言，纯系骗局，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

二月十二日，刘伯承、陈毅在河南信阳接见了白崇禧派来的私人代表李书城。李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受托了解我方对白崇禧及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张笃伦、河南省主席张轸的态度。刘伯承、陈毅向他说明我党必须将革命进行到

底的根本立场，并以傅作义为例，反复说明了如果白崇禧能以实际行动作出贡献，我们将欢迎和优待，张轸、张笃伦也是这样。

李宗仁还直接、间接地安排了一些人士组成“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来洽谈，我方都采取了积极接待的态度。“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邱致中、吴裕后等于二月六日抵平。叶剑英接待了他们，并说明了和平必须是在八条基础之上的真正的和平。经过交谈，他们表示认识到共产党是要和平的，战争贩子在南方。二月十四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平，邵力子以私人资格随团前来。对于这个代表团，我党采取积极热情、诚恳坦白的方针，由叶剑英负责接谈。还邀请傅作义、邓宝珊等同他们接触。翌日，叶剑英与颜、邵、章、江会晤，并于当晚设宴招待代表团一行，傅作义、邓宝珊也应邀赴宴。初晤结果表明，颜、邵、章、江对我们是友好的，向我们表示敬佩之意，也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某些建议。但他们此次的目的，是想国共两党以对等身份实行南北议和。叶剑英坦率地指出：实现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从我们的愿望讲希望北平方式，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害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希望李宗仁认清形势，按照八条，同蒋介石真正决裂。二月十七日，我方召开欢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大会，北平市副市长徐冰讲了话。会后，叶剑英又分别与代表团成员晤谈。翌日，董必武、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

宴请颜惠庆一行，进行了深入的谈话。二月二十日，还邀请他们参加招待民主人士的四百人的大宴会。二十二日，他们飞抵石家庄，傅作义、邓宝珊同行。我去石家庄迎接他们，陪同他们抵达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代表团成员，商谈了有关和谈及通邮、通航事宜。这样就为正式和谈铺平了道路。他们也比较充分地了解了解放区的情况和我党的主张。这对他们回去后向李宗仁做工作以及后来参加新政协，是有重要作用的。叶剑英曾按照中央的指示挽留邵力子。邵力子答道：此次恐怕仍须回去，不过，下次可以再来。二月十七日，他们带了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一封信离平返南京。

### 三、北平谈判

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以毛泽东八项条件为基础，于四月一日在北平举行和谈。四月一日，南京政府派出由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刘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组成的和谈代表团抵平。我方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是：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后来又加派聂荣臻为代表。

李宗仁虽然公开表示愿意以八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但这是假的。实际上是想保存国民党的政府与军队，占有江南数省，以期东山再起。李宗仁在台上进行和谈活动，蒋介石在台下则加紧实施在三至六个月内完成大规模扩军的计划。其备战计划包括：重建四百个师；征募

二百五十万新兵；重新召集退役军官；编制新的装甲兵团；扩充空军。这是我们和广大人民完全不能同意的。因此，谈判的焦点是：南京政府是真接受八条还是假接受八条。

谈判前夕，张治中曾去溪口<sup>①</sup>见蒋介石。对此，我党是有警惕的。张治中抵平后，周恩来即当面质问他，指出这显然是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并质询南京“四一惨案”<sup>②</sup>事件真象。张治中作了一些解释。四月六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尖锐地指出：虽然李宗仁政府“表示希望参与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但是他们和继续主战的蒋介石及其死党一样，反对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反对接受中共的八项条件”。“他们要把反动势力‘平等’地‘光荣地’保存下来，以为卷土重来的资本”。社论指出这是一种极荒谬、极反动的态度，是与立功赎罪的态度完全不相容的。社论严肃地表明了我方的态度，打破了南京代表团的幻想。

为了充分交换意见，四月二日至十二日，双方代表先进行了个别商谈。南京代表们一方面与我方代表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一方面还与李济深、黄炎培、谭平山、傅作义、邓宝珊等多方面交谈。

四月八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接见张治中，

---

① 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辞去总统后，一度住在他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

②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南京反动政府指使军警特务向前往机场为南京谈判代表团送行，并要求实现真正和平的六千余名爱国学生行凶，造成流血事件。



就谈判中有关事宜，长谈了四个小时。毛泽东谈到，为了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也表示谅解。并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则更好。毛泽东还邀请张治中吃午饭，张得知毛、周昨宵一夜未眠，便辞谢而归。

四月十三日，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我方提出了在八项条件原则基础上制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周恩来对草案的各条作了说明，双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们的态度是：如南京政府真正接受八项条件，那一切都好商量，而是否接受八条，又主要集中在两个根本问题上，周恩来说：“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

(1)关于我军渡江接收国民党军队问题。南京方面企图划江而治（何应钦曾在十二日电示南京代表团说：“签约后驻军，第一期最好各驻原防地”，“渡江问题要严加拒绝。”）。我方则指明，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接收国民党政权。周恩来说，今天的革命，再不能象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样，由于中途妥协而使反动派最后又得到胜利。因此，要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南京代表团虽然不能反对渡江，但总希望慢一点。我方指出：慢一点渡江，无异给广州、溪口以掩护，使之获得喘息之机。同时我方也向他们表示，在谈判期间可暂不渡江。

(2)关于改编国民党军队问题。南京代表团希望双方军队分期分批各就驻在区域内自行改编，这实质上是要保

留其军队。我方则坚决主张依据民主原则，改编国民党的反动军队。至于改编方法，考虑到国民党军队的出路，提出先依照原编制集中整理，然后再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来，南京代表团同意改编，但希望将改编划分为两个时期，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国民党所统辖的部队由他们自己处理；联合政府成立后，再由整编委员会处理。我方不同意这样办。

以上两条是关系到人民革命能否进行到底的根本问题，是不能让步的。但是为了尽量争取以和平方法解决问题，我党在其他问题上作了许多让步。在讨论协定草案时，南京代表团对草案提出了四十余条意见，我方接受了二十余条。例如战犯问题，南京方面是很关心的。毛泽东在四月八日致李宗仁电中就谈到：“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为标准。”讨论协定草案时，南京代表团对战犯问题争得很厉害，主张不要将战犯问题写入协定。我方照顾他们的意见，将战犯分为两类，对其中怙恶不悛者，应予从严惩办；而“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除战犯外，对于国民党军队官兵及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决议修正案也表示了予以宽大处理的精神，其它各项问题也在认真听取南京代表团的意见

后，作了适当的解决。

谈判中，我方代表团还主动向他们保证，若李宗仁政府接受和平协定，我党将负责同各民主党派协商，接受他们以及南京政府方面若干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参加联合政府。

四月十四日，我受周恩来之托向在北平的部分民主人士报告第一次谈判的经过以及南京代表团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意见，并广泛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谭平山、彭泽民、蔡廷锴等人先后发了言。他们的意见很集中，认为我方已作出了不小的让步，《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之宽大已出乎意料，在渡江接收国民党反动政权、改编其军队及战犯这些根本问题上，不应该再让步。最后，我将接受了南京政府代表团二十余条意见后修改过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修正案向大家宣读，大家均表同意，并认为不需要逐条讨论了。

四月十五日，召开第二次正式会议。会上宣布了协定的修正案。周恩来说：“这是定稿了。我们总是尽量求取原则上的同意和实施技术上的合理，以便南京代表团说服南京政府，使协定很快签字，从而推动和平事业的进行。最后他郑重宣布：谈判以四月二十日为限期，南京政府是否愿意签字，须在二十日以前表态。南京代表团派黄绍竑、屈武于四月十六日携《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飞南京请示，希望南京政府能接受这一协定。

四月二十日晚，我方得到李宗仁、何应钦的复电，不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上签字，并反对渡江。二十

一日，毛泽东、朱德发布渡江命令，谓：“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一月一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命令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便全面渡江。

谈判破裂后，我陪同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召集各党派、团体和民主人士代表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南京政府拒绝和谈及时局的发展》的报告。与会的冯友兰等一批教授会后向我们表示：“中共所提和平方案，条件非常宽大，南方人民将更清楚地看到谁是谁非。”并希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全中国，相信我党今后能与各民主党派真诚合作。

#### 四、争取南京代表团的工作

南京代表团大多数人同我党是熟悉的，他们当中有的人同情我党（如章士钊），有的人长时间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不赞成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如张治中、邵力子），有的人属于地方派系，在国民党政府中并不得势（如刘斐、黄绍竑），他们一般是有和平愿望的。我党既把他们作为谈判的对手，同时又把他们作为争取、教育的对象，并通过他们争取李宗仁真正同蒋介石决裂，按照八条达成协议。因此他们来平后，我方除热情接待外，还对他们做了大量



的思想工作。正式谈判前，我方代表多次与他们个别谈话，交换意见。特别是毛泽东，从四月八日起，分别邀请张治中、邵力子和章士钊、黄绍竑和刘斐、李蒸和卢郁文（南京代表团秘书长）谈话，使他们思想有了转变。见了毛泽东后，张治中很兴奋。吃饭时，他谈到了共产党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自我批评和虚心学习种种美德。他感慨万端地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在这一期间里，他们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新气象，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形及我党干部的优良传统，很为感动。四月七日晚，我们为南京代表们安排了晚会，演出了秧歌剧。演出完后，张治中对我方人员说：“真好！站在代表的立场，我不能鼓掌。但站在领会一种新艺术的观点，我始终是在笑着。我衷心地喜悦，这是我们民族的活力，一种青春的质素在里面。”南京代表中有人还与三轮车夫、饭店茶馆店员、大学生、中学生谈话，深切地感到共产党的领导是大有前途的。他们承认国民党的错误和失败，承认今后的国家工作应由共产党来领导，同意了《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并表示愿意说服李宗仁接受这一协定。在谈判桌上，张治中坦然地表示：“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告一结束了”，“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把胸襟开扩些，重新合作”。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积极配合做南京代表的工作。和谈开始前，毛泽东接见李济深、沈钧儒等多人，并将我方的具体方案、文件先与民主人士商量。会议开始后，也将情况向他们通报。李济深、谭平山、王昆仑、陈此生、

陈邵先、朱学范、许宝驹等也多次与南京代表谈话。如四月二日，张治中等六人去见李济深，李向他们说：“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始终未能实现，而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都做到了。他们与孙总理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做错了，我们要承认。”张治中等就“中共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等问题提出询问，李一一作了解释。这些谈话，对南京代表团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李济深还派私人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同刘仲容一起去南京，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

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南京方面曾派飞机来接代表团返宁。我们考虑他们回去后的安全问题，挽留他们。周恩来曾于二十日夜打电话给张治中、邵力子，说他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主席和他本人请南京和谈代表团同人全部留下；对已协议的《国内和平协定》，日后还会起作用；代表团各位，今后还会有贡献，请他们考虑。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对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我们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于是，在平的南京谈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及其随从人员开会讨论后，一致同意留下。张治中在六月二十六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说：“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出新的希望……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我多年来内心所累积的苦闷，为之一扫而空。”黄绍竑因携

《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赴宁，解放军渡江后，他即辗转到了香港。为了尽最后的努力争取李宗仁、白崇禧，刘斐于六月抵达香港，并曾秘密去过广州。八月十三日，黄、刘联合在港国民党军政人员龙云等四十四人共同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坚决拥护中共的领导，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九月，张治中致电新疆的陶峙岳等，对促成新疆和平解放起到一定的作用。后来，南京代表团的全体代表，都应政协筹备会的邀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后都参加了政府工作，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南京代表团转向人民，意义是很大的，这在谈判史上确属少见，它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已丧尽人心，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则是众望所归，也反映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极大成功。

## 五、和谈斗争的成果

自一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解放军渡江，和谈斗争历时近四个月。虽然南京政府最后拒绝在协定上签字，但这场斗争却有着重大的政治影响。

首先，和谈斗争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的阴谋，宣传了我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基本立场及为此而制定的实现真正和平的八条主张，深刻地教育了人民，包括一部分曾经幻想走中间道路的同盟者，从政治上提高和加强了统一战线。

其次，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及《国内和平协定》修正

案对于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局部和平解放，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在反动统治行将崩溃之时，其内部四分五裂，人心涣散，士气沮丧，充满了失败的情绪，许多人急于找出路。八条及《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向他们指明了出路。这样，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威力，另一方面是《八条》及《国内和平协定》强大的政治威力，这就加速了反动营垒的崩溃。当《八条》发表时，党中央即指示将《八条》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广泛宣传。谈判破裂后，毛泽东、朱德又在渡江命令中指示：“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协定。”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国民党军政人员接受和平条件和率部起义者极多，最著名的有傅作义率部二十万在北平接受改编；程潜、陈明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率部在湖南起义；陶峙岳、包尔汉率新疆十万军政人员归向人民，等等。这些与《八条》和《国内和平协定》的政治作用是分不开的。记得当年有个说法：八条抵得上百万军队。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最后谈谈李宗仁。他由于当时的立场所限，未能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走错了一步棋，后来不得不远去异国，这确实是个遗憾。值得欣慰的是，出于爱国热忱，并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一九六五年七月，他毅然排除险阻，远渡重洋，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叶剑英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国民党起义人士以及当年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等多人去机场迎



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宗仁，与他亲切握手，笑谈契阔。他参观、访问了祖国各地，所到之处，受到盛情接待。在回国声明中，他说：“一九四九年我未能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李宗仁先生最后选择了叶落归根、回归祖国的光明道路，是令人敬佩的。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只要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做了贡献，人民都是欢迎的，人民优待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

(尹华 袁廷华协助整理)

# 内 蒙 古 各 族 人 民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

乌 兰 夫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今乌兰浩特成立。当时，内蒙古东部地区是东北根据地的组成部分，也是东北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民族和其他民族人民，为东北的解放乃至“辽沈决战”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 建立政权 安定后方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建立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建成为东北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是经过一番艰苦曲折的工作和斗争的。

记得“七大”前，中央决定我去蒙绥地区工作，任我为蒙绥政府主席。参加“七大”后，我就从延安出发，途经山西偏关，适值日寇投降，遂和吕正操等同志一道随军北上，到了商都。其时因绥远省城被国民党抢占，我又从暂驻商都的蒙绥政府赶赴张家口，见到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同志。他留我先在晋察冀中央局工作，告知我德王已经逃

跑，伪蒙疆政府留下一批人，让我去管理安排。这样，我便着手清理伪蒙疆政府留下的这个烂摊子。

“八一五”以后，内蒙古地区的政治情况比较复杂。苏蒙联军出兵后，日寇投降，其东西傀儡政权伪蒙疆政府和伪满兴安总省也随之倒台。我们正在挺进途中，人民政权尚未建立，因此伪军警宪特仍在为非作歹，土匪十分猖獗，社会极不安定，各种势力都在竞相活动。国民党则妄图攫夺抗战胜利果实，抢占了内蒙古一些地区，并笼络少数王公贵族，向一些地区派遣特务，秘密建立国民党党部。与此相呼应，在国民党中央任职的一些蒙古族上层人物，也从南京北上，大造“内蒙自治”的舆论，力图把内蒙古重新置于国民党统治之下。对于国民党，内蒙古广大人民，甚至包括一些民族上层在内，早已是深恶痛绝；他们由于对过去遭受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统治的罪行记忆犹新，因而不抱任何希望。但少数曾在伪蒙疆政府和伪满兴安总省任过要职的一些官僚政客和王公贵族，此时却打着民族的旗号，搞所谓“内蒙古独立”和“内外蒙合并”的活动，企图窃取内蒙古的领导权，继续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而广大的内蒙古人民，则对于抗战的胜利，无不欢欣鼓舞，他们渴望早日获得民族解放和民主权利，摆脱被奴役的贫困落后状况，只是怎样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统治，实现这个美好愿望，还缺乏明确方向。因此，当时内蒙古的形势和全国一样，同样面临着两种命运和两个前途的抉择，存在着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领导内蒙古人民取得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胜

利，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自然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在苏尼特右旗出现了一个“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出现后，聂荣臻同志传达中央指示，让我去进行处理。十月间，我轻装简从，只和奎璧等少数同志到了苏尼特右旗。当时不仅看到这个为时月余的“临时政府”每天还打铃上班，升降国旗，而且获知已经派出了外交使团，去谋求外援。其中政府头目，是伪蒙疆政府的法院院长补英达赖，成员包括一些王公贵族等上层人物和一批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我去后，积极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并向他们指出，我们主张国内各民族共同斗争，共求解放；主张内蒙古实行区域自治，不是什么“独立”。特别是说明，内蒙古长期发展的历史，尤其是近代的革命斗争历史，已经把蒙古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要使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不独各方面不能认可，就说蒙古族人民，也是不能允许的。所谓“内蒙古独立”，对内蒙古民族的解放和全国革命的胜利都是不利的。在说明这些道理时，我特别注重做青年工作。广大青年是愿意革命的。我们开座谈会，一讲就是半天。我向他们说明，补英达赖是蒙奸，张家口还在通缉他，你们选他做主席，行吗？他们在讨论中，开始时虽然对此问题也有人不服，但是团结在我们周围的绝大多数青年，因为认识到补英达赖是蒙奸，便都愿意进行改选。这样，我就将一步路，分成了两步走，先行改选，再创造取消它的条件。后在改



选中，他们选我为这个政府的主席，政府成员里还增加了几位中共党员。我随即商得他们同意，在上任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往张北搬家，并就此停止了以这个政府的名义发布布告。事后我返回张家口，立即向晋察冀中央局和党中央报告了处理这一事件的经过和所了解到的内蒙古各地的情况，同时向中央请示，我们准备成立一个领导自治运动的组织，以便开展工作。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央给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的电报指出：“在目前我们控制热察、发展东北、取得华北优势的方针下，内蒙在战略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适当的解决内蒙民族问题，不仅关系内蒙民族本身的解放，而且能够建立我党我军巩固的后方。”电报指明：“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首先从各旗开始，争取时间放手发动与组织蒙人的地方自治运动，……准备建立内蒙自治筹委会的组织，统一各盟旗自治运动的领导。”同时指示我们：要加强广泛的统一战线，对民族上层应积极争取他们参加自治运动，使我们打击的对象缩小到最小限度。对蒙古伪军亦应与其他伪军不同处理，除最反动者应武力解决外，一般的应采取宽大政策，对其愿意转变者，即可改编，逐渐改造。电报还指出：要教育我们到那里工作的干部尊重蒙古人的风俗习惯。要我们大力培养民族干部，举办有利于蒙民的各种文化、经济建设事业及社会公益事业。

为了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统一领导内蒙古的自治运动，我们正式提出了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主张和具体

方案，并先取得晋察冀中央局同意，由晋察冀中央局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九日电报请示中央，提出成立一个群众团体，“名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带有政府的咨询机关性质。由自治运动联合会办学校，联络各盟旗，团结王公、喇嘛、知识分子，准备将来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在各盟旗政府下，成立蒙古人民的自卫武装。”第二天，中央即回电称：“同意你们先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宣布纲领，发动广大蒙民，准备将来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方针。”我们经过筹备，即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盟旗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并成立了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我担任了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兼军事部长和工委书记。其间，联合会吸收内蒙古各地区各阶层人士参加，甚至连原在伪蒙疆政府工作的和那个“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只要愿同我们合作的，也被吸收进来为委员。这时我问那些上层人士，那个“临时政府”怎么办？他们说，大家都参加自治运动联合会了，那个政府也就算了。这样就取消了那个政府。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也是一个半群众团体半政府性质的组织。它在各盟旗建立分会和支会，派遣干部，健全机构，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收编整编解放区内各盟旗的保安部队。它自成立后产生了巨大号召力，特别是在蒙古族人民和各界青年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原来已被傅作义部队控制的三支蒙古军队，就是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歧视，前来投靠自治

运动联合会，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我们成立军政学院，就是以最先起义的部队为基础，为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和进一步开展自治运动培养了干部。因此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东蒙“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从王爷庙派来一位代表包玉昆，向我们介绍了一些东蒙情况。我们听了这些情况后，为迅速开展东蒙的工作，遂于十二月派出了一个东蒙工作团，沿怀来、承德、赤峰一线向东蒙进发。行前，我还特地写信给中共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同志，交东蒙工作团副团长克力更同志带去，内容是，请富春同志能够相机派出部分干部，协助我们开展东蒙工作。但东蒙工作团途经围场时，遇到大股土匪阻隔，没能及时通过。次后，当克力更同志到达郑家屯后，将我的信交与富春同志。富春同志对他们说：你们来得太好了！东北的解放对于全国的解放至关重要，而内蒙古的统一对于东北的解放也很重要。现在你们来得正好，赶快去王爷庙吧。他们在富春同志派车送去后，便与东蒙自治政府的负责人进行了频繁接触，其间达成的协议是：尽早互派代表，举行谈判。

一九四六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冀热辽军区的部队要进入昭乌达盟，遭到东蒙自治军第四师的阻挡。他们声称这个地区归东蒙自治政府管辖，不得进驻，于是双方发生磨擦。中央给我和东北局打电报，让我去处理这一争端，并研究解决内蒙古东西部自治运动统一问题。后经东北局

提议商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与东蒙自治政府各派七名代表，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在承德召开了解决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问题的会议（即“四三”会议）。这次会议，突出地围绕着内蒙古的领导权和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在争论中，经过我们耐心的工作和反复的协商，终于统一了思想，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议确认：内蒙古地区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会议同意，由东蒙自动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按照中央先由自治运动联合会做群众工作的指示，决定撤销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领导东部四盟的工作。东蒙自治军改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性质一致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接受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军区的领导和指挥。

“四三”会议是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民族结束了长期被分割的局面。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为把内蒙古地区建成为巩固的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曾作了大量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广泛深入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并积极领导群众，分别在农村进行了除奸反霸和减租减息、在牧区进行了削弱封建特权和民主建政的斗争。同时以实行自由放牧，奖励生产，打击旅蒙商的不等价交易和发展国营贸易事业等措施，逐步解决了群众的生产与生活困难。而在张家口、赤峰、王爷庙等地，则通过开办军政干部院



校，先后培养了三千多名少数民族干部，他们在解放内蒙古和东北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时，内蒙古各盟旗的王公、札萨克、总管，以及伪满和伪蒙疆的一些蒙古族高级官吏，都是内蒙古的民族上层；他们在民族内部都有一定影响。在开展自治运动中，只要他们拥护人民解放战争和民族区域自治，我们都采取既往不咎和包下来的政策，把他们吸收到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各级机构中，安排一定的职务，给予适当的照顾。这样做既可安定上层，又利于发动群众，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形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甚至对少数倾向革命，要求加入我党的有影响的民族上层人物，我们也根据他们的表现，吸收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壮大了我们自己的力量。

与农村的除奸反霸和牧区的民主建政相配合，我们还组织内蒙古人民自卫军进行了剿匪和抗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日寇投降后，内蒙古地区的伪军警宪特残余势力还很猖狂，他们同一些反动王公、土豪劣绅相勾结，组织起名目繁多的各种匪帮约两万多人。他们盘踞在内蒙古地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残杀共产党干部，祸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如果不把这帮匪徒清剿干净，不但民主改革难以进行，群众难以发动，后方亦不能稳定。为此，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在各地党和政府的协助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作战方针，经过在兴安盟、纳文慕仁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的剿匪作战，除闻风远遁的残匪外，共计毙伤匪徒三千

四百多人，收降两千七百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马匹。紧接着，当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于一九四六年六月违背和平约言，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之时，内蒙古解放区亦遭到严重威胁。国民党七十一军的三个师和九十三军的一个师，与蒙奸李守信等部相勾结，侵占了内蒙古地区的开鲁、通辽、库伦、赤峰等地。对此，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奋起自卫反击，配合兄弟部队与国民党匪军展开了殊死斗争。战斗中，部队指战员勇往直前，不怕牺牲，很快收复了被国民党抢占的地区，英勇地保卫了内蒙古解放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减少了东北前线部队的后顾之忧，并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

一九四六年冬，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成立后的一年中，由于以我党为核心，统一领导了内蒙古东西部的自治运动，废除了历代统治阶级所推行的重重压迫与剥削制度，受到了区内外广大蒙古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并在同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坚定地表现了蒙古族人民跟随中国共产党的信心与决心，因而要求成立自治政府的呼声，从西到东，自下而上，十分强烈。也就在这年底，中央指示东北局、西北局和晋察冀中央局，筹备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同时让我到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去，亲自组织筹划。当时锡、察盟正处于战争状态。我从贝子庙出发后，穿行于土匪出没地带，沿途安排妥西部各盟旗的党政干部、王公贵族代表、筹备工作人员随后启程事项，边走边检查工作，经林西、林东，到达了王爷庙。到后即同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副主席博彦满都及东、西蒙总分会负责人等，又一起到了哈尔滨。我参加了东北局会议，研究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有关问题。我们与博彦满都等负责人协商同意，确定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组织机构、人事安排和施政纲领。为能确保这些商定的事项得以顺利实现，会后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并进行了周密的组织工作。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正逢“四三”会议一周年时，我们在乌兰浩特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东西部各盟旗，各阶层的三百九十二名代表，包括工人、革命军人、农民、牧民、妇女、青年，以及一些上层人物和宗教人士，共商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大事。我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总结和分析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历史经验和自治运动联合会一年多的工作，提出了今后任务。但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少数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公开提出“内蒙古没有阶级，不能进行民主改革”的谬论。我们根据内蒙古的经济形态和实际存在于城镇、农村、牧区的阶级状况，给予坚决批驳，从而坚持了党的领导原则，确定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施政纲领。至于人选，本来在哈尔滨就已是协商定了的，但这时又有少数人提出要“自由选举”。并且请客拉票，妄想推翻东北局的决定，由他们来掌握政府。其实通过讨论，我们取得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因此我对他们说：既然你们要自由选举，那就让代表们自由取舍吧。后经选举证明，果不出我们所料，挑起事端的人恰恰得票很少，还得通过我们做说服工作，才为他们保留下一定的位置。

就这样，经过激烈的斗争和艰苦紧张的工作，内蒙古

自治政府终于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正式宣告成立！我被选为自治政府主席。但毫不奇怪的是，即使在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斗争也还在继续着；少数有影响的上层人物，继人民代表会议之后，又提出要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时我说：先把你们的党纲拿来，看看是不是合乎我们自治政府的方针。他们没有拿出党纲，于是不了了之。后来东北局经过慎重考虑，并请示中央同意，于同年七月九日电告我们成立了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后于一九四九年改为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保证了党对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内蒙古工作的领导。

内蒙古自治区是在我们祖国大地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它为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提供了范例。它的成立，对国内外震动很大，影响深远。它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地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我们在自治政府成立后，就向党中央发了致敬电，并于五月十九日接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复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鼓励我们说：“曾经饱受苦难的内蒙古同胞，在你们领导之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内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随后，我又打电报向东北局汇报，并当彭真同志路经白城子时，专程前往向他汇报了政府成立的情况。彭真同志认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不仅是蒙古族人民的一件大事，而且是东北地区以至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他对自治政府的成立，表示了热忱的祝贺，并指出：在内



蒙古这么大一块地区，能够建成为一个安定巩固的后方基地，这本身就是对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的巨大支援。

## 进行改革 支援前线

一九四七年，中央公布了土地法大纲后，在内蒙古农业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广泛的民主运动。这是我党为赢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而掀起的一场社会变革。我们根据土地法大纲的精神和内蒙古地区的具体情况，本着既坚持彻底消灭封建压迫，废除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解放生产力，又坚持慎重处理好围绕土地问题可能产生的民族矛盾和农牧矛盾的原则，制定了内蒙古农业区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这样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开始，到一九四八年四月结束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内蒙古广大农业区打倒了封建地主阶级，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农民群众翻身作了主人，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整个农业区一当打破了封建枷锁的束缚，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翻身农民就自动地组织了农会、民兵、妇女、青年等群众组织，掌印当家，参加政权，拥军优属，支援前线，建立了各族农民之间新的阶级友爱关系，实现了内蒙古有史以来最广泛最彻底的人民民主，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在农业区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我们对牧业区也进行了民主改革。我们根据牧业区阶级结构和畜牧业生产的特点，制定了“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上而下地进行和平改造和从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废

除封建特权，发展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生产”的总方针，实行了“牧场民族公有，放牧自由”、“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扶助贫苦牧民，牧工牧主两利”（简称“三不两利”）的政策。这项方针政策的实行，既废除了牧业区的封建特权，又鼓励了牧主、富牧发展生产，从而保持了社会的安定，避免了牲畜的损失和死亡，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大幅度发展。并由此一举，使得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无论在乘马、鞍具、皮衣、皮帽、毡靴、食品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供应。因此，这项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是经过时间的考验的，它使内蒙古草原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至于城镇，我们主要是发动群众，开展了对于暗藏的日伪国特的检举运动，清理了社会渣滓，建立了政权和工会，保护了工商业的发展，安定了社会秩序，同时建立和恢复了一些工厂，为发展生产，解决军需民用，支援前线，做出了贡献。如军械厂、皮革厂和被服厂，他们将制造的武器和军需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装备了内蒙古骑兵部队，补给了东北野战军。

这个时期，由于农村、牧区、城镇民主改革的普遍兴起，一部分蒙奸恶霸和反动地主预感到他们的末日来临，他们为了维护其封建剥削制度，破坏民主改革，与伪满军警残余势力和国民党相勾结，组织起地主武装，杀害我土改工作干部和积极分子，捣毁我区乡政权，使一些地区的民主改革难以进行。为了保障各地区的民主改革运动顺利进行，我们又一次组织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展开了剿匪斗争。在战斗中，广大指战员不避艰险，英勇顽强，同时配合政

治攻势，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毙伤匪徒六百余人，捕俘匪徒二百余人，收降百余人。基本上肃清了匪患，保卫了民主改革运动的胜利成果。

总之，经过广泛的民主改革运动，内蒙古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贫苦农牧民翻身作了主人，他们从自己的切身利益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他们造福的党，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就是他们的子弟兵。他们在各条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城乡群众的生活也得到初步改善。这时，改革后的工人农牧民为使部队有充足的兵源，充足的粮草，以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当时内蒙古地区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号召下，各盟旗都成立了支援前线委员会，广大农牧民在“打老蒋、送好粮”的口号下，节衣缩食，精心挑选，把最好的粮食、最好的牛马羊送往前线。仅兴安盟、纳文慕仁盟和呼伦贝尔盟，三个月就缴送了一亿一千多万斤公粮；哲里木盟缴送了三万二千多斤牛羊肉，八万四千多斤羊草。内蒙古自治政府给前线运送了折合人民币四十一万多元的牛羊肉、干菜和其他军需品。当时，内蒙古解放区经济还比较困难，广大群众能够拿出这么多物资支援前线，实在说，是相当不容易了。不仅如此，成千上万的农牧民青壮年，为了保卫民主改革的胜利成果，保卫自治政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人人争先恐后，到处出现了父母送儿、妻子送郎和骑上自己的马、带上自己的枪，前去参军的动人景象。仅昭乌达盟就动员了四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的兵力，并组织了二十八万民工支前。支前民工们抬担

架，搞运输，破坏铁路，担负战场勤务，及时把作战物资送到前线，把伤病员运往后方，充分保障了我军作战的需要。同时，各地群众在生活还不富裕、劳力紧缺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前方战士和民工能够安心参战，对烈军属、支前民工家属，凡是缺乏劳动力的，普遍实行了包耕制，生活给予关照，做了大量的优抚工作。内蒙古各族人民就是这样从多方面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对“辽沈决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和牺牲。

### 组织武装 并肩作战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其中提出：少数民族地区要“建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晋察冀中央局也多次指示，要我们组织蒙民自卫武装。可我们当时的处境是，在内蒙古直接由党领导的部队，只有一部分游击队和少数盟、旗的地方武装，而各盟旗王公贵族的保安队却很多。因此在日寇投降后，我们通过多数盟旗保安队和伪军的起义反正，收编改造了大量旧军队，同时动员大批翻身农牧民和青年学生参军，根据内蒙古地区特点和自然条件，组建起一支新式蒙古族骑兵部队。这是我们在开展自治运动之初，首先抓出的一项成果。到“四三”会议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所辖部队为五个骑兵师和一个纵队，其中蒙古族指战员占部队人员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就为剿匪肃特，保卫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运动的开展，为解放内蒙古和支援东北解放战争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这个时期，为了加速教育、改造和提高这支蒙古族武装，东北局、西满分局、晋绥分局、晋察冀中央局、冀热辽分局都先后派来许多优秀干部，到各部队担任政治委员和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他们以我党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开展政治工作，发展党的组织，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从而使这支蒙古族骑兵部队，一开始就在肃清境内伪蒙疆和伪满残余匪患的实战中，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巩固革命的社会秩序而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这支部队的精神力量。广大指战员在党的领导下，决心不惜牺牲一切保卫内蒙古解放区。这支部队，遵守《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中提出的，在党的领导下，人民自卫军必须忠于民族，忠于人民，拥护政府，遵守政府法令，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严整纪律，保卫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建军方针。他们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争取自卫战争胜利的战斗中，尽管气候恶劣，供应不足，行军艰苦，作战频繁，但官兵无怨言，部队很巩固，数年间涌现出了许多为人称颂的英雄和模范。

一九四七年，东北民主联军对国民党反动派连续发动了夏季、秋季、冬季攻势作战。在这三次攻势作战中，内蒙古骑兵部队配合主力并肩战斗，活动于农安、怀德、康平、彰武、黑山一线，击退了增援四平国民党骑兵，打

击了抢粮的敌人，清剿了散匪。部队还四次挺进敌后破袭北宁路，致使敌区的交通命脉长期中断，敌军首尾不能相顾。在这三次攻势中，内蒙古骑兵部队共与国民党正规军及其他地方军作战六百三十余次，毙俘敌一万九千余人，缴获各种口径炮、轻重机枪、长短枪八千五百六十余件。战斗中，部队发扬了蒙古族骑兵骁勇、灵活、迅疾和擅长出奇制胜、穷追猛打的传统作风，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为孤立长春、沈阳之敌，扭转东北战局，贡献了力量。战斗结束后，受到了东北军区的嘉奖。我代表内蒙古党委、内蒙古自治政府，给部队发了慰问信。

一九四八年一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成立了内蒙古军区，中央任命我担任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们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利用战斗间隙，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经过这个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增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内蒙古和解放全中国的信心，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也得到了充分发扬。特别是由于广大农牧区经过民主改革，大批翻身农牧民踊跃参军，增加了部队的新鲜血液，农牧民成分占到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因而纯洁了队伍，严明了纪律，胜利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杀敌立功运动，指战员们情绪饱满，士气旺盛，个个争当功臣和杀敌英雄。并在此基础上，掀起了群众性的练兵热潮，运用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传统练兵方法，从骑兵特点出发，进行骑兵战术技术训练，提高

了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增强了部队战斗力。所有这一切，都使内蒙古部队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九四八年辽沈决战前夕，内蒙古骑兵部队按照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指示，挺进到铁岭、沈阳、新民、彰武地区，完成掩护主力和开辟新区的任务。在广阔的正面地段，对沈阳、新民地域之敌进行了封锁，对骚扰之敌给予了沉重打击，为野战军部队进行整训创造了条件。八月中旬，内蒙古骑兵部队又奉命开赴长春前线作战。临出发前，我到部队驻地作了动员。要求他们配合东北野战军，坚决消灭美蒋反动派，为人民再立新功，并在战斗中锻炼壮大自己。部队驰赴到大黑林子镇地区，任务是：如长春突围之敌途经黑林子镇时，采取顶、拉、侧击的战术，迟滞敌人的行动，堵截敌人退路，严防敌人逃跑，并要争取时间，配合主力部队将其歼灭。八月二十九日，部队在辽河北岸阿其堡堵截铁岭逃敌，广大指战员乘马冲杀，俘敌一六九师运输团二营营长以下一百零五名，缴获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五挺，六〇炮三门，冲锋枪、步枪四十八支，子弹五千五百余发。

辽沈战役开始后，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在关于辽沈决战的电文中，都提及内蒙古骑兵一、二师，并将这两个师部署在适合骑兵作战的地段，充分发挥了这两支蒙古族骑兵部队的作用。在辽沈战役的整个过程中，从攻打锦州，会战辽西，到夺取沈阳的五十二个日日夜夜中，内蒙古骑兵部队始终配合东北野战军战斗在最前线，胜利地完成了战役侦察、占领前进阵地、侧翼威胁、阻击突围与远距离

追歼敌人等任务，常常是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战斗。战斗中，广大指战员高举锋利的军刀冲锋陷阵，使敌人闻风丧胆。内蒙古部队在坚守阵地的浴血奋战中，英勇顽强，人在阵地在，他们在和敌人多次展开肉搏战的拚杀中，有许多蒙古族优秀儿女，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骑兵一师二连连长布和吉雅，就是带领全连坚守阵地而壮烈牺牲的。他们经过誓死抗争，为黑山、大虎山的阻击战赢得了时间。十月二十五日，骑兵一师二团在大虎山以南励家窝堡一线占领阵地，保障了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阵地右翼的安全。当时，敌二十二师六十六团在四门山炮和三架飞机的掩护下，向他们的阵地猛烈轰击，全团指战员顽强迎战，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守住了阵地。在这次战斗中，三连连长拉木扎布、指导员敖敦满都拉带领战士，从敌人侧翼发起乘马冲锋，冲进敌人的重机枪阵地，当战马被打死后，他们就徒步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为解放东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特等功臣甘珠尔，用重机枪击落了敌人（RST式2291号）侦察飞机一架。战斗结束后，我们授予他“英雄勋章”一枚。锦州解放后，内蒙古骑兵部队配合主力部队，参加了追歼企图从营口乘船南逃的敌五十二军的战斗，敌军除军部、二十五师及三个团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在他们追歼南逃之敌的途中，沈阳宣告解放。至此，伟大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彻底解放。

“辽沈决战”胜利后，国民党蒙骑一旅逃向内蒙古，准备西去接受绥远国民党指挥，妄图作最后挣扎。东北野战军授命内蒙古骑兵一师追歼这股逃匪。骑兵一师的指战员



虽然在辽沈战场上连续奋战了五十三个日日夜夜，人困马乏，尚未休整，且又时值隆冬，部队棉衣未到，指战员们还是头戴单帽，脚穿单鞋，但他们为了不失时机追歼敌人，接到命令后，就日夜兼程，穷追不舍，直至十多天后，追到昭乌达盟的林西，余匪向西远遁才作罢。至此，内蒙古东部解放区彻底肃清了多年未绝的匪患，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广阔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一派太平景象。

这个时期，担任留守任务的内蒙古各骑兵部队，在歼灭各地区散匪的战斗中，也是相当艰苦的。为了保卫内蒙古解放区、巩固后方交通和支前供应线，他们从盛夏到严冬，常常是在沙漠、草原、荒山地带完成追歼任务。特别是部队在没有穿上棉衣的情况下，有时一个连只能分到一个蒙古包住宿，多数战士经常是在冰天雪地里露营。而剿匪作战又往往是长途奔袭，日夜兼程，转战千里，行军比打仗的时间多出许多倍，这就更加辛苦了！广大指战员经常是用一把炒米、一把雪充饥，断粮是常有的事。有些人常常因疲惫不堪，在马上打盹睡觉。但在剿匪战斗间隙，他们却又象生龙活虎一般，为沿途广大农村、牧区人民群众做了大量好事，协助当地政府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为各族人民立下了新功。他们不愧是内蒙古各族人民的优秀的子弟兵。

内蒙古骑兵部队在东北解放战争，尤其是在“辽沈战役”中，以其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写下了一章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发挥骑兵特长、屡建战功的历史。这一章历史，无可置疑地说明，经过这场人民战争的考验，内

蒙古部队已经锻炼成长为一支能征善战、智勇兼备的人民铁骑。这是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光荣，是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的光荣。

“辽沈战役”距今已三十六年了，回顾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和其他各族人民能在伟大的“辽沈决战”中贡献力量，是非常光荣和值得自豪的。而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了的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优秀儿女，更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头！他们的勋业，已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他们的榜样，正激励我们为祖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 从苏北到东北

——新四军第三师进军东北参加  
东北解放战争的回顾

黄克诚

一九四〇年五月，根据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命令，我率八路军第二纵队一部分主力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皖南事变后，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我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苏北区党委书记，负责开辟和建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时，新四军第三师（含地方部队）已经发展到七万余人。一九四五年九月，我奉党中央及中央军委命令，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四个旅和三个特务团共三万五千余人奔赴东北，参加了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和东北的人民解放战争，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及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的领导指挥下，同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与东北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取得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回顾这段历程，至今仍历历在目。

## (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不久，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命令我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一部，到淮南津浦路西，与新四军第二师的部队会合，阻止国民党桂系部队东进。在回师苏北的途中，九月十三日经过华中局驻地时，得知苏联红军已占领东北，我军少部分部队也已进入东北。我就请当时任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给中央发电报，建议中央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要下决心进军东北。饶漱石当时不同意发这个电报。我便以自己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电报，向中央提出了我对当前局势及军事方针的意见和建议。这封电报说：“蒋介石同我党谈判毫无诚意，只是以和平谈判作欺骗人民、麻痹我军和拖延时间之手段。而在军事上，敌人以大军积极进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以必要兵力控制我军可接近之山脉……估计顽军……到适当时机，和平压力无效后，即以大军向我进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我军数量虽大，但精干坚强之主力不多，占领地区大；我主力分散各大战略根据地，除山东外，突击力量均欠强大，均很薄弱，各根据地内均有敌顽之据点，控制有铁路及大城市；各根据地联系做得不好，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根据上述情况，目前我们的方针约有下面三个：（一）以极大让步取得和平（削弱军队与地区到极大限度）；（二）有利基础上让步，长期和平谈判，争取和平，保持力量；（三）有决心的主动的放弃一些地区（游击坚持），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创造联系一大片的大战



略根据地（有铁路和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逼迫蒋介石向我让步，取得和平。我们若执行第一项方针，将走希腊路线，造成严重失败（蒋永远不会放弃我军我党）；第二项方针，目前很少有实现可能，时间延长，对我极端不利；因此，我们应采取第三项，政治上仍进行谈判，而军事上应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在决战胜利之下，取得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利进行长期斗争。军事部署上，我建议：（一）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战争。（二）以晋、绥、察三地作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应集中十万主力，进行消灭傅作义、阎锡山、胡宗南之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察、绥与西北部和太行山全部。（三）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应集中十五万主力……进行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山东。（四）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力求争取局部决战之胜利，不可能时，即以游击战争长期周旋。为执行上述方针，建议山东应调三万到五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三万到六万人去山东；在河南及平原主力的一部应调山西；江南（新四军）一个师主力应调回江北。一师为新四军之坚强部队，目前向顽作战毫无希望，若被截断，会被迫打游击。以坚强主力去打游击，极为不利，故应迅速北调。”电报最后说：“我对各方面材料了解甚少，可能有片面之处。但我认为，目前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没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就不会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故集

中兵力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

这封电报于九月十四日经华中局电台发出后，我即离开华中局驻地，率部回师攻下淮阴和淮安两座县城，歼灭伪军一个师又一个旅。九月二十二日，当我进入刚刚解放了的淮安城时，只见满城军民载歌载舞，欢腾雀跃，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历经战争创伤的人民群众渴望和平，需要休养生息，这是大家的共同心愿。可是，我心中清楚，国民党反动派无论如何不会允许我根据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很快又将成为我们与国民党反动派争夺的战场，已经付出了重大代价的根据地军民，还将作出新的牺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正面临着一场新的严峻考验。

## （二）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我接到命令，要我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开赴东北。我即刻着手进军东北的部署。当时曾有个说法，要我们把武器留下来交给地方，说是到了东北就可以拿到新的。我历来考虑问题，总是把不利因素尽量想得多一些，以便有备无患。我想，目前情况瞬息万变，部队到东北后万一拿不到武器，将怎么打仗？所以，我坚持部队武器不能留下，要全副武装去东北。同时我还考虑到，到东北之后，即进入冬季，首先将遇到与苏北迥然不同的寒冷气候，解决部队的棉衣问题，亦是当务之急。当时尽管受到一些责难，我还是坚持这两条：一是要部队带

上棉衣，二是要全副武装，多余的武器可以留下来。这样，我一边安排先头部队及后勤人员由第一副师长刘震率领即刻出发，一边抓紧筹集棉衣。九月二十八日，我同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随师部从淮阴启程，向山东进发。

离开苏北之前，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曾指示我们到山东以后，要停留一个时期。在行军途中，我一再考虑部队在山东滞留非常不利。历来强调兵贵神速，捷足先登，进军东北应不失时机、争分夺秒地快速行动。若在山东久留，再动员北进，又将费些周折。于是，我于十月四日向中央军委发电报，建议部队到山东后，不宜久留，稍事休整立即北进。十月六日接中央军委来电指示：“为迅速达成战略任务，三师部队在到达山东后，应兼程北进，不能在山东担负战斗任务。”十月十二日，部队进入山东临沂地区，休整两天，补充了粮食，即向河北进发。在山东临沂地区，陈毅向我介绍了延安的情况以及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情况。

十月十四日部队继续北进，经沂蒙山区的蒙阴、新泰，于十月二十一日到达莱芜城北停留一夜，于二十二日继续出发，过了胶济铁路和黄河，于十月二十六日到达渤海区的商河、济阳一线。接着，经德平，于十月三十一日在东光以南穿过津浦铁路，进入河北景县地区。旋于十一月二日进入冀中的献县、河间一线，又经霸县、固安，跨过永定河，在廊坊地区越过平津铁路，于十一月十日抵达冀东的三河、玉田一线。当时连日降雨，道路泥泞难行，部队又无雨具，不得不就地休息了两天，并补充粮食。

这时，得知敌汤恩伯部五万余人逼近山海关，已与我守卫山海关之山东部队杨国夫师接触。考虑到部队既然已难按原计划经山海关进入东北，我便于十一月八日向中央军委发电报，建议由山海关以西绕道经冷口出关进入东北。十一月十一日，我接到东北局的电报，命我率部队直趋山海关，配合杨国夫师歼灭进攻之敌。十三日又接东北局电令，要我部暂勿向锦州、义县前进，而改向义院口、驻操营前进，并要我统一指挥新四军第三师及山东梁兴初师集结于抚宁地区，待机歼灭正向山海关西北之石门寨及抚宁延伸并构筑地堡工事的国民党军。我当即于十一月十四日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并转报东北局，说明新四军第三师与山东梁兴初师全部集结于抚宁，尚需六天时间，且部队极度疲劳。军委前已有电令要我部迅速向锦州集中，现东北局又电令我部集结抚宁作战，究竟如何行动，请尽快指示。十四日接到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来的电报，令我部与梁兴初师速分路平行前进，限二十四日到达锦州地区休整。十五日毛泽东又电示东北局：“我黄、梁两部四万二千，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应令黄、梁两师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准备决战。”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命令，我们即从玉田出发，经丰润、迁安，由冷口出关，又经青龙、建昌，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达锦州附近的江家



屯。

这样，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四个旅、三个特务团共三万五千余人，从苏北徒步行军，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五省，历时两个月，完成了进军东北的任务。由于长途跋涉，部队伤病等原因，发生一些减员，到达东北时，部队的人数是三万二千。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到达东北时的战斗序列是：

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

第一副师长刘震

第二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

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七旅旅长彭明治

政治委员郭成柱

八旅旅长张天云

政治委员李雪三

十旅旅长钟伟

政治委员王凤梧

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吴信泉

特务一团团长郑贵卿

特务二团团长何文清

特务三团团长高峰

### (三)

在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到达东北之前，李运昌率所部先期一个多月进入东北，很快收编了大批游杂武装。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李部从锦州撤退，十一月二十六日锦州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我刚刚到达锦州附近，就接到东北局的电报，命令我部负责切断铁路交通，阻止

国民党军队进入沈阳。

当时，我们的部队经过长途跋涉，非常疲劳，而且面临一系列困难无法解决，很难进行大规模作战。前据中央九月十五日转发曾克林的报告中说：“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物资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但我们到达东北后，情况并非如此。苏联红军占领东北之后，因为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订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准我军进入大城市，不准我军接收苏军缴获的日伪军用物资。当时的东北，土匪蜂起，人民群众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我们很不了解，也没有地方党和人民政权的支持，部队的给养相当困难。出去搞粮食需要派出整排整连的武装，少数人根本无法通行。部队指战员没有棉鞋、棉帽和手套，从苏北带来的一套薄棉衣，根本抵不住东北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先头部队八旅及先遣人员，连薄棉衣也没有穿上，困难更大。加之在冀东三河境内向部队作进军东北动员时，对困难估计不足，此时部队的情绪出现了波动。我们只好重新作工作，动员大家克服困难，战胜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要部队同刚出关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在铁路沿线打硬仗，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有鉴于此，我于十一月二十六日给毛泽东同志发了一封电报，除报告我部在东北地区的位置以外，着重讲了部队遇到了极为困难的情况。我在电报中讲了“七无”，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领锦州，将直达沈阳、

长春。我提议我军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疲劳，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由于我刚到东北，与东北局的同志不熟悉，所以直接给毛泽东发电报提出建议。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又将某些县政权由改编的伪军所控制的情况，电报中央军委，并说明“东北敌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着手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毛泽东很快回电指示我直接向东北局请示和提出建议。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亦给我回电报指示：“关于你部编制、干部配备与活动地区和作战意见等，你均可与林彪坦白商谈，并由你与林向中央提出意见解决”。接到电报指示的当天，我即向东北局发了一封电报说：“已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建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巨，但若无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大减弱强大力量。目前东北大城市为顽军占领，乡村则被土匪所占据（大都与顽联系），我们则处于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因此，运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之五个月期间，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与政权，应成为当前之急务。求得五个月内建立根据地的初步基础，便利明春之大规模作战。”我建议“立即划分主力师（或旅）的补充熟悉地区，作为该师（或旅）之根据地。每师（或旅）划三到五个县，由该部队立即派遣地方干部前往规定地区，开辟工作，建立政权和党委，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该部队要派出必需兵团负责肃清土匪，恢复社会秩序，在规定地区内收

集粮食资财，建立医院、工厂，扩大新兵，源源补充主力部队。”在电报的最后，我建议，如果在整个东北部队中不能实施，“则请划十个县地区给三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

我先后给东北局发了三封电报，提出建立根据地的建议，但始终未见回音。为了执行东北局原来给我部的作战命令，我便与洪学智一道，带领各旅干部去看地形。待看完地形回到驻地，恰巧李天佑奉林彪之命来与我部联系。我才知道中央已决定派林彪负责组织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东北的部队。而林彪的司令部离我们的驻地大约只有二、三十华里。我立即与李天佑一起骑马去见林彪，当面向林彪陈述了我的上述建议。我说，部队现在的状况不宜进行大规模作战，我们是疲惫之师，且无根据地作依托；而敌人是乘坐轮船来的精锐之师。“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后方，以站稳脚跟，逐渐发展壮大自己，以期将来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林彪当即采纳了我的意见，并命令部队转移到义县、阜新一线，作发动群众的工作。我则同林彪会合，驻到义县附近的乡下。我就便又向他陈述关于建立根据地打开东北工作局面的想法和建议。

正在这时，毛泽东来电，询问我们对东北拟采取的方针的意见。我拟了一个电报稿，送给林彪看后发出。据我所知，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回电提出了意见。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八日给东北局发来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著名电报指示，指出东北斗争的艰苦



性，及时地提出了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方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毛泽东还特别提醒说：“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这一指示，指明了东北工作的正确方针，对统一大家的认识，坚定信心，为最后夺取解放东北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住在义县附近期间，就将新四军第三师的部队分散在义县和黑山边境一带，清剿土匪，作发动群众的工作。不久，国民党军进攻义县，我同林彪一起撤到阜新。紧接着国民党军又向阜新大举进攻，我建议林彪先撤。林彪遂率山东部队梁兴初和罗华生的两个师以及新四军第三师彭明治的七旅，撤到康平、法库一线。待林彪撤走以后，我将新四军第三师的十旅和独立旅分散在阜新以北、彰武东西一带活动，消灭土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我率八旅和三个特务团等部北进通辽，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攻下通辽城，歼灭了国民党收编的一千余伪军和地主土匪武装。随即，我们就在通辽、开鲁一带开辟工作，发动群众，

消灭土匪，建立政权。

根据这一段对东北情况的了解和工作实践，我于一月二十九日给东北局发了一封电报，提出了我对东北军事上的意见。电报说：“我们在东北军事上的一个困难问题，是集中与分散的矛盾。我们没有根据地很难打仗，但没有胜仗又建立不起根据地，故需要分散兵力，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创造根据地，又需要集中兵力，打破敌人进攻，来掩护创造根据地，二者不可得兼，二者又必须得兼。在东北若不适当解决这个矛盾，军事上有继续遭受挫折、甚至失败的危险。东北地区辽阔，乡村村落稀少，气候寒冷，我军没有近代交通工具，运动不灵活，分散之后不易集中，集中之后不易分散。国民党军据有铁路、公路，集中分散运动灵活，与内战时代不相同。敌人有对我作战的社会基础，兵力多，与抗战时期之日本大不相同。故过去内战、抗战两时期集中分散对付敌人之办法，已不能完全适应今天东北之情况，必须有新的办法来适应今天之情况。东北地区广大，土匪众多，蒙汉杂居，无工作基础与革命传统，干部缺乏和与人民尚无联系等条件下，要求长时期控制全部除大城市与铁路干线外之城市乡村，是不可能的，在短时间即变成根据地亦是不可能的。如现在企图长期全部控制成为根据地，而平均使用力量，则有得到相反结果的可能。根据上述三项，为解决集中与分散之矛盾，照顾作战与创造根据地两个方面……我意我们可以西满、东满、南满为单位，划分为下列三种地区来使用力量：（一）决战地区，（二）游击坚持地区，（三）政治攻势地区。三个单位中确

定一个地区为主要决战区。所谓决战区，即是预定在该地区与顽进行决战，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者。现在即将军队主力和地方干部集中该地区进行打匪、发动群众、改造政权，整个部队熟悉地形、民情，准备粮草，创造战场，到顽军向该地区进攻时，即不顾一切进行决战。目前在顽未进攻前则分散于三五天行程内之地区，便于集中作战。所谓游击坚持地区，即不准备在该地区决战，只与顽打游击，消灭顽小部队，这种地区只配备次要部队和地方干部。顽军进攻前，则控制现有城市，打匪，创造根据地；顽军进攻时，则以游击战消耗疲惫敌人，达到牵制敌人兵力之目的。所谓政治攻势地区（即中央指定不作战地区），完全不准备在该地区作战，只进行群众工作，与（向）顽进行政治攻势。这种地区顽未到前，以小部队维持治安；顽到后，即退到乡村掩护群众工作和进行政治攻势。上述划分地区的办法，可能解决集中与分散的矛盾和兼顾创造根据地与作战两个方面的要求。”

#### （四）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打开通辽以后，我得知东北局已在西满建立了分局和军区。我就打电报向东北局建议，把新四军第三师的部队与西满军区合并，使主力部队与地方相结合，亦使地方有主力部队，以便于开展工作。东北局采纳了我的意见，任命我为西满分局副书记兼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当时西满分局驻地在郑家屯，分局书记是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是吕正操。在我到西满分局工作之

前，吕正操已离开西满到东北局工作。我到西满分局工作以后，又任命我为西满军区司令员，在李富春的领导主持下，建设西满根据地。富春同志主管党、政方面的工作，我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整个西满地区的工作搞得轰轰烈烈。

此时，新四军第三师的部队已经分散开了：七旅由林彪带到康平、法库一带，归林彪直接指挥；十旅和独立旅在辽西彰武东西一带山地活动，由辽吉军区司令员邓华统一指挥；八旅一个团和一个特务团及师直由刘震带到长春以西的扶余、农安、前郭旗、德惠、三肇、大莱、甘乾等地区开辟根据地，组织了吉江省军区，由刘震任吉江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接替郭述申任省委书记。部队分散到地方活动以后，普遍建立了与群众的联系。加之不断用缴获土匪、伪军的武器和物资装备自己，使部队的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

当时，我们在东北已经建立了情报工作系统，可以及时地掌握敌军的动向。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林彪在彰武、法库间，指挥山东部队一部和新四军第三师七旅，消灭了国民党十三军八十九师的四个营及一个山炮连、一个运输连。这就是著名的秀水河子歼灭战。在此稍前，我打电报给新四军第三师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吴信泉，要他统一指挥活动于彰武东西地区的十旅和独立旅部队，消灭鹞欢池和泡子一带国民党军队。吴信泉立即到鹞欢池指挥作战。先以钟伟的十旅主攻，独立旅助攻，于二月十二日夜收复了鹞欢池，消灭了国民党十三军吴党部一个营。旋



即，又以独立旅主攻，十旅助攻，于新立屯以北的泡子车站，歼敌一个多营。这些战斗的胜利，锻炼了部队，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大大鼓舞了我军的士气，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一九四六年二月，国民党在南京组织反苏示威，要求苏联红军撤出东北，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接管。斯大林遂下令苏军从东北各大城市全部撤走。这样一来，反把国民党搞得措手不及。因为当时东北国民党军主力集中在沈阳，一时无力去接管其他各大城市；南京国民党政府更是鞭长莫及，向东北调兵遣将尚需时日，便只好由他们在各地收编的伪军、地主土匪武装去接管。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放开手脚去夺取大城市，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扩大影响。三月十二日苏军从沈阳一撤退，我就立即把活动于彰武东西地区的十旅调到四平附近待命，相机攻取四平。三月十四日苏军一撤出四平，十旅就趁势攻下四平，俘虏了几千伪军，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攻下四平之后，我又将十旅部署在开原一线，以阻敌北进。四月中、下旬，苏军开始从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撤退，刘震即率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一部和特务一团，在东满部队一部的配合下，于四月十八日攻下了长春，消灭伪军“铁石”部队一万余，缴获甚众。夺取长春之后，又用火车运送特务团北上，于四月二十四日攻下了齐齐哈尔，歼灭伪军数千名。在北满的山东部队七师和三五九旅之一部，于四月二十八日攻下了哈尔滨，歼敌近万。这一阵连续攻城作战，共毙俘伪军两三万人，缴获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国民党当局本来以为苏联

红军撤出东北会对他们有利，却未料到会由此促成我军得以进占大城市的局面。我军进占大城市后，装备得到很大改善，给养也不成问题了，给了部队以非常有利的休整、补充时机。从而，加快了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步伐。

### (五)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国共双方在关内达成停战协定之后，马歇尔回到美国。我当时的想法是：东北能否实现停战，要待马歇尔从美国返回以后，视美国政府的态度才好作出判断。不过，我不大相信国民党会真正停战。四平被我攻下后一个月，即四月中旬，马歇尔从美国返回中国，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已经明朗化了。在此情况下，我军再固守据点已无意义，应当避开强敌，把大城市暂时让出来，给敌人背上这个包袱。当林彪移驻四平附近时，我向林彪谈了我的想法和建议，并把西满的部队全部交给林彪直接指挥，以便统一部署大规模作战。不久，国民党军开始向北推进，在开原一线遇到我军的阻击后，即停止了前进。国民党军原以为可以象进占沈阳一样长驱直入地进占四平，遇到阻击之后，才知道那样不行。于是，敌人重新部署进攻，兵分三路攻打四平。敌正面是新一军和新六军，左翼是陈明仁的七十一军，右翼是五十二军和六十军等部。林彪曾征询我意见，商讨这一仗怎么打法。我建议选择敌三路中较弱的一路，在西面打敌左翼，可以消灭一部分敌人。林彪遂决定指挥山东部队梁兴初的一师、罗华生的二师和新四军第三师彭明治的七旅、钟伟的十旅、

吴信泉的独立旅以及张天云的八旅(欠一个团)，在八面城以南大洼一带，将敌陈明仁的七十一军之八十七师歼灭，俘敌四、五千人，还击落了一架敌机。国民党军组织的第一次对四平的分进合击遂被我击退。

旋即，敌人倾其全部兵力再度猛攻四平。这次东北国民党军集中了八个军的兵力同我作战。其中新一军、新六军和青年军二〇七师(相当于军)，全是美械化装备。敌新一军和新六军，系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两大主力。抗日战争时期，新一军和新六军专门到印度接受美国人的训练，后空运云南，开赴缅甸参加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回国，又被国民党派往东北打内战。敌其余的五个军，即十三军、五十二军、六十军、七十一军、九十三军等，也都是半美械化装备，均有一定的战斗力。相比之下，在四平一线我军的兵力要少得多。虽然后期又调来山东部队的七师和新四军第三师的八旅一部参战，但敌我力量对比仍然悬殊，尤其是我军的装备远不如蒋军。就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指挥东北我军约十万人与敌人在四平一线展开激战。这时西满分局已撤到白城子。我在白城子给林彪打电报，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硬拚。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锐气，这是可以的。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倾巢出动，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应当把四平及其他大城市让出来，让敌人进来，我们则应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等到敌人背上的包袱沉重得走不动了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去消灭它，那时候我们就主动了。

我连续给林彪发去好几封电报，建议他从四平撤退。但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于是，我于五月十二日又给中央发了电报，就四平保卫战提出了对东北局势的意见。电报说：我“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分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顽九十三军到达，如搬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来，四平坚守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如停战短期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亦绝对必要；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以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与敌决战。东北如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军向东北调动。东北则需要逐步消灭国民党主力，来达到控制全东北的目的。我对整个情况不了解，但目前关内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势感觉绝不利，故提上面意见，请考虑。”我给中央的电报，也始终不见回音。

在四平打的这场正规防御战，从四月中旬一直打到五月中旬，整整一个月时间，敌我双方争夺异常激烈。国民党军虽被我大量杀伤，但仍疯狂地轮番向我进攻。我军的伤亡亦相当严重。最后，我军不得不被迫放弃阵地后撤。我军正面的山东部队撤向哈尔滨，原新四军第三师的部队，除吴信泉带领独立旅撤回西满的通辽一带以外，其余都撤



到哈尔滨以北的呼兰一线。西满分局在此之前已移到齐齐哈尔。当时我方曾做了撤出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准备。但国民党军进到松花江边，占领了吉林、长春之后，也无力前进了。直到全国解放以后，有一次毛主席同我谈起四平保卫战的时候，毛主席告诉我说，固守四平是他决定的。这时我才明白，当初林彪既不撤兵又不给我回电报的原因所在。

国民党军占领四平、长春之后，为了固守其占据的地盘，不得不分兵把守，致使其兵力分散，暂时无力向我进攻。这正是我们休整部队、放开手脚建设根据地的极好时机。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我向中央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东北我军的情况，并对今后作战意见提出了建议。电报说：“从三月下旬国民党进攻起，到长春撤退，我军除南满外，总伤亡一万五千人。仅西满四个旅及一部地方部队，伤亡达七千左右，七、十旅连排干部大部换了三次，部分营级亦换了三次”。“后方工作太差”，“乡村中有些则有了点工作，有些则完全没有工作。土匪问题尚未解决，长、哈、齐占领后，西满散匪达一万以上”，“地方工作进展迟缓，是由于时间短，干部少，土匪多，及干部恋着城市，不肯下乡，工作作风亦有毛病等”。“顽军占领长春之后，东北停战的可能更少了，估计敌人要利用我主力一时不集中及疲劳之机会，将继续向我进攻”。“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作战方针，不能再死守城市，因在近代炮火、坦克、飞机攻击下，我军技术是无法守住一个城市的。故虽不能完全放弃消耗敌人部分的防御战，应以消灭敌人为主，应避

免被动的守城战，争取主动的歼敌。而目前争取一个时间来整理部队，恢复疲劳，提高士气，肃清土匪，发动乡村群众为最有利。待敌分散后作战，即使失掉一些城市，这样做亦较妥当。”我在电报中还特别说明，我这个人往往报忧不报喜，好从坏处考虑问题，“所看到的现象亦是坏的方面较多，故或许有片面之处，但都是事实，供中央参考。”

当时东北各地的土匪依然很猖獗，人民群众深受其害，匪患对我们建立根据地也是一大威胁。名目繁多的各类土匪，或几十人一股，或数百甚至上千人一股，各据一方，为非作歹，残害百姓。土匪对地理环境非常熟悉，消息灵通，活动诡秘灵便，全部是马队。我们用大部队进剿，他们就逃窜到深山老林隐蔽起来；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便会很快星散遁去，是比较难对付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在各种条件下打过仗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实战经验的老部队来说，总是有办法对付那些股匪的。我们发动指战员出主意思办法，很快摸索出了一套打土匪的经验，打得土匪望风披靡。我们组织骑兵部队围剿，不给土匪以喘息机会，将大部土匪消灭掉，其残余匪部无处藏身，一直被我骑兵部队追到中苏边境的黑河、漠河，将其全部剿灭。与此同时，将境内的伪军、伪警察、特务、地主流氓武装全部收拾干净。这样，就把国民党在东北的反动社会基础摧垮了。

我军刚进入东北不久，群众对我们还不大了解，加上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得群众一度对我们心存疑虑。国民党向东北的人民造谣说：“八路军是专门扒铁路的军队，比

土匪还坏”。老百姓不明真相，我军一到，他们就躲藏起来，来不及躲藏的人家也敲不开门。宿营时向老百姓借点柴草，根本借不到。我们部队多系南方人，对东北这冰天雪地从未见过，更缺乏应付严寒的经验，因此，吃了许多苦头。开始乘坐火车时，不小心用手扶一下车门，手上的皮马上就会被粘掉一层。有的战士脚被冻僵了，以为用热水烫可以缓解，结果脚趾却被烫掉了。至于指战员们挨饿受冻，更是常事。事实告诉我们，没有根据地，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援，部队不要说打仗，连立足也很困难。所以，我们更加迫切地感到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从一九四六年初开始，新四军第三师的部队就在阜新以北、哈尔套、库伦、彰武东西一带以及扶余、农安、前郭旗、德惠、大莱、甘乾、三肇地区作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工作。我们从苏北带来的一批地方干部，都深入到农村，去建立各级人民政权，组织清匪反霸和搞土改。经过一个时期的深入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有了实际的了解，认清了共产党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是来解放东北人民的。这样，党群关系、军政和军民关系就密切起来了。人民群众把我们的战士看作是自己的子弟兵，问寒问暖，照顾得非常周到热情。逢年过节，群众杀猪宰羊，拿出陈年老酒招待我们部队。当时部队还缺医少药，群众主动用土方为战士治病，真正体现了军民鱼水情。人民群众翻了身，部队的日子也好过了，生活得到了改善。翻身群众踊跃参军支前，部队得到发展壮大。通过新式整军运动，部队的战斗力有了很大提

高。总之，有了群众的信赖和支援，什么事情都好办了。群众一经发动起来，部队的兵源和我们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此时东北国民党军的情况则正好与我们相反。国民党军刚到东北时，凭借其现代化的装备，又有美国的援助作靠山，进沈阳，攻四平，占长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敌人打到松花江边之后，已是强弩之末，他们背上的包袱越来越多，应顾不暇。由于兵力不足，已经无法继续前进了。加之他们到东北后忙于劫收，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军队更加腐败，战斗力每况愈下。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已逐渐为东北人民所识破，人们当初对他们所抱的幻想已完全破灭，使其在人民群众当中陷于孤立。一九四六年冬在我军连续发动的“四保临江”、“三下江南”作战和一九四七年夏、秋、冬三个攻势的沉重打击下，东北国民党军整军、整师地被我吃掉，并被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联系的狭小地区，被迫处于守势。国民党军对我军向其发动的强大攻势，不仅无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也逐渐丧失。

这期间，我离开部队，在西满分局工作。一九四七年三月，李富春调到东北局负责财政经济工作，由我代理西满分局书记，继续在西满地区进行土改扫尾工作和扩军、组建地方武装，发展经济，支援前方。原新四军第三师的部队由林彪直接指挥，在前线作战。一九四六年春，八旅、十旅、独立旅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后改称东北野战军第三十九军），由刘震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治委员



兼政治部主任，吴信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七旅与山东部队的七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后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四十三军），由洪学智任司令员，杨国夫任副司令员。在西满以原新四军第三师的三个特务团为主力，加上地方部队一部，组建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后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四十四军），由邓华任司令员，陶铸任政治委员。一九四七年四月间，第七纵队再次打开通辽，消灭了通辽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到夏季攻势结束以后，整个西满地区完全连成了一片，无任何障碍了。我便向中央和东北局建议，将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撤销，把原来由西满分局领导的各省的工作，集中到东北局直接领导，以便更有力地支援前线作战。

一九四七年八月，中央军委任命我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统管整个东北我军的战勤工作。我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所在地哈尔滨之后，召开了两次后勤党委扩大会议，对后勤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组织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并制订了一套规章制度，使后勤保障工作有章可循。同时，对后勤系统进行了一次整顿，加强了领导，提高了工作效率。

一九四八年四月，为了加强南线支援作战的工作，中央又调我到热河，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冀察热辽军区政治委员，同时兼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委员。军区司令员兼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参谋长黄志勇在前线指挥作战，我在后方作战勤支前工作。

是年八月，毛泽东来电决定要攻打锦州，切断北宁线，

断敌退路，以对东北国民党军造成关门打狗之势。这对于全歼东北国民党军无疑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当时林彪认为东北国民党军主力尚存，对锦州必以死争。因此，对攻打锦州作战颇有犹豫。后经毛泽东一再电促，于九月底才挥师南下北宁线，留下钟伟的第十二纵队（后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四十九军）与地方部队围困长春，由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统一指挥。林彪则以十一个纵队部署锦州战役，其中以五个纵队直接攻打锦州，其余部队兵分两路打援：一路在黑山、大虎山一线打沈阳援锦之敌，一路在塔山、高桥一线打锦西、葫芦岛援锦之敌。当时我正在冀察热辽动员一切力量支援战争。记得我刚到冀察热辽时，人们一度对困难估计得过于严重，甚至害怕战争。经过开会动员，深入作群众工作，干部带头吃粗粮，号召大家节衣缩食，千方百计支援前线作战，结果，士气一鼓起来，一切困难都容易克服了，万众一心，全力以赴支援战争。

十月十五日我军攻克锦州，全歼锦州守敌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下十万余人，范汉杰及敌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等被我生俘。长春守敌在待援、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于十七日率部起义，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被迫放下武器，于十九日率新编第七军等部投诚，长春遂告解放。由沈阳驰援锦州之敌廖耀湘第九兵团十万余人，于二十八日被我军围歼于黑山、大虎山一带，生俘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廖兵团全军覆灭之后，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即逃

离沈阳而躲到北平，沈阳则由敌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率部坚守。我军在消灭了廖兵团之后，乘胜向沈阳逼进。第二纵队在刘震、吴法宪、吴信泉等率领下，与第一纵队一起，很快推进到沈阳城郊。我围困长春的第十二纵队及若干地方独立师亦挥戈南下，迅速完成了对沈阳的包围。第二纵队于十一月一日下午对沈阳守敌发起攻击，于当日下午五时突破敌铁西城防。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沈阳守敌迅速土崩瓦解，于十一月二日全歼周福成以下十三万余人，周福成被我二纵队生俘，解放了东北第一大城市沈阳。辽沈战役遂告胜利结束。

我军解放沈阳后，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总部即迁往沈阳。我接到通知，从热河赶往沈阳开会，并向中央和东北局建议撤销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领导机构，这时中央命令我准备进关接管天津。我从沈阳回到热河，结束了分局和军区的工作后，即入关进行接管天津的工作。至此，我在东北三年多的工作即告结束。

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从苏北转战到东北，辽沈战役胜利之后，又挥师入关，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在战斗的烈火中，部队不断发展壮大。解放战争后期，原新四军第三师的部队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完全是以原新四军第三师部队为基础编成的；第四十三军和第四十四军中各有一个主力师是原新四军第三师部队的基础；第四十九军中也有原新四军第三师的部分干部。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在通辽地区活动时，曾经组建过一些新部队。黑

龙江省独立师、吉江省独立师、辽北省独立师、嫩江省独立师等部队中，都有一批原新四军第三师的干部。

从苏北到东北的转战，直到全国解放，历时四年。对于新四军第三师说来，同兄弟部队一样，这是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四年，是在毛泽东革命军事思想指引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四年。



# 李聚奎回忆录(摘登)

## 平江起义

### 秘密的士兵委员会

我从一九二六年九月参加北伐军后，一直在湖南唐生智部独立第一师（后改番号为独立第五师）一团三营九连当兵。北伐战争刚刚取得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汪精卫就相继叛变革命。这时，我们国民革命军的士兵不仅在政治上受到国民党新军阀的种种压迫，而且由于上峰层层克扣士兵的饷银，生活也十分艰苦。每月不仅没有钱寄回家中供养父母，甚至连买黄烟的钱都没有。一些吸烟的士兵，只好经常利用星期天到公共场所去拣人家丢下的烟头。记得我当时身上有一个小洋铁盒，每个星期天在车站、码头拣到烟头，就装在这个铁盒里。拣满一铁盒，回来后剥出烟丝，卷着纸吸，对付着可以吸几天。有的士兵的父母妻小从老家借钱作路费到队伍来探望，可是回去时，士兵连给买一张车、船票的钱都没有，不得不徒步，甚至要饭回家。士兵们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但由于旧军队

有一套军阀的管理制度，所以，许多人还是敢怒而不敢言。

一九二七年冬，彭德怀被委任为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从彭团长到职后，一团就逐渐发生了变化：团部成立了“救贫会”，秘密进行串连活动；连队成立了“演出队”，演出了一些反对军阀豪绅的“活报剧”；普遍组织了士兵委员会，扩大了士兵的权力。

一九二八年五月，一团驻湖南南县，当时我是九连四班中士班长。有一天，独立第五师师长周磐集合部队训话，他在训话中透露：本师奉命即将开往平江“剿匪”。当时，全团士兵已经连续五个月没有发饷了。大家一听到队伍要开到平江打仗，愤慨的心情再也抑压不住了，就纷纷议论起来。我对平时要好的七班长曾春鉴说：“我们出来当兵，过去说是来革命，为工农服务，打倒军阀和土豪劣绅；可是如今既不讲革命，又不发饷，还要打仗。这种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这时曾春鉴也悄悄地说：“听说一营的班长们都在议论开赴平江打仗的事，并准备起来闹饷，我们九连的班长们是不是也起来响应。”我觉得他的想法很好。于是我们就在本连进行闹饷活动。在旧军队中，士兵闹饷是要“问斩”的。民国九年，湘军中发生过一次大闹饷，带头的人后来都遭到军阀的监禁和枪杀。但这时我一心想闹饷，根本就不去考虑自己身家性命的危险。经过我们的秘密策动，很快全连多数班长就行动起来了。随即，我们九连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成员有我和其他三四个人。连队士兵委员过去有过，那时是公开的，军官士兵一律参加，而这次

我们成立的士兵委员会，是秘密的。新的士兵委员会成立后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全连士兵闹饷，要求上峰按月发给饷银，并补发过去所欠的饷银。理由是当兵的上有父母，下有妻小，要吃饭怎么办？当兵的要穿草鞋、吸黄烟没有钱买怎么办？请长官替我们士兵想一想！

大概在同一个小时，全团大部分连队的班长们也都起来闹饷，并向一些社会团体散发了传单。不久，团部的传令排长张荣生在南县一个文庙里秘密地召开了一次全团中下士代表会议，每连都派代表参加，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张荣生讲了军阀克扣军饷的情况和闹饷的目的及行动计划等。很快闹饷的风潮就遍及全团，并波及全师，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反响。一团闹饷的消息传到在长沙的周磐师长那里，他盛气凌人地说：“发饷是上级的事，爱发就发，不发就不发，不许胡闹。”这一下更把大家激怒了。我们也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发饷就不出发！”全团闹饷的声势越来越大，把周磐闹得惊慌失措。最后，他也只好作了让步，答应以他的名义向当地商会借款给队伍发饷。我们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一天晚上，彭德怀来到三营营部，给全营班长讲了话。他在讲话中首先对我们的闹饷活动表示支持。他说：“你们很久没有发饷了，生活艰苦，现在你们要求发饷，我完全支持。周师长也没有再拒绝了，让我向地方筹款。但是队伍开赴平江的命令已经来了，过两天就出发。他们答应把钱筹集后送到湘阴，待队伍到达湘阴，每人先发一点钱。”他的话音刚落，十连一个姓王的班长提出：“如果在南县不

发饷，我们还是不走。”根据当时的情况，这样做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对斗争是极其不利的。彭团长令他站出来，严肃地说：“大家要听招呼，你们知道，闹饷是要枪毙的。现在第八军来接防的队伍离南县只有六十里了，南县四周都是水，你往哪里跑？所以，命令要执行，不能把要求发饷作为执行命令的条件。”当时，我还不晓得他对士兵们闹饷是真支持还是假支持。现在见他这样讲，心里顿时紧张起来，觉得情况不妙，怕他惩办这个班长，就急忙向紧挨我站着的六班长小声说：“你们是同乡，你出来说几句取保的话吧。”他马上站出来说：“报告团长，王班长的话不对，我们要求团长原谅他。”团长当即面露笑容，让他站回队伍里去，并和气地说：“大家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到了平江以后，本团长自然要给你们想个办法；大后天出发时要执行命令，不准离开队伍。”听了彭团长这些话，我紧张的心情才缓和了下来。

第二天，我和其他连的班长个别串连了一下，认为虽然要求发饷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昨晚团长的讲话给了一点希望。大家说，团长历来讲话是算数的，队伍出发不能违令不走。就这样，队伍于五月底离开南县，乘船横渡洞庭湖。到湘阴上岸后，每人预支了一块钱。六月初，队伍到达了平江县城。

## “刑 场 练 兵”

南县闹饷，经过彭团长的解释说服，到湘阴时每人又



发了一点钱，大家的情绪虽然有所缓和，但由于问题远没有解决，所以队伍开到平江以后，全团中下士班长继续串连，进行闹饷活动。不同的是，这时的闹饷已经由原来的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了。

平江是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的地方。县城位于巍峨苍翠的幕阜山下，奔腾不息的汨罗江从城南流过，然后扭头向西，注入洞庭湖。自然景色很秀丽。但是我们进入平江城里时，见到的却是一片萧条的景象，商店的门半开半掩，街上行人来往匆匆，三三两两的保安队，端着枪走来走去。全城充满着一种临危的气氛。我们一到，伪县长领着一群绅士们就迎了上来，说了不少“贵军到此，一县之光”一类的奉承话。接着又是送猪送羊，大行“慰劳”。可以看出，他们是把我们当成最可靠的“保护者”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平江县的老爷们对我们大献殷勤，是别有原因的。平江县在大革命时期，就是湖南全省最有名的革命地区之一。早在一九二六年夏天，北伐军出广东韶关时，中共湖南省委就派罗纳川等到平浏地区从事革命活动，迎接北伐军。这年八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进攻平江时，当地农民自动参战，其声势和规模为全省之冠。但是，从宁汉合流，国共分家以后，特别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就向平江的工农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为了反击反动派的大屠杀，以罗纳川为首的平江县委，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即我们到达平江的前三个月，曾组织数万武装农民举行过一次“扑城”运动。但由于缺乏经验、指挥不当而失败了。农民

“扑城”失败以后，湖南反动当局派来了清剿司令阎仲儒和伪县长刘作柱，他们收买千余地痞流氓组成清乡队，经常下乡残杀群众，抢掠财物，企图“斩草除根”。在他们眼里几乎是“无农不暴，无工不匪”，城里的三座监狱都关满着工农群众。但是，四乡的农民游击队仍经常出没，打击敌人。

我们第一团到达平江后，团部驻城里，一营驻城东天岳书院，二营驻离平江城五十里的思村，三营驻城北关，我们九连驻在北门外的一个龙王庙里，这个庙很大，三营十连也驻在里面。离龙王庙大约有几百米的地方，有一个柘树坪广场。在我们刚驻下的头几天里，保安队天天在这里杀“犯人”，一次杀十来个，有时几十个。开始我们觉得杀“犯人”是地方政府的事。后来我们见到被杀的都是一些衣衫褴褛的农民和学生模样的年青人，他们在临刑前，有的还喊着“打倒新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见我们从旁边路过时，则大声呼喊：“革命的兵友们，快来救救我们吧！”这就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大家纷纷议论起来：平江怎么有这么多的“犯人”？杀的不都是些农民和学生吗？那几天，彭德怀经常下连找士兵谈话，启发大家的政治觉悟。有一天，彭德怀到我们连，他问：你们的连长、排长打不打人？你们寄钱回家没有？你们这个星期打牙祭（会餐）没有？还问：土豪劣绅好不好？资本家好不好？军阀好不好？开始问这些话，除属于日常生活的有人回答外，对其它的谁也不敢回答，只是说不知道。团长走了以后，士兵就议论起来：为什么团长问这些事？有的士兵说，团长以上的军官本身就是军阀，家里也说不定

是土豪劣绅、资本家，可不能乱讲；团长是来试探的，要是讲错了，“一打二革三扣饷”，不杀头也会把你送去坐牢。彭德怀察觉到士兵的顾虑，以后来时，他就直接了当表示他对军阀、土豪劣绅的态度。他说：“土豪劣绅、资本家都是压迫剥削工人农民的寄生虫，军阀是抢地盘、杀百姓、喝兵血的野兽，都不是好东西。我们当兵的是土豪劣绅、资本家的看门狗。”还说：“我们奉命来此‘剿匪’，其实这里的人不是土匪，全是劳苦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就象你们家乡的父老兄弟一样，苦日子过不下去了，反起来了……”彭德怀走后，我们士兵委员会组织大家发言谈感想，连长黄纯一也参加了。大家纷纷讲起愤恨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派的话来了，越谈越气愤，情绪很激昂。黄连长看到大家发言很热烈，一再鼓励大家说：“讲得好！讲得好！”这样，我们的斗争目标，就由反对克扣军饷，逐步扩大到反对土豪劣绅和他们的清乡队了。

有一天，我们连里的采买买菜回来路过柘树坪，见到几个刽子手带着马刀在铺子里喝酒，并听说有四十名男女共产党今天要在柘树坪杀头，就赶回来报告黄连长。黄连长正在讲课，听了报告后，立即要值星班长到柘树坪去阻止。那天正是我值星，我马上跑步赶到柘树坪。见到店里有四个人正在喝酒，桌子上放着铮亮的马刀。我压住心头的怒火，向他们行个军礼说：“老兄弟，这里是我们队伍出操的地方，请你们不要在这里杀人。”但他们却说：“这是上司的命令，我们是雷公神，天老爷让打谁就打谁。”我想，这些人都是刽子手，同他们讲只是对牛弹琴，交涉下去只

会耽误时间，就立即跑步回连报告黄连长。连长马上停止讲课，带着全副武装的队伍赶到柘树坪操场。到了操场之后，把队伍分成五人一班，把整个操场占满了。队伍刚刚摆开，清乡队约一个排押着几十名“犯人”也来到了。这时黄连长站在队伍前面，提高嗓门对他们说：“这是我们的操场，不准你们在这里杀人。如果你们不立即离开，老子就要开枪了。”那时，因为我们是正规军，他们是民团，不敢和我们对抗。只好把“犯人”押回去。当天夜里，我们又贴出了“打倒屠杀工农、学生的土豪劣绅”的标语，煞了他们的反动气焰。从此，当地反动政府再也不敢在柘树坪这个地方杀人了。以后，他们又把“犯人”拉到东门外去杀，驻在那里的一营，也仿效我们的办法。每次见到保安队要在那里杀人，就立即吹起出操号，借口队伍要出操，喝令他们离开。这种用“刑场练兵”的办法来阻挡反动政府屠杀革命人民，是我们在当时的条件下所能采取的办法。

## 暴 动 前 夕

独立第五师这次开到平江，是奉湖南清乡督办署的命令来接替阎仲儒旅的防务，进行“剿匪”、“清乡”的。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万万没有料到，这里竟成了继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威声寒敌胆”的地方。

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到了平江以后，靠毛泽东所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近了，这里又有深厚的革命群众基础，但是，当时一团党的力量比较薄弱。全团包括彭德怀在内，只有



八、九名党员；其中直接掌握战斗连队的党员也只有两名，一是一营二连连长李灿，一是我们三营九连连长黄纯一。而平江地区的反动军警，除民团外，还有独立五师的第二团和第三团及师部的政训队，敌我力量悬殊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举行起义，除了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识之外，还要有缜密的计划和巧妙的安排。

为了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首要的是迷惑和稳住敌人。那时，我们经常见到彭德怀团长出入县政府。伪县长和当地士绅也常到团部“拜访”彭团长，双方打得“火热”。后来我们才知道，彭德怀除了不得不敷衍他们对下乡“剿匪”的请求之外，还不时的揭露他们残杀群众的行为。有一次，彭德怀团长当面质问伪县长：“你口口声声说平江的‘匪情’严重，可是这么多的‘土匪’哪里来的？你们的民团清乡队，到处捉鸡杀猪牵牛，随便杀人放火，官逼民反嘛！你作为县长能辞其责吗？！”弄得伪县长和土豪劣绅们张口结舌，有嘴难辩，狼狈不堪。当时，他们对彭德怀这个人，可以说是既失望又抱希望：失望的是彭团长虽然答应“剿匪”、“清乡”，但始终按兵不动；抱希望的是一团是湖南当局派来的正规部队，在他们眼里当然是唯一的“靠山”了。

说起一团下乡“剿匪”，其情形也很特别。一团驻平江近两个月，一营和三营始终以警备县城、保护县政府为借口，一次也没有到过城外。二营驻在思村，倒是出去过一两次，但是彭团长早就向部队交待：此地的游击队不是土匪，而是农民；如果他们来骚扰，不要开枪，叫他们回去，彼此

互不扰乱。彭德怀所带领的这支队伍，是经过大革命时期的洗礼的，士兵也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其中有不少人是湖南各县被反动派追捕的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所以，大家很乐意和农民游击队保持这种关系。因此他们外出“清剿”时，总是无目标地朝天放枪，并丢下一些子弹。开始地方党的组织还认为是国民党的军队子弹多，士兵背不动而丢掉的呢！这样，一团在平江与其说是“清剿共产党”，不如说是直接帮助游击队壮大力量；游击队不但没有因我们的“清剿”而削弱，反而一天天发展起来，后来成为起义的一股力量。可是在“文革”期间，有人竟写文章说什么“彭德怀在平江清乡杀害了农民，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彭德怀回答得好：这不是侮辱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侮辱平江起义，侮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一团党的组织，为了团结全团广大官兵，还着手对这支旧军队进行了一些改造工作。队伍一到平江，彭德怀就下令取消军官的小厨房。原来连队设有小厨房，就餐人员除连、排长之外，还有司务长和军需、文书、上士，每餐四菜一汤。他们吃的喝的，都是从士兵的大厨房剥削来的。这时当众宣布取消了，官兵同吃一样的饭菜。我们士兵的伙食也随之有所改善，很受大家的欢迎。同时，还取消了军官手里打人的鞭子。过去连、排长带部队出操上课，每人手里总是拿着一根皮鞭子，动不动就挥起打士兵。一团当时这一些进步，虽然还不是根本的改造，但是在士兵们的眼里，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大家正是从这些实际行动中来衡量自己的长官是好还是孬的。我们连长黄纯一，所以到

连队任职时间不长就很快取得全连的士兵的信赖和爱戴，并在平江起义中，他指到那里，士兵们就打到那里，使九连成为一团在政治上较强的一个连队，这和他在连队处处与士兵同甘共苦，上下级打成一片，有很大的关系。

平江起义最后还是借闹饷的名义发动起来的。当时所以采用闹饷的办法搞起义，是因为闹饷对内可以充分发动全体士兵，培养骨干分子；对外可以蒙住敌人眼睛，给敌人造成错觉。大概在七月初，一团党的组织再次发动各连的士兵委员会进行闹饷活动。这次闹饷同南县闹饷有很大的不同，南县闹饷是以经济为目标的，而平江闹饷是直接为了暴动的；南县闹饷在很大的程度是带有自发性的，平江闹饷则是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同时这次闹饷比起南县那一次来规模更大，因为到平江又有两个月没有发饷了，闹饷的理由更充足了，更能发动群众了。但当时的士兵委员会是党的外围组织，一团又处于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因此党的意图还不能完全讲明。而我对许多人包括对连长黄纯一在内也还不完全摸底，这样，我们的闹饷活动仍然是处于半公开的状态。谁是带头人，那更是完全保密的。这样，在闹饷中，彼此就免不了有些戒心。记得还出现过一点小误会。那是七月中旬的事，一天夜里十二时左右，我正在睡梦中，突然连长的勤务兵来叫我到连部去，说是黄连长有事找我。我心想连长半夜找我，恐怕是因为我带头闹饷的事情暴露了，一时心里很紧张。勤务兵见我磨磨蹭蹭，催促说：“李班长，快走吧，他们几个在等你。”我一听他们几个在等我，内心更有点紧张了。心里想，如果事

情败露了，就不能坐以待毙，得想法逃到乡下的游击队那里去。我随着勤务兵到了连长房里，见在座的除连长外，还有同我在一起搞闹饷活动的二、三、六、七、九班的班长，都在喝酒吃花生。见此情景，心里平静了一点。我一进门，黄连长马上就说：“李军士，听说你在带头闹饷？”我愣了一下，正想如何回答好。不料机灵活泼的九班长何静安一嘴插上，代我作了答复：“是的，我们连上是李班长负责。”连长听了点头说：“很好”。随后他又说：“闹饷我也来，听说二连连长李灿是全团闹饷的代表，彭团长也赞成。不过，军队里闹饷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因此，要有计划，有组织，要保守秘密，严守纪律，不是心腹之人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行动。你们几个人有决心闹饷，就要同心协力，言行一致。”他最后又说：“我提议，我们连里就由李军士作为代表，以便和二连李连长联系，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可以负责转达给他，以后你们就可以直接得到他的指示了。”当时，大家都同意连长的提议。这一晚，我们就这样一边喝酒一边细细地交谈了闹饷的问题，一直到天快亮时才散开。从这次和黄连长的长时间接触中，我隐约的感到，这次全团组织闹饷，除了要解决经济问题之外，还要解决比经济更为重要的问题。由于当时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故又不便问明。但我从当了连里闹饷的代表以后，在黄连长的支持下，活动更积极了，不仅在本连活动，有时还到其它连去活动，并经常把活动情况向二连李连长报告。那时，我心里经常暗暗地想：现在是快要实现彭团长在南县讲的“到了平江以后团长自然给你们想个办法”的



时候了。而且估计时间不会太长，很可能就在最近时期内。

就在我们闹饷活动达到高潮的时候，黄连长突然“病”了。一天下午，我到黄连长的住处去找他，发现屋里有一个陌生人，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滕代远。滕代远是两天前化装成富商模样，穿着长袍坐着轿子进城的（当时平江等地，只有有钱有势的人，才能坐轿子，坐轿子进城照例是不受检查的）。当时他是以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平浏地区巡视工作，这次来到第一团，带来了湖南省委的指示，沟通了一团和平江党组织的联系，商定了起义的时间和行动计划。

这个时候，一方面，一团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紧张的进行；另一方面，伪政府的官员和土豪劣绅们仍然在做着他们的好梦，根本没有想到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在这个小小的山城很快就要爆发了。

## 暴 动 成 功 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黄纯一把我们积极参加闹饷的六个班长找去，对我们说：“暴动的命令来了，就在今天下午一点钟开始行动。”他一边从军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一边继续说：“这是团部刚才派人送来的信。”我们几个人互相把信传阅了一遍。信中规定了我们九连这次行动的任务，信末署着团长彭德怀的名字并盖着官衔。举

行暴动的消息对我们来说，虽然是在意料之中，但也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一时大家都很兴奋。随即大家研究了全连人员的情况和本连的战斗任务。在研究全连的情况时，大家认为，兵士们的信仰是坚定的，对长期不发饷积怒已久，完全可以做到一呼百应。但是对三个排长和司务长的态度还不十分清楚，而他们的表现如何，关系不小。大家共同的意见是把他们找来，当面向他们宣布彭团长的命令，如果他们赞成，就允许他们参加；如果他们反对，就把他们暂时扣留起来，待暴动以后再放他们走。决定之后，我们作了点准备，就让勤务兵把他们找到一起，由黄连长简要地向他们说明了为什么要举行暴动，同时把团长的命令向他们宣布了。这时，除司务长的态度不够坚决外，三个排长都激动地说：你们干的事我们完全赞成，可惜你们没有早告诉我们。我们感到他们的态度是真诚的，也就松了一口气。随后我们一起分析了形势，研究了九连的任务。当时平江城反动势力主要有两股：一股是师部政训处及其特务连；另一股是伪县政府及其保安队。至于独立第五师的第二团、第三团，都驻在离我们五六十里以外，一时不可能对我们构成威胁。当时，团里把解决县政府及其保安队的任务交给一营二连完成，我们连的任务是解决师政训处及其特务连。大家说，师政训处和特务连，是平江县城的一个大钉子，如果不能顺利地拔掉这个钉子，就会影响整个行动，必须坚决把它拿下来。最后我们查看了平江县的地图，规定了行进的路线和攻击的位置，就分头到各班向士兵们口头传达任务，要求全副武装待命出发。

同时，在驻地周围加岗加哨，禁止人员出入，防止走漏消息。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万里无云，烈日当空。随着紧急集合号音的响起，全连官兵个个精神抖擞迅速来到连部门口集合。黄连长给大家作了简要的动员，他说：“同志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饷了，劳苦终日，连吸烟的钱都没有，生活很苦；大家经常说要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今天，我们就要到城里去捉那些克扣军饷的军官，打倒土豪劣绅，救穷苦的工农大众，大家赞成不赞成？”黄连长的话音刚落，士兵们欢声雷动，个个喜形于色。黄连长立即下令：“大家装好子弹，马上跑步出发。”

师政训处和特务连，当时驻在福音堂的大院子里。下午一时，我们九连到达福音堂后面的小山坡上。连长当即布置：二排插到福音堂的大门口，把门堵住，不准政训处的人和特务连的人跑出来。三排在山坡上掩护，如果特务连敢抵抗的话，就冲下去消灭他们。接着，我们二排排长何桂安对我说：“李班长，你们四班由这条小路子下去，直接堵住特务连的大门口，并将卫兵的枪缴了。我带五、六班占领门前五十公尺处的小土堆掩护你们。”说完，我带着全班冲到大门口，首先把卫兵的枪缴了。当时正是部队午睡时间，特务连的官兵和政训处的人员都在屋里休息，对我们的行动丝毫没有发觉。待我们进入院子里时，才见到特务连的一个排长背着值星带子走了出来。这个排长原来在我们连上当过见习官，他认得我。一见我们就问道：“李军士，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见习官，今天对不起，我

们全团暴动闹饷，你们赶快把枪放下，人都徒手出来，如若不然，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他一听是暴动闹饷，就笑嘻嘻地说：“千万不要误会，闹饷我们也参加。”我说：“那好！欢迎你们参加！”这样，特务连的官兵都以为只是士兵们的一次闹饷风潮，都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并协助我们把政训处解决了。当时除政训处处长外出漏网外，其余的军官全被我们扣留了。前后不到一小时，我们九连就拔掉了平江县反动势力的一个大钉子。任务完成后，黄连长集合全连宣布纪律：缴获的东西要交公，不准私拿，违者要军法从事，就地正法。

一营二连拔掉伪县政府及其保安队这个大钉子进行也很顺利。听说他们在出发前，彭德怀亲自给全体官兵讲了话，并带头系上了鲜红的标带。该连把队伍分为两队，一队人马扑向伪县政府。县政府内伪县长刘作柱正在宴客，土豪劣绅挤满一堂，见队伍象从天而降的神兵一样，吓得面如土色。士兵们解开腰里缠着的麻绳，把他们一个个地捆绑起来。这时彭德怀同志也赶到了。他们见到彭团长，以为是“救星”来了，都说：“彭团长，这是怎么回事，你要管束你们的士兵呀！”彭德怀同志当即宣布他们的罪恶，并说：“今天是由士兵来管束你们，你们的末日到来了！”。另外一队人马冲向保安队，喊声震天，正在午睡的保安队，吓得丢枪乱窜，当即收缴他们的长短枪八百多条，并将全部保安队员集中在一个大庙里，向他们宣传起义的目的和苏维埃的主张。

与此同时，起义部队打开牢房，把那里关着的八百多



名革命群众都放了出来。这些工农群众原来随时都可能遭到杀头，现在重新获得自由，其欢乐的情形，难以言状。他们有的抱着起义战士欢呼跳跃，有的含着泪水拉着起义战士哽咽难语，有的要求马上参加队伍。全城红旗飘扬，标语、传单满街都是，真是人人高兴，个个喜气洋洋。

短短两个小时，未放一枪，未死伤一人，起义部队就把全城反动武装摧垮了，把反动的统治机器砸烂了，暴动成功了！平江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大家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革命的威力大无穷。

参加此次平江起义的部队除第一团外，还有师随营学校和第三团三营。师随营学校当时驻在岳州，共产党员贺国中是该校的代理校长。为了使随营学校能及时来到平江参加暴动，彭德怀向周磐写了个报告，建议：“一团全部下乡剿匪，守城任务由师随营学校来担任。”并建议：“师参谋长随随营学校前来，一方面可以督促部队剿匪，一方面可以主持随营学校的训练。”这是彭德怀给周磐和师参谋长的一副麻醉剂。周磐中计，贺国中按照彭德怀事前的秘密通知，带着随营学校的全体学员开来平江。原来预计可以在起义前赶到，但因过汨罗江时耽误了时间，故于二十三日才抵平江城和我们起义部队会合。第三团三营驻在平江县属的嘉义镇。共产党员黄公略任该营营长。当时他到职时间不到一个月，因时间短，情况不熟，工作来不及展开，故未完全取得士兵们的信任。在接到彭德怀关于举行起义的通知以后，黄公略就以惊人的胆略，利用当时全营士兵对上级长期克扣军饷的积怨情绪，把自己的钱全部拿出来分

给士兵，并借机宣传当地豪绅如何不筹款，上级又如何克扣军饷等。然后向士兵宣布，我的钱都发给你们了，以后怎么办，你们自己掌握。从而，把全营士兵都鼓动起来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完全听黄营长的，黄营长走到那里我们跟到那里。七月二十一日，黄公略杀了反动的第十连连长和在该营的三团团长刘济人的侄儿，率领全营宣布武装起义。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他把队伍带到平江城北约五里处的一个名叫暹江的小镇休息，自己单身到城里和彭德怀、滕代远联系。可是，第三团三营毕竟平时基础差，结果在黄公略进城后，该营受第九连连长的欺骗，大部分叛变逃走了，只留下少部分比较坚定的同志入城和起义部队会合。

平江暴动成功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四面八方。七月二十四日，地方游击队和四乡的农民，扛着梭标、举着红旗，象潮水似地涌向月池塘广场。几万军民在这里一起召开了盛大的庆祝大会。会上彭德怀和滕代远讲了话，宣布平江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成立，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军代表（即党代表，因当时党还没有公开，故称为军代表）。原来一团一、二、三营，改为红军第十三师的一、四、七团，共二千多人。彭德怀兼任师长。我们三营改为第七团，黄纯一担任团长，贺国中担任团代表。接着，临时革命法庭公审了伪县长刘作柱和一批土豪劣绅，宣布了他们的罪恶，并立即处决。处决这批长期骑在平江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革命分子，是由我们连执行的，地点就在他们过去枪杀

工农群众和共产党员的柘树坪。曾几何时，这里还是反革命杀人的场所，现在已变为为革命人民伸张正义的地方了。这一天，我和大家都为自己能够亲手替工农群众报仇雪恨感到无比的痛快。同时，也深深感到掌握枪杆子、印把子是何等的重要。

## 暴 动 之 后

平江暴动后，红五军党委和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联合颁发了施政纲领。这个纲领除了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打倒一切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之外，还规定了军队废除打骂，实行经济公开和官兵平等的制度。

根据纲领的精神，部队在起义之后，迅速建立各种组织，并民主选举了初级军官。我记得在起义的第二天，我们九连就在黄纯一的主持下（此时他已是七团团长），召开了全连军人大会，民主选举军官（当时没有干部这个词）。那天会场中间摆着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选举箱（一个糊着红纸的大竹筒）。首先，黄纯一简要地说明了由士兵选举军官的意义和办法，他说：“从现在起，我们军队再也不是地主资本家的看门狗了，而是工人农民的革命军队了。因此，我们必须用崭新的民主制度来代替旧军队的军阀制度，今天开会由大家民主选举连、排长，就是实行这种制度的开始。”当他宣布：“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大家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我们九连起义后的第一任连、排长。

我们二排排长何桂安当选为连长，我和七班长曾春鉴，六班长李楚南被选为排长。历来的军队军官都实行委任制，民主选举军官是破天荒第一回。当时这样做，目的在于发动士兵清洗不可靠的军官。这不仅对于巩固刚刚起义的部队有好处，而且对于破除旧军队的军阀制度，建立新军队的民主制度，树立士兵们的主人翁思想，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全团这次被选掉的军官和一些不可靠的分子，除个别极端反动者外，后来都被资遣礼送出境。这种作法很得人心。

紧接着，起义部队吸收了闹饷和暴动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壮大党的组织。我就是起义后第一批入党的党员之一。

那是在起义的几天以后，刚由师随营学校分配到我连工作不久的宣传员潘泗滨来找我，对我说：“团代表贺国中今晚有事要和你谈。”晚饭后，潘泗滨就领我到了贺国中的住处。当时部队驻在平江城东北约一百三十里的龙门厂，我们俩到了贺国中的住处时，天已经黑了，而贺国中的屋里也没有点灯，映着月光，隐约可见贺代表坐在一个小桌旁。我们俩到后，潘泗滨首先向贺国中介绍我的表现和对共产党认识的情况。他讲得很认真，很详细，连我家里都有什么人，怎么当的兵，怎么带头闹饷的都清清楚楚。到这时，我才知道潘泗滨是共产党员，他所谈的这些情况，都是在平时和我们“摆龙门阵”时了解到的。他一边说，贺国中就一边问我他讲的对不对。接着，就举行入党仪式（当时叫入学式），由贺国中领念誓词，由于没有灯看不见，



潘泗滨就划着火柴照亮，贺国中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接连划了几根火柴才把誓词念完。因年代长了，誓词的全文记不清了。但其中“服从组织，保守秘密，遵守纪律，革命到底，永不叛党”的话，我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仪式结束后，贺国中站起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好！我们走到一起来了！今后都是同志了！”我和潘泗滨从贺代表的房子出来已经是半夜了。野外一片寂静，我借着月光，沿着崎岖的小路向驻地走去。我的心亮堂堂，热乎乎的。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和最激动的时刻。我将从事一件最光荣最伟大的事业了！我和彭德怀、贺国中、黄纯一等这些优秀的人站在一起了！我想着这一些，脚底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那时，党是绝对秘密的，每个党员都是个人单线联系，没有横的组织关系。我入党后，经常与我谈党的工作的是潘泗滨。贺国中也与我谈过话，因他在团部，谈话次数就少一些。记得军的党代表滕代远还给我们作过两次政治报告，讲了国内形势和我们红军的任务。在部队上井冈山之前，我还记得在战斗的空隙中开过两次小组会。其中一次是在万载大桥战斗失利后召开的。这一仗部队损失很大，逃亡的人很多，如何巩固这支刚刚诞生的革命军队是摆在当时党组织面前一个重大的问题，因此，在党小组会上贺国中首先提出：“万一部队打散了，我们党员也不能散，在任何情况下党员都要团结在一起。”他讲完后见大家一时没有吭声，就用试探的口气说：“我们是不是也来喝一杯血酒，此后谁也不能离开队伍、叛变革命。”听了他这些感人肺腑

的话，大家都很激动。我说：“我这一辈子跟党是跟定了，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至于喝血酒，那是封建迷信的东西，我们是共产党，就不用了吧！”贺国中听了特别高兴，连声说：“讲得对！讲得对！”不久，我们连又接受了一些同志入党，连里就单独组成了党小组，组长是潘泗滨。一九二八年底，部队上井冈山以后，我们连（当时已改为大队）由红四军调来了朱义敏任党代表。他来后进行了党员登记，组成了支部，朱义敏任支部书记，这时，党组织在部队中才开始公开。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时入党的情景仿佛就在我眼前。特别是那严肃、庄重的入党仪式，更使我终生难忘。“文革”期间，邱会作一伙竟诬陷我是假党员，他们为了达到打倒我的目的，甚至连我的入党介绍人、平江暴动的领导者之一贺国中也说他不一定是共产党员。然而，事实就是事实，历史毕竟是历史，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

## 留 守 井 冈 山

### 千 里 转 战

平江暴动成功了，红五军和地方苏维埃政府诞生了，世世代代当牛做马的劳苦大众，如今有了自己的军队，有了自己的政府。影响所及，浏阳、醴陵、岳阳、通城、通山、修水、铜鼓、万载等县，也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

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运动。这个地区的革命风暴，威胁着长沙、武汉、南昌，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为了扑灭这团熊熊烈火，湖南反动当局慌忙调集了八个团，直向平江扑来。他们以六个团的兵力围攻平江城，以两个团的兵力直插长寿街，堵击我军退路，妄图一举消灭我们。当时，我们想利用平江城及其附近的有利地形，消灭一部分来犯之敌，以提高红军的声威，再行撤出平江县。因之，把第一团布置在城周围，正面迎敌；把第四团、第七团分别布置在城南城北各三十里处，两面夹攻。七月二十九日晨，战斗打响。围城之敌猛攻我第一团阵地，被我杀伤三百余人。位于城北的我们第七团，在黄纯一、贺国中的带领下，从敌侧后出击，又歼敌二百余人，双方激战一天，打成相持局面。因敌我力量悬殊，久战于我不利。到黄昏时刻，彭德怀果断下令一、七团撤出战斗（四团在敌进攻之前一天已去浏阳）。此役红五军伤亡一百余人，第七团团长黄纯一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黄纯一是我在国民革命军当兵一年零十个月中最后的一位连长，也是和我朝夕相处、给我以直接革命教育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他外表像个文雅的书生，但性格刚毅、遇事沉着果断，作战勇敢，对士兵胜似手足，对革命忠贞不二，想不到竟出师未捷身先死，在首次战斗中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长期以来，我每想及此，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七月三十日，我们在悲壮的气氛中掩埋了同志的尸体，告别了红色的平江城，向黄金洞方向转移。从此，开始了

频繁的游击战。

八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制订了湘鄂赣三省的“会剿”计划。随后进攻红五军之敌增至十五个团之多。那时国民党把彭德怀、黄公略与朱德、毛泽东诬为“四大匪首”，可见敌对我平江起义之恐惧与重视。此时，红五军一边迎敌一边转移，于八月上旬进占修水。九月初，我军占领铜鼓。敌人继续进攻，我军向万载大桥转移，遭敌张辉瓒三个团的突然袭击，损失较大。部队撤回平、浏一带活动，又遭湘赣两省白军夹击，我军即向鄂南之通城、通山、九宫山等地区转移，所到之处，消灭民团、警察，捣毁县、区政府，杀反动派，散发财物，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部队在九宫山休整时，将原来的三个团缩编为五个大队，贺国中任第三大队大队长，我任中队长。

从平江到九宫山近两个月的转战中，我军屡遭敌人前阻后追，几乎每天都要与国民党正规军和地主武装奋战数次方能前进。我记得最多的一天打过八仗。其战斗之艰苦激烈可想而知。在频繁的战斗中，许多优秀的革命同志光荣地倒下去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也有些人经不起革命严峻时刻的考验，临阵脱逃或叛变投敌。甚至还发生过一大队大队长雷振辉企图凶杀彭德怀的叛变事件。那是在队伍缩编为五个大队后不几天，我们行军来到一个叫白沙的地方。当天晚上，四大队的大队长李玉华伙同一大队的大队长雷振辉，企图带队伍叛变。夜里，李玉华借口放连哨，把队伍带跑了。此时，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邓萍、贺国中等当即商议，决定把雷振辉监视起来。第二天



早晨，队伍集合出发时，彭德怀在队前讲话，不料雷突然伸手抢夺警卫员张子久手里的驳壳枪，企图枪杀彭德怀。张子久和雷振辉抱打在一起。雷个高身大，张子久敌不过他。这时我正站在队伍前边，一个箭步上前将雷抱住，并把他甩倒在地，黄云桥赶来，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事情发生后，彭德怀仍照常讲话，在讲话中，他没有提到刚刚发生的事情，却向大家简要地总结了这一段转战的情况。他说，在一个多月的转战中，由于敌强我弱，队伍损失很大，但我们也取得了初步的经验，就是必须同敌人打圈子、打推磨仗，尽量避免同敌人硬打硬拼，有了这一条，我们就能把敌拖垮并战胜他们。现在部队的数量虽然减少了，但政治质量提高了。共产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的。讲着讲着，他袖子一卷，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起义是为了干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吃苦、怕流血牺牲，如果谁还想走，可以走。但就我个人来说，我认定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就是剩下我一个人，爬山越岭也要走到底。”大家从他那坚定的目光和斩钉截铁的语言中，感受到一股巨大的鼓舞力量。事隔很久，彭德怀在和我们的一次谈话中，才感慨地谈到雷振辉企图行凶叛变这件事。他说，雷振辉是我在一团一营当营长时的老连长，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没想到他能干出那样的事情。看来，要在一起干革命，光靠个人感情、私人关系不行，必须靠政治觉悟，靠共同信仰，才能百折不回，团结革命到底。

## 宁 冈 会 师

十一月下旬，起义部队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向井冈山进发。这时，红五军已将原来的五个大队合编为三个纵队。其中，第二纵队由黄公略带领，在平浏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第一、第三纵队是红五军的主力，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奔赴井冈山。这时，我在第三纵队九大队任中队长。红五军的第一、第三纵队在第二纵队的掩护下，甩掉了“追剿”的敌人，向南进军。一路上，势如破竹，军威大震。在渣津还消灭了朱培德的一个整营。途经万载城时，又消灭了驻在该城的地主武装数百人，缴获甚多。为了尽量多带一些生活必需品，部队把缴获的布匹，发给每人一卷。行军中，有的把布打在背包里，有的像少数民族的包巾一样，缠在头上，带上井冈山。部队到达莲花城北四十里处时，红四军特务营在何长工、毕占云的率领下由宁冈县也来到了。这是毛泽东、朱德得知红五军向井冈山开进后，特地派何长工、毕占云下山来接应的，大家相见无比高兴。所到之处，人民群众像接亲人一样，把我们迎进了自己的家门。早在平江起义不久，彭德怀就常常给我们讲，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是红五军的榜样；任凭敌人多少次的围攻清剿，工农武装割据坚如磐石。当时，我们对彭德怀这些话，半信半疑，现在见到了红四军的队伍，接触了根据地的群众，心里的疑问都消失了，一切是那么的鲜、亲切、温暖。

大家经过几个月的辗转苦战，想到很快就要和毛泽东、朱德所领导的红四军会师了，心情更是无法平静。

十二月八日，部队到达茅坪。第二天一早，朱德在彭德怀、滕代远陪同下来到我们驻地。那时我们这支队伍，大部分还是国民革命军的老兵，听说红四军的朱德军长来了，认为一军之长，一定是穿得很好。可是朱德却是上穿一件黑棉袄，下穿一条黄裤子，头戴一顶八角帽。队伍一集合，彭德怀向大家介绍说：这是红军第四军的朱军长，欢迎朱军长给我们讲话。大家一边鼓掌，一边笑了起来。心想，军长就是这个样子啊！朱德马上明白了大家笑的是什么的。他说：同志们不要笑，无产阶级的军长就是这个样子的，革命总是要经过一个艰苦的阶段，不经过一个艰苦奋斗的阶段，革命就不能成功。接着，他讲了形势、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等问题。这是朱德第一次给我们讲话，他那乐观、慈爱的笑容，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随后部队开出茅坪，去宁冈县新城参加会师大会。路上，遇到了红四军的队伍，我们就在路边的田里集合，让红四军先走。这时，毛主席来了。彭德怀说，大家等一下，请毛委员给我们讲话。毛主席身穿一套中山服，没有戴帽子。他一面讲话一面抽烟，走过来、走过去，讲了很多革命道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讲的工农兵联合起来打遍天下的道理。他讲：工农兵弟兄三个，工人是大哥，农民是二哥，兵士是三哥。工农兵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地主资本家是少数，掌权的军阀也是少数。他提问地说：多数人打少数人，谁能打得赢啊？当然是多数人打得赢；

三个人打一个人，谁能打得赢？那当然是三个人打得赢。所以工农兵联合起来，打遍天下。那时，我们听了这些话，启发很大，因为我们是农民出身，懂得的道理不多。

会师大会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宁冈县新城的广场上召开的。这天新城内外到处贴着“欢迎红五军！”、“欢迎彭军长！”、“庆祝两军胜利会师！”的标语。红四军、红五军的全体官兵及周围群众一万多人，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会场。会场的台子是临时用麻绳把木头捆起来搭成的，比较简陋，毛委员、朱军长等领导同志上去后，台子就垮下来了。那时，部队里有些老兵，还讲迷信，譬如部队出发，旗子没有掌好，倒下来了，非把掌旗的打顿屁股不可，取个吉祥。今天台子垮了，有的人就议论开了：“哎呀，这可不吉利呀，今天会师就垮台了。”这话大概让朱军长听到了。台子重新搭好后，朱德跑上台去，笑着对大伙说：“同志们！你们不要迷信，这个台子是用绳子捆的，因为没有捆好，所以垮了。但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台子是永远也垮不了的。”

会上，毛泽东讲了话，他高兴地说：今天我们红四军、红五军胜利地会师了，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力量更加强大了，将来，我们会有更多的红军、更多的根据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全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接着，朱军长、彭军长、滕党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两军会师以后，不几天红五军就上了井冈山。



## 激 战 井 冈 山

当时，湘赣两省军阀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已彻底失败，他们正纠集兵力，准备进行第三次更大规模的“会剿”。根据前委决定，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下山，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以牵制和消灭敌人。

留在井冈山的红五军，为两个纵队，分一、十、八、九四个大队。我当时在九大队三中队当中队长。我记得这四个大队也就是五、六百人，四百多支枪，每支枪只有十几发子弹，仅有几挺重机枪，还是水机关（枪筒子要装上水才能打）。此外，有红四军新收编的王佐、袁文才驻守在山上的部队，还有红四军后方留守人员，但大多是伤病员和兵工厂人员，山上总共也就是一千余人。而敌人却集中了二十个团的兵力，把井冈山团团围住，他们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将留守在井冈山的红五军一举歼灭。

井冈山地势险峻，方圆数百里，只有四条大路、五条小路可以上下，易守不易攻。但是，一旦有一处被突破，其它几处就受威胁甚大，很难守住。又因敌众我寡，没有预备队，一处被破，其它几处无力增援。在这种紧迫情况下，一些同志有顾虑。彭德怀召集各级干部会议，分析了形势，动员全军同志一定要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并作了具体分工。一大队、十大队由李灿指挥，八大队、九大队由贺国中指挥，一大队守黄洋界哨口，十大队守八面山，

八大队守白泥湖，九大队守黎坪，军指挥部设在茨坪。

红四军下山不久，敌人进攻的枪声就打响了。敌人的主攻方向是黄洋界、八面山和白泥湖。黄洋界的敌人攻得很紧，但因地形险要，敌人兵力很多也展不开，再加上我军在阵地前沿埋上了用竹子削成的竹“钉子”等障碍物，我们又是居高临下，敌人一直攻不上来。敌人见正面攻不破，就从黄洋界侧面的山沟里绕到我军阵地的后面，截断了我军后路。据说是敌人收买了当地的一个富农带路引上山的。十大队守的八面山，是就地砍树做的工事，敌人用机枪打了四天四夜，把工事上的木头都打碎了，再用炮一轰，就把工事打垮了，只跑出来十几个人，大多数同志都被压在工事里面。

敌人进攻白泥湖的战斗也是异常紧张的。我们在黎坪的山上，就听到白泥湖那边的机关枪“扑噜扑噜”地响，象煮稀饭一样，一直不停。敌人白天猛打，晚上偷袭。贺国中亲自带领八大队坚守，那几天，雨雪交加，工事里烂泥有半尺来深，坐不能坐，睡不能睡。就在这样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整整坚持了四天四夜。我们九大队守黎坪，敌人来了一个营，是试探性的，加上我们在山上插了许多小红旗，敌人也搞不清我方虚实。打了一天，没有怎么猛攻就撤走了。

彭德怀在茨坪首先接到的报告是黄洋界告急，他立即带领警卫排向黄洋界跑去，还未到哨口就遇上了敌人，他当即指挥部队向哨口方向反击，想与李灿指挥的一大队两面策应，把敌人打下去。战斗刚刚开始，又接到报告，说

攻八面山的敌人打进来了，白泥湖我军伤亡很大，即将失守，情况十分严重。彭德怀立即带警卫排赶回茨坪。他考虑到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已有两个口子被敌人突破，我孤军无援，如果不突围出去，死守到底，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经与党代表滕代远商议，决定马上收拢队伍，突围出去，待把敌人引下山，再与其打游击战。

彭德怀带领部队一边打，一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荆竹山方向突围。大路都被敌人封锁了，只好由群众带路，在石头崖上爬。天下着小雪，我们只有一点点干粮，大家互相谦让着算是吃了一顿饭，没有水喝，就吃几口雪，一连在山上爬了两天才到了荆竹山。

我们越过荆竹山，来到大汾圩，在那里打了下山后的第一仗。当时，部队的情绪比较沉重，彭德怀想打一个漂亮仗，提高一下士气。他集合队伍给同志们做了动员。他大声地说：“前面大汾圩有敌人一个营，这是我们突围出去的最后一道难关，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打过去，只要坚决、勇敢，就一定能够冲过去！冲过了这个难关，本军长是有办法的。”他讲完后，部队就开始行动。一打起来，我们才知道这里的敌人不是一个营，而是两个营加一个民团，并已埋伏在我军前进路上的两侧山坡上。我们九大队是前卫，贺国中带我们这个中队担任尖兵。彭德怀、贺国中分别指挥部队从两边打，很快打开了一个缺口。我带领全中队同志迅速占领了一个山头，架上机枪，用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我军主力通过。但是，最后面一部分非战斗人员还是被敌人截住了，一些同志光荣牺牲，一些同志返回井冈山坚

持斗争。

从井冈山突围出来之后，我们在彭德怀带领下，就是这样一边行军，一边打仗，整天穿树林、钻山沟，与敌人转圈圈，抓住时机就打一下，打了就走。记得打于都时，我军仅有八、九两个大队和十大队的一个排，一百八十三支步枪，总共四百多人。人数虽然不多，但还是保存了有生力量。敌人妄图在井冈山消灭红五军的阴谋不仅没有得逞，反而被我们拖得疲于奔命。

井冈山是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它同以后所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如瑞金、延安等地一样，历来是人民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因此，人们对它存有特殊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战争从来就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能不能始终如一地保卫每一块革命圣地不受敌人的侵犯、不落入敌人之手，则只能根据当时战争的客观形势和敌我双方的力量，而不能单凭人们的主观愿望和感情。可是，在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却利用了毛泽东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信，利用了人们对井冈山的特殊感情，把井冈山根据地一度失守作为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之一，攻击彭老总“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行逃跑主义”。这完全是一种无端的诬蔑。其实，彭德怀早在平江起义之前，就把毛泽东创立的井冈山根据地当作革命的明灯，因此才历尽艰险，转战千里，带红五军主力上了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当时，我们这支队伍上井冈山的目的是学习红四军建军、建政、建党的经验，并没有打算留在井冈山。只是上了井冈山以后，



根据前委、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联席会议的决定，才改变了原来的打算。当时，蒋桂战争还没有爆发，国民党反动派内部处于暂时稳定时期。为了摧毁井冈山根据地，反动头子蒋介石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策划，调集湘赣两省二十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而且，红四军缺粮、缺盐、缺药、缺衣服，经济极为困难。这些都危及井冈山根据地和红四军的巩固和发展。因此，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军下山以“围魏救赵”的策略来解井冈山之围是正确的。正是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彭德怀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不顾自己的安危，说服了周围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勇敢地挑起了保卫井冈山的重担，全力抗击比自己多十几倍、几十倍之敌，从而，拖住了两省“会剿”敌军的大部分兵力，掩护红四军顺利地向赣南转移。最后又同“会剿”井冈山之敌，血战了四天四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下令突围，保存了红五军这支革命队伍。这一切，正是彭德怀对井冈山斗争的贡献，也是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光辉一页。何罪之有？

## 回 师 井 冈 山

部队冲过大汾圩之后，大家的情绪好多了。抵达南康附近的新城时，正值春节，彭德怀说：“请大家过个好年。”我记得是一九二九年大年三十下午到达新城。当天晚上，鞭炮齐鸣，很是热闹。我们从地主那里搞来了肉和酒，吃了顿好饭。我们大队长黄云桥喝了一点酒，很早就睡了。

我和勤务兵两人盖一条毯子。刚睡下不久，勤务兵说外面枪响，我开始还以为是老百姓放鞭炮呢，跑出去一听，果然是敌人的枪响。我立即报告黄大队长，他不信，仍睡着，又去报告朱义敏党代表，他马上就起来了。我们立即集合队伍，天很黑，伸手不见五指，谁也看不清谁，我就把班长一个个依次排好，战士来了就“对班入列”。这时，黄大队长也来了，他派通信员和军部联系。可是因为晚了点，军部已经出发了，我们大队掉了队。我急得满头大汗，怎么办呢？向哪个方向走呢？我们没有目标地朝着有大山的新城左边走，走着走着，见到左前方有队伍，我们就趴下，连问了三声，才有人答应，原来是贺国中来接应我们。从这天晚上起一直走到第二天下午，我们才停下来休息做饭吃。正要吃饭，又见敌人出现在我们的左后方，我们只好一边走一边吃。这时，敌人追上来了，我们中队在后头打掩护，彭德怀走在我们中队前头。上山时，他的脚步放慢了。后来才知道头天晚上他怕敌人突然袭击，为了让大家得到休息，自己就在外面走来走去，实际上是起了担任警戒的作用。这时他实在太疲劳了，走不动了。我就派了一个副班长，在后面推着彭德怀上坡。同时为了阻止敌人前进，令各班向敌人开火，掩护部队上山。部队上山后，敌人也拖累了，我们才脱离了险境。

过了几天，我们到了兴国县的九堡，该地有党的秘密支部，群众见了我们很高兴。听老百姓说，离此百余里的于都城只有敌刘士毅部的一个营把守。我们决定当即出发，奔袭于都城。经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到天亮时我们来到了

离城十多里地的一个村子里。准备了梯子，拂晓时爬进城里，突然围住敌人的营房，全歼该城守敌。这是从井冈山突围后第一次占领县城。随后，我们又乘胜奔袭了安远县城，消灭了反动地主武装，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那个时候周围没有敌人的正规军，情况较缓和。就在安远县，我们接到毛泽东从汀州来信，信中告诉我们红四军将从汀州回到瑞金，让我们到瑞金同红四军会合。

一九二九年三月底，赣南正是春暖花开的好时节，我们胜利到达瑞金，再次与红四军会师了。我军在瑞金休整了约一周的时间。当时，蒋桂战争爆发了，江西省军阀内部也矛盾重重，“会剿”井冈山的湘赣白军已回防，似无力来追击我们了。因此，前委决定我们红五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回师井冈山，恢复湘赣边区。四月初，我们离开瑞金，经于都，于下旬回到井冈山的茨坪。这次回井冈山和上次退出井冈山的形势完全不同，沿途几乎未遇见敌军。当时井冈山地区虽遭敌“会剿”时的严重破坏，但是红五军回来不久，经过发动群众、救济难民，恢复生产，健全革命组织，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井冈山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生气勃勃的面貌。

## 返回湘鄂赣

### 寅陂桥战斗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基本恢复以后，红五军军委和湘赣特委共同确定了“向外发展，在发展中巩固苏区”的方针。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井冈山根据地，被湘赣两省的白军摧残得很厉害，特别是在敌人撤退时，实行了野蛮的“三光”政策，造成盐、药、布等日用品奇缺，兵源、弹药的补充也成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迫切需要向外发展。

一九二九年夏，红五军和王佐特务营共同行动，首先攻占湘东的酃县、桂东等地，筹集了一批款项和物资，继又夺取粤北的城口、南雄，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购买了大批药品、布匹及食盐，带回井冈山。这对于解决井冈山地区军民经济上的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

胜利这个东西，可以鼓舞部队的士气，但同时又容易使人盲目轻敌。就在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不久，湘赣边特委和永新县委就提出要红五军夺取安福城。当时，安福县周围的永新、莲花、吉安等县城都有敌人的正规军把守（少的一个旅，多的两个旅）。安福城守敌虽然只有一个营加一个民团，但城墙既高又坚，而且进攻安福县城是入敌腹地，易受周围邻近之敌的夹攻，以红五军千余人之力，



去进攻这样的敌人，确有很大的冒险性，可是当时特委和县委的一些同志只考虑安福城的守敌较少，认为攻下安福城，敌人就会从永新、莲花等县城撤退。因此，不顾彭德怀的反对，令红五军向安福城开进。

当红五军进到距安福城约三十里的寅陂桥时，与敌遭遇。那天天空黑沉沉，暴雨下个不停，能见度很低。当枪声一响，永新、莲花、安福三路之敌即同时包围上来，向我军猛烈射击。显然是中了敌人预先的埋伏。情况十分危急，彭德怀立即下令突围。我们九大队在黄云桥大队长的带领下，勇猛突破敌阵，迅速杀出一条血路。部队且战且撤，但敌人尾追不放。这时纵队长贺国中又令我们中队占领一处高地，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脱离险境。在激战中，贺国中不幸头部中弹，倒在血泊中，我们立即进行抢救，终因流血过多光荣牺牲了。

贺国中系湖南涟源县人。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和黄公略、黄纯一一起在湘军当兵。后他们由湘军部队选送入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又继续读完军校高级班。并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黄公略早年结识彭德怀，于是他们三人在一九二八年春一起来到南县，通过彭德怀的介绍，他们三人又一起到独立第五师随营学校工作，分别担任随营学校副校长、教育长、区队长等职。不久黄公略和黄纯一相继调到团队任职，贺国中就成了师随营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时年才二十多岁。他身材高大，体魄魁伟，性格豪放。在随营学校工作过的同志都说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官。他政治上敏感，当第一团士兵在南

县进行闹饷活动时，他就密切注意闹饷的发展情况，并发动随营学校的学生进行响应。他对我们这些带头闹饷的积极分子，更为重视，因此，在平江起义之后，在他的主持下很快就吸收我们入党。他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优秀指挥员，从担任我们第七团的党代表以后，既做思想政治工作，又指挥打仗，以英勇善战著称。他在每次战斗中，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是我们全体共产党员的楷模。所以，大家对于他的牺牲，都极为痛惜。我更为失去这位象长兄般的关怀和教导我的领导同志而悲痛万分。时至今日，他那光辉的形象和音容笑貌，还鲜明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贺国中牺牲的当天晚上，我们把他的尸体埋葬在寅陂桥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当时来不及为他树碑立牌，只作了个简单的标记，原想在情况许可时，另移墓地，但因以后战事频繁，经常转移，无暇顾及。多少年过去了，一九八一年，我在北京突然接到贺国中的儿子贺松云从家乡的来信，询问他父亲埋葬的地点。读着他的来信，我悲喜交集，感到贺国中在平江起义以后的辗转战斗中，出生入死，英勇奋斗，历尽千难万险，虽然未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但却有了自己的后代。我对贺松云的情况虽然不甚了了，但我相信他一定会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把先辈们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寅陂桥遭遇战，我军伤亡二百余人，纵队以上干部，除贺国中牺牲外，还有军参谋长刘之志阵亡，李灿负伤，我军损失十分重大。此后，部队撤到永新地区进行整顿。八大队大队长郭炳生接替贺国中任纵队长，我由九大队中

队长提任八大队大队长。

是年八月，红五军又相继同敌张辉瓒和谭道源两个师打了一仗。这次，我们“避实击虚”，乘敌不意，袭击敌之尾部，获敌辎重甚多。随后又“避强攻弱”，迅速北进，连克万载、铜鼓，从而，回到了离开一年多的湘鄂赣边区。

此时的湘鄂赣边区，经过黄公略和地方党同志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原来留在这里的第二纵队也和地方游击队合编为湘鄂赣边支队，黄公略任支队长，人员由原来的一、二百人增至上千人。并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县建立起几小块根据地。

红五军一进入湘鄂赣边区，就受到了黄公略和地方游击队的热烈欢迎。一些为逃避白军“清剿”而上山的群众，也纷纷返回家园。我们更为回到红五军的发源地而感到十分喜悦。大家相见，分外高兴。第二天，黄公略给我们大队以上干部介绍了一年来的斗争情况，他说：“从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之后，我们在湘赣边的万山丛中度过一个艰苦、寒冷的冬天。吃的是红薯丝，喝的是雪水。下山时倒着身子向后走，为的是不在雪地上给敌人留下痕迹。那时，我们困难得很。以后，我们紧紧地依靠地方党和游击队，采取“旋磨打圈”的游击战术，忽南忽北，声东击西，白天隐蔽起来，晚上出击敌人，因此敌人不仅没有“剿”光我们，反而被我们搞得心惊胆战，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接着，黄公略风趣地说：“不过，由于我们白天活动不多，很少见太阳，所以大家都成了白面书生了。”他的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通过黄公略的简要介绍，我们无不为他们

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所感动，对黄公略同志的敬佩之情也油然而生。

## 发展湘鄂赣根据地

红五军主力返回湘鄂赣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湘鄂赣边支队重新编入红五军，黄公略也升任为红五军副军长。整编后，红五军兵力共三千余人，下编为五个纵队，并划分了各纵队的游击区：

第一纵队司令孔荷宠，活动于平江、修水、通城地区。

第二纵队司令李实行，活动于浏阳、万载、萍乡地区。

第三纵队司令吴溉之，活动于铜鼓、宜丰地区。

第四纵队司令郭炳生，活动于湘赣边区。

第五纵队司令李灿，活动于阳新、大冶、通山、武宁地区。

与此同时，彭德怀和滕代远向这里的同志介绍了红四军在井冈山、瑞金等地做群众工作、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展开了巩固和发展湘鄂赣根据地的斗争。

原来湘鄂赣这个地方，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很严重。其中尤以平江的地方游击队为最。产生盲动主义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有的人是出于狭隘的复仇心理，把参加革命当作为了报仇。有的把烧杀当成是坚决革命，而把反对这种错误行为的同志说成是对革命不坚决。有的是把烧掉群众的房子当作促使群众起来革命的手段，说只有这样，才能把小资产阶级（农民）变为无产者，迫使他们走上革命。



对于这种盲动主义的作法，我们一开始就是反对的，觉得土豪劣绅的房子无罪，反革命是人不是房子。而且一烧起来，往往殃及老百姓的房子，有时，一条好好的街，顷刻变成一片瓦砾。烧掉了房子，群众往哪里住？自己的队伍往哪里住？因此，对盲动主义很反感。可是，那时我们又讲不出多少道理来说服他们。后来，我们到了井冈山，听毛泽东给我们讲，有一次，工农革命军刚到一个地区时，农民都很亲近地围拢上来，可是，当点火要烧房子时，农民就跑开了。所以，毛泽东指出：烧房子是“烧”跑群众、孤立自己的愚蠢行为。当我们在瑞金同红四军第二次会合时，还亲眼见到红四军每到一地，就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利用一切机会做群众工作，因此，军民关系十分融洽。这一切给了我们很深刻的教育。所以，红五军这次重返湘鄂赣边区，就以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为榜样，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共产党的组织作为红五军的一项重要任务。很快，地方的民主政权和农民、妇女、儿童等革命组织都纷纷建立了起来，地方武装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不到几个月，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北起阳新、大冶、崇阳，南迄浏阳、万载，东到修水，西至平江的广大地区。这时红五军的人数虽然增加不多，但经过实际革命斗争的锻炼，战斗力大为提高。这一切使我们深深懂得军队和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

然而，使我更加深刻地体验到军民关系有如鱼离不开水的关系，还是我一次在群众家中养病的经历。

一九二九年秋，我军由平、浏、万地区转移到莲花、永

新地区时，我突然得了大病，终日高烧不退、昏迷不醒，而部队却经常要转移作战。我们大队党代表王如痴见我己不能随军行动，经请示军部并和地方党的同志联系，就把我留在莲花县属九堡的一个老百姓家中养病，并派一个勤务兵陪伴我。

这家老百姓人口不多，除夫妇两口外，还有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我们一住进他家，他们就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每天给我端水送饭。那时，地主的民团，还经常下乡活动。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他们还让孩子在村口放哨，一有情况，就把我背到山上藏起来。

在开头的一段时间里，这家老百姓帮助找来了村里的医生，给我看病，可是一连服了几副药，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加重。我估计我的病可能好不了了，就把自己长期积攒下来的十几块钱，交给了勤务兵，嘱他在我死后，给我买口棺材。这时，我的勤务兵只会在一旁偷偷流泪，没有什么办法。老百姓见此情景，一方面安慰我，一方面到处找名医。后来，他们打听到萍乡地方有一个老中医，很有名气。但他出远门看病要坐轿，没有轿子抬，就不肯来。当时，这个地区已经很少有坐轿子的人了，轿子也就难找了。经当地党组织和群众帮助，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台轿子，才把这个老中医请来了。果然，吃了他几副药，我的病就逐渐地好起来。

我在这家老百姓家中，前后住了一个多月。临离开时，我想把身上的钱都给他家留下，但他们说什么都不肯收，经我再三劝说，最后才勉强收下两块钱。

这件事给我教育很深。“人民群众实在太好了，没有这么好的人民群众，革命事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我从亲身体验中得出的结论。

## 误杀王佐、袁文才事件

革命创业的道路是艰难而曲折的，革命者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仅“创业艰难百战多”，有时还可能受到来自队伍内部“左”、右倾错误的伤害和错误政策的打击。一九三〇年初，永新地区发生的误杀王佐、袁文才事件，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

王佐、袁文才都曾是井冈山地区的绿林头领，一直过着天、地、人“三不管”的生活。他们以“劫富济贫，除暴安良”为旗帜，出没于茨坪和茅坪等地的高山密林中，共同打击土豪劣绅，抗击官府的进剿，得到了农民的欢迎。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这里以后，了解到王佐、袁文才这两支队伍的情况，认为起义部队要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并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把这两支队伍团结过来。因而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召开的“古城会议”上，毛泽东排除了一些人想用武力吃掉王、袁部队的错误主张，作出了从政治上、军事上对这两支队伍进行团结和改造的正确决定。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首先亲自会见袁文才（袁在一九二六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向他介绍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指出了革命的光明前途，肯定了袁文才及其部队敢于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革

命精神，说明了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理。并送给袁文才部队一百条枪，鼓励他为革命掌握好枪杆子，不断扩大农民武装力量。毛泽东这一诚恳的合作态度，使袁文才受到深刻的教育，消除了原来的疑虑和戒心。他向毛泽东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建设好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回赠给工农革命军六百块银元以表示感谢。在工农革命军团结了袁文才以后，毛泽东又于一九二八年元月初，派何长工来到王佐部队任党代表。相继派到王佐部队工作的还有宋任穷、康健、张际春、高静山、蔡协民、谭梓生等党员干部。通过进行新旧对比教育和军事训练，使王佐部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政素质都有明显的提高。王佐也于同年四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王佐、袁文才都参加了边界割据的领导工作，为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切生动地证明了党和毛泽东关于团结和改造王佐、袁文才部队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留下谙熟井冈山地区地理民情的王佐和他领导的三十二团，配合红五军坚守井冈山，以打破敌人对井冈山地区的第三次“会剿”。这时，袁文才随红四军主力出征（四、五月间私自离队跑回边区），指挥三十二团的重任落在王佐的身上。在这期间，王佐顾全革命大局，勇挑重担，服从指挥。由于他熟悉地形，因之多次陪同彭德怀到我们阵地视察、指导。他对我们的工事构筑、兵力布署，以及物资筹备等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受到了红五军广大指战员



的赞扬。

在红五军撤出井冈山以后，王佐率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同“会剿”的敌人进行两个月的游击战，结果无大损失。随后，三十二团改编为湘赣边界红军独立团第一营（又称特务营）。

当红五军于一九二九年五月返回井冈山地区时，彭德怀在茨坪见到王佐。当王佐谈到他的部队未遭受什么重大损失时，彭德怀高兴得连声称好。并经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决定，将王佐部编入红五军第五纵队，王佐任纵队副司令员。是年夏天，当红五军挺进粤北开展游击活动时，王佐主动提出随同前往，在几次战斗中都表现不错。

一九二九年八月，红五军返回湘鄂赣边区，此后有半年时间，我们同王佐、袁文才部队脱离接触，对他们表现如何，不得而知。

一九三〇年初，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的第三、四纵队，从湘鄂赣边区来到永新、安福边界集结，准备攻打安福。这时，我病愈回到驻在永阳镇的红五军军部。一天下午，彭德怀对我说：“今晚部队要出发执行任务，你病刚好，就不要去了。”并令我于第二天带着军部的勤杂人员赶到永新城里去找他们。当晚部队就轻装出发了。我把军部的马伕、挑伕、伙伕等组织起来，第二天一早直奔永新城。当我带着军部的勤杂人员到达永新城时，就传出话来：“王、袁反水，被红军解决了。”

后来我才知道，酿成这一事件不是一朝一夕的。自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挺进赣南、闽西

以后，湘赣边特委同袁、王部的矛盾就逐渐加深。当时在湘赣边特委工作的杨克敏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到上海所作的书面报告中，就曾提到此事。他认为：

“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信仰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边界因称为‘特别党员’。”

“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的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

杨克敏在《报告》中还认为：

“我们在边界的工作，受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政策都要迁就他们，恐怕与他们闹翻了，因为他们都有一部分群众，且均为当时的人民，而且一冲突起来，工作更不好作。”

因此，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出：

“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久是要爆发的。如果不及时早早加紧他们群众的争夺，不独现在阻碍工作进行，而且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须特别加以注意才行！”

一九二九年湘赣边特委书记邓乾元在《湘赣边界工作报告》中也认为：

王佐部队，“士兵成份纯是王佐的老弟兄”，袁文才部队，“士兵成份完全是老袁的老弟兄”，“所以我们插足不进。”

因此，邓乾元在《报告》中提出：

“土匪问题——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策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些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依现时之情形，而中策已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则好，不能行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

边界特委关于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八月边界情况的一个报告也说：

“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之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

以上可见，边界地方党委早就对王、袁二人深恶痛绝，埋下杀机。

一九三〇年二月，湘赣边界特委以整编地方武装，研究攻打吉安为名，通知边界各县主要负责人带领本县武装到永新城集中，王、袁接到通知后，于二月下旬带领部队开进了永新城。特委书记朱昌偕把王、袁及其部队安顿好以后，就把他们的住处绘成草图，连夜来到红五军军部，向彭德怀等报告，说王佐、袁文才在永新城边界县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把边界地方武装为他们改编统率。说王佐讲话时，把驳壳枪在桌子上一摆，气势汹汹，如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有将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因此，要求红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彭德怀听了上述报告后，提出一些疑问，认为王、袁的问题“不致如此严重”。并再三询问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朱昌偕说，这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后挑起的。因

为一九二八年党的“六大”所通过的决议中，有关于歼除土匪的首领这一条。当时，红四军前委在讨论“六大”决议时，曾将这一条删掉，但后来袁文才还是得知了决议的全部内容，就告诉了王佐，并说共产党是不会相信他们的。王佐非常听袁文才的话，所以，王、袁要叛变是由来已久的。这时，随同朱昌偕一块来反映情况的还有边界特委的另一名委员，他也异口同声说王、袁确实要叛变。按照当时的规定，主力红军凡到一地，须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红五军军委召开了临时会议，经集体讨论决定接受边界特委的要求，令第四纵队随朱昌偕来到永新城，将王、袁抓起来，与其谈判。

第二天拂晓前，部队分头包围了王、袁的住地，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进袁文才的房间，袁文才来不及动作，就被朱举枪打死在床上。

王佐听到了动静，带着他的勤务兵冲出了包围，跑到东门外。当他涉水过禾河时，由于王佐不会游泳，终于沉入河底。几天后，尸体在下游浮出水面。

在“解决”王佐、袁文才并改编他们的部队以后，湘赣特委对于王、袁在井冈山上的余部，仍不放心，遂令红六军第三纵队派出部队上山进行“搜索”。当时这一任务，由纵队党代表刘作述亲自交给了我们第四大队（那时我已到红六军，任四大队大队长）。我于四月初带领四大队到茅坪一带，到处寻找王、袁余部的行踪，并派一些战士化装进行侦察，结果都一无所获。但是，在几天的“搜索”中，却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我们的行动很反感，而对王、袁的部



队，则备加爱护。有一次，我们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王、袁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我们大队赶到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我们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上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俺们不知道，俺们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王、袁的部队是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的。他们自身可能在组织纪律性上存在某些问题，同湘赣特委某些领导人也可能发生过矛盾，但说王、袁要叛变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充其量不过是内部矛盾而已。而湘赣特委的一些领导人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有缺点错误的同志，直至不惜残酷地杀害他们，显然是极为错误的。

（林华明整理）

##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建立巩固的辽东根据地

江 华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艰苦奋战八年，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党中央和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内国外形势和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作出了全党力争东北、把东北建成巩固的战略基地的重大决策，从各解放区抽调了二万多干部、十余万部队进入东北。我也在这时被调到东北，在安东地区工作了三年多。现在回忆起这几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这三年是与国民党反革命生死拚搏的三年，也是我们创建辽东根据地艰苦奋斗的三年。三年中有顺利，有困难，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开始由于我军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安东地区，占了先机之利，在政治、军事上都占了优势。经过剿匪、摧毁敌伪政权、以及轰轰烈烈的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群众运动，严重打击了敌伪残余势力和国民党反革命地下活动，普遍建立起各级地方民主政权；特别是在东北局“七七”决议之后，组织数千干部下乡，开

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同时进行了城市的民主改革，广大工农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经济上也得到了一些利益，从而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奠定了建立辽东根据地的初步基础。一九四六年十月，国民党军队全面向辽东地区进攻，我军在新开岭歼敌二十五师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安东、通化，撤退到临江、长白、濛江（现名靖宇）、抚松四县狭窄地区。这一段是辽东局势最危急最艰苦的时期。中央为了加强辽东地区的领导，于十月三十一日决定成立辽东分局，派陈云、肖劲光来辽东，陈云任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肖劲光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全体军民万众一心，团结奋斗，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英勇顽强地坚持了辽东的斗争，与北满、东满、西满相互配合，取得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和夏季攻势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部署，迫使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辽东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一九四七年六月，第二次解放了通化、安东，辽宁、辽南、安东三大块解放区联成一片，总人口九百三十多万。在辽东分局的领导下，迅速开展了新收复区的恢复、建设工作，深入发动群众，全面实行土改，大力发展城市工商业，在广大城乡掀起参军参战和发展生产的革命热潮，各项工作节节胜利，很快迎来了辽沈决战和东北全境的解放。

白雪皑皑，江水滔滔，战马嘶鸣。经过三个冬春艰苦卓绝的奋斗，辽东大地迎来了胜利，觉醒了的人民意气风发地把辽东地区建设成民主、光明的巩固根据地。

现在我着重回忆建立辽东根据地工作中有关接收敌伪政权、反奸清算、土地改革等方面的一些情况。

## 挺进东北，接收伪满政权

一九四五年夏，我在延安刚参加过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就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消息。胜利的喜讯使整个延安沸腾起来，队队秧歌，阵阵锣鼓，火把提灯，游行庆祝日以继夜，延安城乡普遍沉浸在抗日胜利的欢乐之中。

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是促使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百万苏联红军从海陆两个方面进入我东北地区，迅速击溃了日本关东军，迫使日本政府于八月十日发出乞降照会。与此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一切抗日武装队伍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接收日本投降，收复敌伪所占地区。朱德总司令还命令原在山东、晋绥、晋察冀和冀热辽解放区抗击日军的武装队伍迅速向热河、察哈尔和东北地区进发，配合苏军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

正是在这一革命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中央决定在延安参加“七大”的各根据地同志迅速返赴各个战场，开辟新的工作。在毛主席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前夕，八月二十四日，我们二十几人一起乘坐一架美国运输机离开延安，同行的有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薄一波、滕代远、陈毅、林彪、肖劲光等许多中央委员。毛主席很关心这次飞行的安全，让叶剑英亲自进行检查，要每



人带好降落伞上飞机，并由黄华同志任翻译。飞机顺利地飞到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驻地。然后，我们回山东的和新四军的一行人，又继续上路东行。

到河南濮阳，接到中央电报，要我们回山东的一行人迅即转向去东北。关于东北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把东北建成中国革命的巩固根据地的问题，毛主席在“七大”时即反复作了精辟的阐述，他特别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基础。他还说，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我们的根据地，现在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打成一片。毛主席这些话，充分说明了加强东北工作极重要的意义，所以对于中央要我们去东北工作，我们是很高兴的。这时，我们知道中央已作出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彭真、陈云等已去沈阳。我们原来拟回山东根据地的一行人，我、林彪、肖劲光、邓华、李天佑、聂鹤亭等随即转道北上。革命形势的发展与新的任务鼓舞着我们，一路上大家谈谈笑笑，心情很舒畅，不觉得旅途的颠簸劳累。在行进的路上还发生了一件令人非常感动的事。我们路过冀南解放区南宫县境时，当地同志们听到我们要路过的消息，连夜赶修公路，准备迎接大军过境。其实我们既无车、也无炮，只有曹里怀率领的一个团。我们一路经过各根据地所受到的热情接待和支持，充分表明了各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热烈拥护中央关于挺进东北的决策，并且以实际行动给予了积极支援。十月，到达山海关时，东北局已派了火车来迎

接，我们顺利地进入东北的第一大城市沈阳。

在沈阳停了几天，林枫通知我，东北局决定我到安东省工作，任中共安东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书记是肖华，副书记还有林一山。省工委驻安市（现丹东市），管辖区域几经变化，大体上是现辽宁省的东部，包括抚顺、本溪以东以南的辽东半岛地区，和现吉林省的抚松、临江、通化以南地区。当时，安奉路（即丹东至沈阳的铁路）还通车，林枫同我谈后不几日，我即同罗其南、杨昆岚等一起乘火车到了安市。其时，肖华、林一山早已到了这里。我们一起住在鸭绿江造纸厂里，省工委机关也设在这里。这个纸厂原是张学良建的，以后由日伪经管了，规模很大，造纸机等机器设备都很不错。这个厂主要生产高档纸张，如卷烟盘纸、钞票纸等。我们接收后，很快恢复了生产，并成为安东省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辽东地区军队和地方干部十几万人的供给主要是靠安东的几个大厂子，所谓“穿的是纺织厂的布，用的是造纸厂的钱”。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是十一月初到安东的。那时安东地区的政治情况复杂，社会秩序混乱，伪警武装尚未解除，夜晚时闻枪声，人民生活不安定。我军在九、十月间已陆续由海陆两路分批进入安东地区。当时，安东地区同东北其他地区一样，在苏联红军的军事管制之下，苏联红军同我军也是亲近友好的，给予我们很多支援。但是由于受雅尔塔协定和同国民党政府签定的中苏条约的约束，地方政权未能全部让我们接管。

这时，国民党军队还没来得及侵入东北地区，国民党派的伪安东省主席高惜冰等“接收大员”到了长春，未敢来安东，但国民党特务分子挂出了“县党部”的牌子，进行活动。敌伪分子在蒋介石国民党“曲线救国”的命令下，以“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成立了“维持会”，原日伪安东省省长曹承宗摇身一变当上了安东省地方维持会会长。安东地区各城乡和各行业也都组织了“维持会”。日满时期的伪警察也改头换面，黄军服染成青军服，还是那些人，仍保持原来的建制和武装，又成了“维持会”的警察。国民党特务、汉奸和地方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以“维持会”的名义和形式继续实行反动统治，欺压人民，并且明里暗里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等待国民党政府的接收。

在安东地区的农村、山上还有多股武装土匪，这些人主要是伪满的国兵、警察、特务、地主武装等反动分子，还有一些日本散兵游勇、开拓团人员、浪人等军国主义分子。这些股匪大多数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是一些政治土匪，杀人放火，奸淫虏掠，暗杀我工作人员和革命群众，组织暴动，无所不为。

安东地区的人民群众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压迫，对日寇和伪满汉奸有深刻的仇恨。我党在安东地区的工人群众中早有一定的影响，在二十年代就建立了组织，开展了一些活动；“九一八”后，抗日联军杨靖宇部在长白山一带顽强地进行了抗日斗争；而且安东地区与胶东半岛隔海相望，山东、华北老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对它有一定影响。这一切决定了安东人民有较高的民族觉

悟。但是他们又受到日满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的较大影响，对祖国的认识很抽象，不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把国民党政府、中央军当作“正统”，加之汉奸、特务、警察的威胁和欺骗，以至有相当部分群众对我党我军还缺乏全面认识。

上述情况就是我刚到安东时的基本政治情况。事情很明显，我们要想在这里站住脚，建立革命的根据地，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摧毁敌伪残余势力，建立人民的革命政权。我由沈阳动身时，东北局的领导同志曾一再叮嘱，要我到安东后，尽快解除敌伪警察武装，把枪杆子牢牢掌握在人民手里，我们才能够有利地控制局势，建立人民的革命秩序，推动各项工作。我到安东后，传达了 this 指示。在我到安市前几天发生的“三股流”事件，促进了我们接收安东的地方政权和解除警察武装的工作。当时，在安东郊区有敌伪残余势力组成的土匪千余人，其中有二百名溃散的日本关东军。他们与国民党的地下人员勾结在一起，打着“中央先遣军”的旗号，欺骗、蒙蔽安市原“国高”的一部分学生，利用学生单纯的反日爱国热情，组成“爱国先锋队”。并且造谣说进入安东的八路军是“土匪”；要学生们拿起枪来，迎接“中央军”。在国民党特务的煽惑下，学生们被骗上了安市西山叫“三股流”的地方，与残余的日军、土匪混杂在一起。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我军歼灭了三股流一带的土匪，解救了被蒙蔽的青年学生，并且得到了维持会、警察和国民党特务勾结日、匪军图谋叛乱、危害人民的大量人证物证。我们向苏军司令部详细介绍了战



斗经过和缴获的人证物证情况，从而使苏军对他们的罪行有了较清楚的认识。我们派吕其恩与苏军联系，我军与苏联红军一起缴了伪警察的枪支。接着，我们建立了人民的警察武装，成立了安市保安司令部，由吕其恩任司令。

在消灭三股流武装土匪的前后，在整个安东地区，我主力部队以团营连为单位，分散于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与地方武装配合，展开了对日伪残余、汉奸、土匪的全面进剿。在歼灭盘踞在海城、岫岩、大孤山、瓦房店一带的一千五百余名土匪后，集中兵力对纠集在千山一带的大股土匪实施包围。这股土匪以国民党特务邓国庆为首，包括千余名日寇和二千多名伪满国兵、警察、宪兵，编为三个团，企图凭借千山险要地形及日式武装与我军顽抗，等待蒋军收编。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全部肃清了千山及其附近地区的股匪。与此同时，本溪、新宾等地的土匪也被肃清了。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通化地区国民党特务孙耕晓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藤田策动日寇五千余人暴动（即二·三暴动），当日即被我镇压。总计从一九四五年十月起，经过三个月的剿匪，共歼灭日伪军残余、土匪一万五千余人，解放了安东地区的所有城镇。少数零散土匪逃窜到辽河以西的辽台盘地区，投靠了占领锦州的国民党军队。

剿匪的胜利，为建立地方政权、加速接收和建设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安东省和安市先后建立了民主政府，省政府主席高崇民，副主席刘澜波，安市市长吕其恩，副市长张雪轩。民主政府公布了“安民告示”，阐明了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的政治主张,和对工商、文教等各行各业以及对伪职人员的方针、政策,安定了人心。随之,我们派出了一批干部,分赴各县、市,截止一九四五年底,安东、通化地区所属全部县市普遍建立起民主政权,社会秩序安定。安东人民在安东省委和各级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向着“和平、民主、团结、建设”的道路迈进!

## 开展反奸清算斗争

一九四五年冬是东北地区政治军事形势激剧变化的时期。东北地区的人民正在欢庆解放,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开始走上光明生活大道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却要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强占东北,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下,向我东北地区大举进军。十月十一日,美舰二十一艘载运国民党军队在秦皇岛登陆。十一月十六日,在美国飞机的掩护下,国民党军队攻占山海关。十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并继续北犯。十二月二十二日,美海军直接把杜聿明部运往东北。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又利用中苏条约,要苏军让其接收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东北各地政权。一时间,东北地区黑云滚滚,刚从日满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东北人民,又重陷于蒋介石国民党奴役蹂躏的深渊之中。

鉴于当时这种形势,我们独占东北已无可能,而且东北的严重斗争已不可避免。对我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战略部署,党中央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月多次作出指示:要从东北的大城市中撤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并

且指出，我们在东北要取得对国民党斗争的胜利，主要决定于东北人民的支持和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要好好进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帮助群众反对汉奸、特务，开展减租运动，只要我们能争取到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中央的指示，使我和省委的同志对当前政治军事斗争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前一段的实际工作中，我们也体会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们回顾前一段工作，在我们刚进入安东地区的头一、二个月里，工作重点侧重在剿匪、扩大武装、搜集与分配物资等方面，这是必要的，使群众政治上翻身，经济上得到部分利益。各地的人民政府虽然已经建立起来，对维护社会治安和扩大我党政治影响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广大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对敌伪残余势力尚未给予毁灭性的打击，群众的思想顾虑还很多。情况很清楚，我们要在安东地区创建根据地，就必须深入发动群众，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为此，一九四五年冬，在各地建立民主政权的同时，我们突出抓了发动群众的工作，从城市到农村广泛开展了反奸清算斗争的群众运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安东省工委发出了《关于目前开展群众运动的指示》，指出：“目前的中心工作，应明确规定，以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与普遍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大量组织群众，其他改造伪政权、扩军、搜集敌伪物资等工作都应有机地配合这一工作。只有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才真正有了力量，有了干部，才能更迅速地扩大武装，

搜集更多的物资，彻底摧毁伪组织，肃清一切反动分子、警察、土匪、特务分子，才能更进一步扩大民主，巩固政权，这样我们才是真正有了一切。”《指示》还提出，当前的斗争任务和斗争对象，应是“通过人民的民族觉悟去解决以民族形式出现的阶级斗争”，以反奸、清算、减租、增资为中心，反对日寇汉奸、特务、走狗、卖国贼的残余势力，从斗争中建立与组织各级工会、农会，并且响亮地提出了“申十四年冤，报十四年仇”的口号。同时省委还提出，要在群众斗争中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从此，一场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在广大地区开展起来。

首先逮捕处决了伪安东省长曹承宗和伪安东省次长渡边兰治。曹承宗是一个死心塌地忠实于日寇屠杀蹂躏东北人民的战争罪犯。在“九一八”前就当汉奸，任日寇东北交涉署科长，“九一八”事变后，当上了伪满州地政总局局长，一九四一年升任伪安东省省长。他在任地政局长时，就替日寇军阀财阀霸占我东北的土地、房屋，使无数人民流离失所，亡命他乡；在任安东省长后，更榨尽了安东人民的血汗；日寇投降后，又当“维持会”会长，还号召安东人民勿对敌人清算血债和报仇申冤，鼓吹“大国民风度”、“力持镇静”等等，以麻痹阻止人民的解放斗争，继续效忠日寇。渡边是日寇屠杀蹂躏我东北人民最凶恶的罪犯之一。被其鞭打、捕杀的人民群众实难以数计，还大量侵占人民田地，仅凤凰城一带即被其侵占近千亩良田。安东群众对他们莫不切齿痛恨。民主政府刚成立，人民便纷纷控告该两罪犯。安东省民主政府根据群众的控告，经过审讯，



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判处两犯死刑。

镇压了曹承宗、渡边等汉奸、战犯，在安东全省引起极大反响。日寇、汉奸加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被砸烂了，被奴役压迫十四年的民族仇恨如火山爆发，势不可挡，人民控诉日伪汉奸、特务的群众运动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从十二月十六日开始的安奉铁路员工反对李剥皮、郑剥皮的斗争，把反奸清算运动推向高潮。李剥皮、郑剥皮是日寇豢养的血债累累的二条汉奸走狗。李剥皮名李毓明，是安奉路警护团团团长；郑剥皮名郑重芳，是警护团的日本特务。警护团是满洲铁路警护部领导的护路武装，归日本关东军大本营管辖。李、郑依仗其警护团的职权和日寇反动势力，无恶不作。根据群众控告和调查，不完全统计，被其杀害的铁路员工有十六名，残伤的近八百人。至于对铁路职工、乘客以及沿线市民、农民敲诈勒索，强抢硬夺，随意毒打、捆绑、关押、滥施刑法等等，无辜受害的更是无法计数。安东解放以后，他们拒绝我军事代表进驻，在我们实行军管，停止了警护团的一切工作和活动后，还在暗地里散播谣言，恐吓群众，并将八百多条枪支隐藏起来，准备暴动。安奉路广大职工对李、郑二人恨之入骨，强烈要求法办，为被害群众报仇雪恨。在安东省工委领导下，由省总工会田力夫等组织工作队赴安奉路各站、段，深入到职工和市民群众中进行组织发动工作。同时，公安部门逮捕了李毓明和郑重芳。从而解除了群众怕斗不倒、怕报复等顾虑。在省工会的组织下，召开了被难家属座谈会，以及各种形式的控诉会，号召大家起来申冤报仇，与“剥皮”算

账。同时把群众揭发控诉李、郑罪行材料利用报纸、电台扩大宣传，很快掀起了诉苦控诉高潮。二十多天里，在安奉路沿线各站共开了三十多次控诉斗争会。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召开了公审李毓明和郑重芳大会，参加大会的有铁路职工、市民、农民以及省市各机关、厂矿企业、群众团体代表等共两万余人。安东省民主政府副主席刘澜波出席了大会。大会首先由受难人和被害人家属、亲友控诉，继而又举行了被害群众的追悼大会。当控诉到受难受害者被李剥皮、郑剥皮迫害得家破人亡等惨景时，参加大会的群众声泪俱下，义愤填膺，一致请求民主政府为人民作主，予以严惩。刘澜波代表省民主政府宣布接受群众的请求，立即处决李毓明和郑重芳。这时，群众欢跃高呼：安奉路的天真正亮了！工人们解放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民主政府万岁！

安奉路反对李剥皮、郑剥皮的胜利，在安东地区发生了巨大影响，反奸清算斗争的革命风暴吹遍了安东省城乡。截止一九四六年三月不完全统计，安东地区共举行了反奸清算斗争一千零四十余次，参加斗争的有九十三万余人，审判处决了战犯、汉奸、特务七十二人。反奸清算及时地打击了敌伪残余势力的反动嚣张气焰，有力地镇压了国民党地下组织的反革命猖狂活动，推动了扩军、生产、支前等各项工作，群众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斗争积极性大大高涨，共产党、民主政府在人民群众中赢得了巨大的威望，为建立巩固的辽东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深入发动土地改革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对东北的工作方针和军事斗争进一步作出了更加明确、更加具体的部署，对东北形势的胜利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指示”明确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到距离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把工作重心坚决放在群众工作上，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减租、增资运动，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样群众才会拥护我们。“指示”特别强调，在东北工作的干部和部队，要人人下决心，进行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加强辽东根据地的建设和统一作战指挥，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东北局决定将辽宁、安东两省工委合并，组建辽东省委，管辖安东、辽宁两省分委，六月，又辖辽南省分委；并成立了辽东军区，肖华任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程世才任军区司令员，我任省委第二书记、军区第二政委。在新的省委建立后，我们根据中央十二月二十八日指示，以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为中心，在积极进行扩军备战，发展地方武装的同时，与城市反奸清算斗争相配合，深入安东、辽南广大农村，蓬勃开展了以反汉奸、反特务、反贪污和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

辽东农村，日寇侵入后，积极扶持封建地主势力，使土地占有更为集中，农民所受的剥削更为残酷；日寇又实行开拓政策，以日本“满洲拓殖会社”和伪满“开拓总局”的名义组织的各种开拓团，掠夺了大量良田好地，变成所谓“开拓地”、“满拓地”，许多日本人也趁机霸占土地为己有。这些土地又租给中国人或朝鲜人耕种，从而出现了不少经营地主。日寇的这种农村政策，促使土地占有高度集中，无地农民大量增加。据安东省统计，占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百分之七十以上，而百分之五十的人却没有土地。东北农村雇工多，这也是与关内各地不同的特点之一。再一个特点是敌伪对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实行配给制度，配给店控制了农村生活命脉。县村屯政权、警察、特务、协和会、兴农合作社以及配给店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日寇在农村的统治基础。地主大多数都与伪吏、警察、特务有联系，或者二位一体，地主本身就是日寇的汉奸、走狗。东北人民把他们叫做“关东军、宪兵队，特务、警察、协和会”，东北人民最怕这些人，对他们也最为痛恨。

群众一经发动，仇恨的烈火很自然地首先集中在作恶多端的伪乡屯长、配给店掌柜等汉奸、特务身上，向他们开展了说理斗争，清算他们霸占田地财产，借“劳工”、“出荷”、配给中贪污、克扣钱粮油盐，以及欺压乡民、残害百姓等罪行，政治账、经济账结合起来，掀起了一阵阵斗争高潮。如凤凰城大堡区农民向汉奸姜永全算账，姜当了十四年伪村长，一贯欺压鱼肉乡民，是日满的一条忠实走狗，敌人要一百个劳工，他送去一百二十个，要一千担出荷粮，



他送去一千二百担，日满奖他为“模范村村长”，“功劳奖状”挂满了伪村公所。十四年来，他的地由二十六亩变成六百亩。日寇投降后，他还说敌人是“假投降”，买了礼物送给溃逃下来的日本兵。过去老百姓见了他连话都不敢说，现在吐出了十四年的怨愤，迫使他向群众低下了头，退出了侵吞强占的田地财物。据一九四六年三月安东省七个县不完全统计，共清算出粮食四千二百五十八万余斤，款一千四百七十五万余元，土地一万六千余亩。被汉奸、特务、恶霸剥夺走的老百姓的血汗财产，在共产党、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又回到了人民自己手里。

清算斗争的初步胜利，鼓舞了广大农民的斗志，并在斗争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不少地方成立了农会。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政治觉悟逐步提高，他们迫切要求减轻封建地租剥削。安东农村的地租一般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有的地方竟高达百分之七十，农民终年劳苦，不得温饱。有的地方，在向汉奸、特务算账的时候，就有农民到地主家里要求减租。当时地主还很顽固，不仅不应允减租，还把上门的农民骂了出去。我们坚决支持了农民的正义要求，及时地引导群众进一步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在农民运动的强大威力下，至一九四六年三月底、四月初，辽东大部分农村实行了“二五”减租。据不完全统计，安东、桓仁、赛马、宽甸四个县，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有一万三千多户佃农参加了斗争，地主退还租粮五十四万担，押金一百八十万元。不少地方还没收了敌伪掠夺的“开拓地”、“满拓地”和日寇、大汉奸的土地，分配给了贫雇农耕种。

正在运动向深入发展的时刻，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土地问题是全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指示》还指出，要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并且明确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一系列政策原则。七月七日，东北局通过了陈云起草的《东北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指出：必须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准备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把创造根据地作为第一位的工作。决议号召：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迅速普遍执行“五四指示”，并且强调要造成一个面向农村，深入农民的热潮。这一决议使我们对创建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更加深了理解，并使我回忆起从井冈山根据地时的打土豪、分田地以至长期以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只有解决土地问题，帮助农民从根本上翻身，农民才会坚定地跟我们走，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建立、巩固和发展，革命战争才能获得雄厚的物质基础与人力资源。相反，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我们就注定要失败，也就不可能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根据“五四指示”和“七七决议”精神，我们迅即派出五千余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在辽东全省广大农村普遍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在运动中，各地都集中

向汉奸、特务、豪绅、恶霸进行了坚决斗争，使他们完全孤立，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对于中小地主，一般都是经过群众，采取调解仲裁的办法，使他们拿出土地；对富农的土地则一般没有动。到九月底，据安东、辽宁（现辽宁中北部地区）两省不完全统计，共分配土地三百七十万亩，无地少地的贫雇农普遍分到了土地，在山区，一般每人分到一至三亩耕地，平川一般每人可分得四亩。几十万分得了土地的农民欢天喜地，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翻身。

一九四六年十月，国民党集中兵力向我辽东根据地全面进攻，土改运动暂时停下来。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主动放弃了通化、安东等地方，撤退到临江一带，坚持了以临江为中心的长白山根据地及敌后三大块游击区的斗争。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胜利之后，辽东广大地区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在敌人占领的半年中，辽东大地被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到处充满了暴行和血腥。地主、恶霸依仗着国民党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向广大群众展开了疯狂的反攻倒算。我将近一半的区级干部被杀害。他们还残杀我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从农民手中夺回被分掉的土地、房屋、粮食和财产，带领国民党军队到处烧杀抢掠，抓丁抓夫、派粮派款，弄得民不聊生，鸡犬不宁。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的所作所为从反面教育了群众，少数曾经对国民党抱有“正统”幻想的群众，在事实面前发出了“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糟殃”的感叹。辽东广大人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终于期待到了第二次解放，跳出了苦海。

面临着这样有利的军事、政治形势，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更大胆迅速地发动群众打倒地主阶级，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支援战争，争取全东北的早日解放。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东北局发出了《关于新收复区工作的指示》，强调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坚定不移地在政治上经济上清算蒋伪汉奸恶霸地主的罪恶，让群众出冤气，吐苦水，长自己的志气，灭反动派的威风；要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迅速解决土地问题，使千百万农民从汉奸恶霸地主手中拿到土地，彻底摧毁封建势力。辽东分局也就收复区土改问题给各省委、各工作团写了一封信，总结了一九四六年土改的经验教训，指出，打倒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制度的关键，是要掀起群众阶级斗争的怒潮，并且明确提出，汉奸恶霸大地主是斗争的主要对象，对中小地主也必须经过农民的清算斗争，达到土地归还农民的目的。与此同时，我们组织了二千余名干部和北满来的马宾等同志组成的四个工作团一起下乡，发动群众，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只有将农民群众的阶级仇恨充分激发出来，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了群众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才能达到打倒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目的。在这方面各地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本溪、柳河等县首先召开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在会上斗争了几个影响较大的地主，点火轰开了局面，再派干部到各乡村鼓劲吹风，撑腰壮胆，帮助群众，指导斗争，全县很快就行动起来了。有的县还举办土改训练班，大规模地培



训骨干，提高政治觉悟，鼓励斗争情绪，交待政策，然后到全县各地去开展运动。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月，根据辽东分局的决定，我从通化出发，经桓仁、宽甸到安东检查土改工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着重讲了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我说，要达到土地改革的目的，就必须发动贫雇农阶级去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地主封建势力不是闺房绣花，而是大风暴式的群众运动，象洪水似的直冲。如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无法完成土地改革，也就不能消灭敌人。要相信广大的贫雇农阶级，要大胆放手，把组织贫雇农、树立贫雇农优势放在首位。因为贫雇农翻身问题是土地改革的根本问题。贫雇农是土地改革的主力军，是我们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我还说，在发动贫雇农的过程中，也必须将中农团结起来，辽东的中农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在斗争地主、打倒封建这个大方向上，它同贫雇农是一致的，是贫雇农可靠的同盟军。在运动开始时，不宜把树立贫雇农阶级优势同团结中农相提并论，不宜把主力军和同盟军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因为在贫雇农还没有发动组织起来时，也无法团结中农。所以一定要先形成贫雇农领导核心，树立其优势，同时，教育贫雇农，要坚决紧密地团结中农，不要伤害中农和侵犯他们的利益。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群众普遍行动起来了。不少地方的实践证明，贫雇农愈是发动得充分，力量愈是强大，中农愈向贫雇农靠拢，团结中农的问题也解决得较好。贫雇农和中农团结一致，在党的领导下，以贫雇农团、农会

等组织形式，向地主阶级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地主阶级在国民党占领的半年中对农民的反攻倒算，在世世代代的旧恨上又加上新仇，广大农民新账老账一起算，吐苦水，政治斗争和清算同时进行，地主昔日的威风一扫而尽，地主剥削搜刮所得的浮财又回到农民手中。广大农民在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尝到了甜头，锻炼了队伍，增强了在党的领导下同封建势力斗争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在此基础上，各地都适时地将挖浮财诉苦清算斗争转入解决土地、牲口、房屋等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上来。

平分土地的基础是划清阶级。我们仍然是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让群众自己动手动脑，不搞包办代替。在农民内部一般是采用“一户一议、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方法。如本人不同意，还准许向上级报告，批复后再评。对于划分地主、富农，则是在贫雇农团或代表大会上讨论评定，经上级审查，再由村农民大会（包括中农）讨论通过后确定。在划分阶级的标准上，我们强调必须按照中央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规定，即看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而决不能搞第二个标准。对于干过坏事的和有过这样那样毛病的中农和贫雇农，在政治上可以批评教育，但在划分阶级和分配土地上不能另眼相待，不能提高阶级成分，绝对不能把他们推到敌人的阵营去。划分阶级后，开始平分土地，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牲口、农具、房屋及其他财产，并征收了富农土地和财产的多余部分，按人口分配给农民。在这个基础上也分配给地主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给予生活出路，让其自食其

力，在群众的监督下，通过劳动改造自己。

在划分阶级和平分土地的过程中，由于形势决定必须加快土改运动的步伐，扩大开展运动的范围，而且干部在数量和质量上也不相适应，加之我们对若干问题在政策的指导上也不够及时、不够明确，因而在运动迅猛展开、群众情绪普遍高涨时，有些地方工作粗糙，侵犯了中农和城市工商业者的一些利益，甚至有些地方发生了乱打、乱杀的严重现象。这些偏差在东北局和辽东分局的正确领导下，及时地得到了纠正。

一九四八年一月，辽东大部分地区已按人口平分了土地，土地改革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彻底摧毁了封建势力，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关系，使受苦受难的农民第一次在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站了起来，做了主人。“耕者有其田”这个劳动人民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愿望，无数革命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于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历史又展开了新的一页。

土地改革的胜利，使辽东根据地获得了更加坚实深厚的群众基础，从而立于不败之地。这一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又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打碎了封建枷锁、摆脱了剥削压迫的劳动者，焕发了极大的生产热情。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将土改中发挥出来的积极性转到生产上来。他们知道，现在的劳动，不是为了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政权，自己的天下。辽东地区的广大农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

克服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国民党占领期间的严重破坏，掀起了生产高潮。一九四八年，安东省在保证原有土地全部播种的基础上，还开垦荒地四、五十万亩，粮食总产达到八十万吨，比一九四七年增产八万吨。不仅胜利地渡过了灾荒，而且支援了前线。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一九四八年安东全省交公粮十三万一千一百四十吨。

从先后两次解放的亲身体验中，广大农民懂得，胜利的果实要有人民自己的军队来保卫，只有壮大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东北、全中国，才能保住翻身的成果，受苦人才有好日子过。因此，在土改中和土改后，翻身农民参军参战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许多老人送子参军，年轻媳妇送郎当兵，兄弟几个一起到部队，有的一次不合格就两次、三次地报名。一九四七年本溪土改后，计划一千二百名青年参军，但仅田师付一个区就动员了一千三百人，组成了反攻团。赛马在土改中，五天内就有三千六百余人参军。新宾全县十一万九千人，一个月中，参军五千五百二十五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六强，个别乡村参军人数竟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点三。旅大地区参军的有一万二千余人。安东全省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两年扩兵十万零九千人，连同一九四六年的三万二千余人，共达十四万一千七百余人。整个辽东地区一九四五年十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军人数总计达到三十三万余人。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组成的担架队、运输队支援前线。城市的工厂，虽然遭到过蒋介石军队的严重破坏，但工人们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恢复了生产，为前线提供了大量的物



资。辽东人民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竭尽全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辽东根据地，经过短短的三年时间，就胜利地建成并且得到了巩固，这应该归功于毛泽东、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正确领导，归功于辽东的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及广大干部、党员的团结奋斗，归功于辽东人民的艰苦努力。在斗争中，朝鲜人民也曾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这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在创建辽东根据地的斗争中，无数优秀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流血牺牲，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烈士们的功绩在辽东大地上竖起了永垂不朽的丰碑，人民将永远敬仰和怀念他们。

从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奉调入关，三十五年过去了。去年五月，我有幸重访了当年的根据地，看到那里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把我们战斗过的土地装扮得郁郁葱葱，绚丽多彩，我内心感到了无限的快慰。我想，我们现在写的是辽东人民过去的历史，而辽东人民却用自己的双手描绘了更新更美的今天，他们还将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 在坚持黔东斗争的岁月里

段 苏 权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二、六军团在黔东的木黄会师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五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从建立到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过去，心潮澎湃，瞻望前途，无限光明。忆及二、六军团会师后留下黔东特委和独立师坚持根据地斗争的战斗历程，更加缅怀为争取革命斗争胜利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衷心感谢在艰苦的岁月里支援我们的川黔边各族人民。

## 一、红六军团西征入黔

一九三三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主力行动之前，派出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先行突围。

红六军团作为长征的先遣队，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由遂川横石出发，踏上了新的征途。按照中央的意图，拟

“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sup>①</sup>由于湘敌以重兵围追堵截，未能实现这一意图。后到阳明山打算建立根据地，也不可能。遂渡过湘江占领了广西西延（今资源），拟实施中央规定的第三步计划，向新化、溆浦前进。<sup>②</sup>九月八日，于车田接到中央军委训令。训令指出：在目前情况下，红六军团在新化、溆浦之间山地建立根据地是不利的。依地理条件及敌人部署，目前红六军团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训令要六军团最少在九月二十日以前保持这一区域，力求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旅以下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然后沿湘桂边境行动，经绥宁、通道到贵州之锦屏、天柱、玉屏、铜仁，再转向湘西凤凰地区，与红三军取得联络，协同红三军于湘西及湘西北地区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并于凤凰、乾城、永绥地域，背靠贵州，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一训令，具体地明确了向贵州发展的方向，六军团按中央的命令继续前进。这时，广西军阀派第二十四师从龙胜向城步方向急进，湘敌和桂敌另一部又分途尾追。在湘、桂两敌行将合击的情况下，我军放弃在城步、武冈、绥宁地域立足的计划，在占领通道县城后，决定抢在黔敌尚未部署就绪之前，由通道向贵州进军。

---

① 引自1934年7月23日中央书记处及军委给湘赣省委的指示电。

② 中央7月23日指示电对六军团突围后的行动具体规定：第一步，到达湖南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广大地域发展，并向北与红三军切取联络。

一九三四年，统治贵州的军阀为王家烈。王任二十五军（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黔军共三十三个团，内部矛盾重重。黔军总指挥犹国材（兵力六个团）割据盘江八属；副军长侯之担（兵力八个团）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第三路司令蒋在珍（兵力四个团）割据正安、沿河各县。他们各自拥兵独霸一方，表面上虽属二十五军，但王家烈不能直接调动这些部队。王能调动的，只有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所辖李成章、犹禹九、杜肇华、周芳仁、杨昭焯五个旅，共十五个团。一九三四年五月，红三军进入黔东，除牵制了蒋在珍部外，还有柏辉章部四个团，李成章部两个团，共十个团的兵力。九月，红六军团向贵州进军时，贵州的防御力量十分薄弱。侯之担部远在黔北，按兵不动；犹国材与王家烈为争夺贵州的统治权曾兵戎相见，此时，犹采取壁上静观的态度。由于六军团大军压境，王家烈不得不抽调周芳仁率部急赴湘黔边，以两个连驻守榕江，八个连驻守黎平一带防堵。这时，王家烈部六个团已为红三军牵制，王家烈与犹国材虽因红三军入黔而暂息干戈，但其矛盾依然存在，故王家烈其余的部队，重点放在西面，以防范犹国材。当时，地方反动势力组织的“贵州全省剿匪后援会”唯恐红军“赤化川黔”，积极敦促王家烈“出兵截剿”。王家烈则通电声称：“烈部多在西防，抽调需时”，“至感棘手”，一时无力顾及。因此，六军团领导决定抢在黔敌尚未部署就绪之前入黔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当红六军团尚在湖南城步地区活动时，湘、桂两省军阀各有各的打算：广西方面，力求把红军送得更远一点，



以免威胁桂境；湖南方面，则极力阻止六军团与红三军的会合，以免增加湖南的困难。于是各派代表先后前往贵州与王家烈会晤，协商联合“会剿”方案，王家烈也想借助外省兵力，将红军消灭或逐出贵州。三省军阀的合谋计划达成后，湖南派出了七个团，由第十九师师长李觉指挥；广西派出了四个团，由第七军军长廖磊指挥。湘、桂两敌共投入十一个团进入贵州配合黔军“围剿”我六军团。

贵州人民在军阀的统治下，生活十分贫困，他们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六军团进到剑河的广大地区时，遭到湘、桂敌军的阻击，接着黔敌又包围过来，企图围歼我军，在人民的支援下，六军团跳出了敌人的包围，继续前进，寻求与红三军会合。但红三军具体在那里，还不知道，也没有一个地形目标可找，六军团仍向西走。进到乌江南岸时，接到中央军委电令，说“桂敌现已向南开动，红三军已占领印江，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六军团随即调头向东北方向前进，拟越过石阡、镇远之线，向江口寻找红三军。进入石阡，前卫部队在甘溪与桂敌遭遇，战斗失利。六军团陷入了湘、桂、黔敌军二十四个团的追堵包围之中，被截成了三段。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只有三千来人突出包围，损失很大，处境十分困难。这时，黔东特区显示出了它的重要作用。

## 二、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

黔东特区，是贺龙、夏曦、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一九三四年六月在贵州东北部的川黔边区创建的一块根据地。自从湘鄂西中央分局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在湖北咸丰大村召开的会议上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苏区，确立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战略思想后<sup>①</sup>，红三军转战到贵州，建立了黔东苏区。它的面积包括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和四川酉阳五个县毗连的地区，纵横两百余里，人口十万以上。秀山的部分地区亦成为游击区域，由于当地反动势力较强，未能及时建立起基层苏维埃。红三军在黔东特区成立了革命政权——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接着，又建立了区、乡政权，有十七个区革命委员会和一百多个乡苏维埃政府。在各级革命政权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在六十七个乡的范围内，有六十三个乡进行了分田地；与此同时，广泛建立了各区、乡游击队，县成立独立团，建立了沿河、德江、川黔边、黔东、印江五个独立团（印江独立团一九三四年九月在一次战斗中失利，减员甚大，余部编入黔东独立团），收编了当地“神兵”，组成黔东纵队，在这些地方武装的基础上成立了

---

<sup>①</sup> 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从大村有了这个决定，于是我们由恢复湘鄂边的口号改为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中心口号。”

由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的武装——黔东独立师，师长贺炳炎，政委熊仲卿。另外，开始恢复了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发展党员等等。红三军在黔东特区短短的时间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黔东苏区的开辟，使部队得以休养生息。但是由于创建的时间仅五个月，不断受到敌人的攻击，敌我力量十分悬殊，他们也很需要与六军团会合。贺龙获悉六军团进入黔东后，一方面命令红三军、沿河独立团、川黔边独立团各一部开展攻势，将进入根据地的敌人驱逐出去，以巩固根据地；与此同时，亲率部队南下策应，辗转各地寻找六军团。红三军南下，牵制了黔敌柏辉章、李成章两部七个团和湘敌周燮卿部，减轻了对六军团的压力。甘溪战斗失利后，由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突围出去的一部分队伍，在沿河县铅厂坝与红三军一部会合。贺龙等得知六军团的准确方向和困难处境，率队急速前进。十月二十四日，六军团与红三军在印江木黄会师了。黔东特区使六军团突围后有一个立足点，得以收拢部队，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两军处于困难环境下的会师，大家高兴极了。当天在石梁宿营，次日进到黔东特区东北端的南腰界。从甘溪突围的各路部队在这里收拢。为了庆祝会师的胜利，在南腰界召开了祝捷大会。从此，两支红军汇成了一股强大的突击力量，成为中国三大主力红军之一。黔东特区对于保持和壮大革命力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二、六军团向湘鄂川黔前进的基地，为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地。

### 三、黔东特委和独立师的组建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对于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两军负责同志进行了研究，鉴于当时中央红军正与敌人苦战于湘粤桂边，蒋介石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集四十万兵力，前堵后追这一严重形势，两军负责同志认为，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以积极的行动，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如何行动，向那里发展？曾考虑以梵净山为依托，发展根据地。但是黔东特区区域小又不巩固，且贵州山地多，人烟稀少，给养困难，不利于大兵团行动。于是，决定向湘西发展，但黔东这块根据地不能丢掉。据此，十月二十五日给中央军委电报，报告了敌我力量及地方条件等情况，建议“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在南腰界两军负责人又作了反复的讨论，确认了上述原则，并决定留下一支武装坚持斗争并牵制敌人，与主力在湘西的发展相呼应。接着，部队进行了整编，红三军恢复二军团番号，七、九两师编为三个团，黔东独立师的沿河独立团、黔东纵队及其他独立团的一部编成一个团，共四个团。原第七师改为第四师，辖第十团和第十二团，原第九师改为第六师辖第十六团和第十八团。红六军团因减员，暂编为三个团，十七师辖第四十九团、五十一团；十八师辖第五十三团。决定成立黔东特委，组建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留在根据地会同



各区、乡游击队，由黔东特委统一领导坚持黔东斗争。新成立的独立师以未编入主力部队的黔东独立团、德江独立团和川黔边独立团为主体，加上六军团留下的三百来名伤病员所组成。其建制为三个团，一团（黔东独立团）团长秦真全，二团（德江独立团）团长潘××（名字忘了），三团（川黔边独立团）团长马吉山。原红六军团五十三团团团长王光泽任独立师师长，我担任黔东特委书记兼独立师政委。这支武装成为坚持黔东特区斗争的主要力量。

六军团与二军团会师时，因中央红军突围长征，湘、桂两省军阀急令入黔追击六军团的部队“刻日返省”以加强对付中央红军的力量。追击二、六军团由黔军王家烈负责。此时，四川军阀刘湘为阻止我二、六军团入川，派第五师的达凤冈旅和独立田忠毅（田冠五）旅驻守川黔边境；割据湘西的军阀陈渠珍，派周燮卿部向南腰界方向急进。当我军从木黄经松桃石梁到南腰界集结期间，川敌达凤冈旅已进至沿河晓井一带；湘敌周燮卿部也接近南腰界，并在距南腰界十余里的龙池（龙塘）与我军交战，被我击溃。黔敌王家烈于十月二十六日下午率特务团到达思南，任命参军长刘民杰为前敌总指挥，分兵两路：一路由第二旅旅长李成章率领第二团（戴玉堂）、第三团（周相魁）、第十团（宋华轩）进至松桃红石板一线；另一路由前敌指挥王天锡率领第五团（李维亚）、第六团（刘鹤鸣）、第九团（罗习斌）进至印江天堂至松桃火烧桥一线，以第十三团（袁锦文）驻于印江刀坝，保持李、王交通。王家烈决定亲自督师将二、六军团“追出黔境百里以外，与川、湘友军

围剿。”<sup>①</sup> 面临敌人重兵追击，黔东独立师最紧迫的任务，是牵制住当前的敌人，掩护主力向湘西进军。

#### 四、掩护主力东进 坚持黔东斗争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红二、六军团主力由南腰界挥师北上，进占酉阳，将敌人西调，创造东进的有利条件。主力撤离后，特委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川、湘、黔敌人进逼南腰界，黔东苏区已被敌人分割，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在副主席秦育青领导下，带领各区、乡游击队尚在瓦厂坝<sup>②</sup>、铅厂、白石溪、谯家一带中心区活动，处境十分困难。为了巩固根据地，决定独立师回到黔东特区中心区，在游击队的配合下，打击敌人，把敌人牵制住，掩护主力的进军。二十九日，我们从南腰界出发，向西南方向前进，进入黔东特区中心区域。二、六军团主力北上时，黔敌李成章、王天锡两部继续跟追，当发现黔东根据地还有我部队活动，王部追至酉阳、李部追至百福寺后，又急速返回，与川、湘敌人对付我们。这样，三省军阀部署追剿我二、六军团的十多个团全扑向黔东特区。

敌人除正规部队外，另一股反动势力是民团。还在红三军开辟黔东特区之前，湘、鄂、川、黔四省敌人在重庆成立“剿共联防指挥部”，四川的西（阳）、秀（山）、黔

---

① 引自黔军参谋长谢汝霖通电，原件存贵州省档案馆。

②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最初设在白石溪，随着战争环境的变化，先后迁土地湾、铅厂、瓦厂坝等地。

(江)、彭(水)划为重点“剿共”、“防共”区。各省建立团防机构，四川成立了民团总指挥部。酉、秀、黔、彭先后成立团务委员会，集中民间枪支。刘湘还“价拨”一万多支枪，仅酉阳一县，就有八千人枪。贵州则成立全省保卫团，各县、区成立团防指挥部。湘、鄂两省亦建立了相应的民团组织。敌人施行所谓“军团合一”，即军队与民团的合一。因此，湘鄂川黔“剿共联防指挥部”由刘湘任总指挥，贵州的保卫团也由王家烈兼理。各地的民团头子大多数原为反动军队中的大小头目。如铜(仁)、松(桃)、江(口)、省(溪)民团指挥杨德村，曾担任黔军第一师的参谋长，思(南)、石(阡)、印(江)、沿(河)民团指挥周世勋，当过黔军的旅参谋长。许多则是土匪头子，出于反共的需要，反动政府公开委任为民团的头目。贵州岑巩县政府为扩充“围剿”黔东特区的力量，对在当地为匪的蒋云青、彭德胜二人，认为他们“尚能与区团联络一气，协力堵截”红军，“为地方计，权委”担任保卫团的队长。<sup>①</sup> 这些反动民团，是地头蛇，情况、地形熟悉，是一股十分凶恶的敌人，后来我们吃了他们很大的亏。当二、六军团主力部队撤离后，趁黔东特区的空虚，许多民团又随着军阀部队气势汹汹地返回，分驻各地，参与围攻我们。

当时，包围我们的敌军，北面，川敌达凤冈两个团于晓井一线，湘敌周燮卿部控制南腰界至晓井一带；西面，为黔敌第三师第四旅杨畅时控制从沿河至土地坳各要地；

---

<sup>①</sup> 引自岑巩县政府1934年10月26日的委任报告，原件存贵州省档案馆。

东面，川敌田冠五旅及秀山杨卓之民团在龙潭、清溪一带，以及松桃的李成章、王天锡两部六个团和原驻刀坝的第十三团共十一个团；南面，为黔敌驻德江张家湾一带的土著军阀姜兴尧一个团。敌人四面围攻，紧缩包围，妄图压迫我们于狭小地域消灭之。十月二十八日，川敌电令达凤冈旅由平洞口推进，向甘龙口、南腰界攻击，目的是企图围歼我二、六军团于南腰界及其附近一带，并截断与黔东特区中心区的联系，与此同时，达旅另一部会同驻沿河的黔敌又向特区的淇滩、沙子场等地发起攻击。我主力撤离南腰界后，我们急速返回中心区即投入了战斗。十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沿河淇滩、沙子场、小河场一带，红军与川黔两军发生剧战。我们打退了敌人北面和西面的进攻。十一月上旬，黔敌又从西北面发起进攻，敌军杨畅时部前往大坝、枫香溪、白石溪、谯家铺等地大施清剿，均遭失败。接着姜兴尧部从西南面向枫香溪进攻，在我军的英勇反击下，狼狈回窜，我乘胜追击至德江袁场，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我们在根据地内的活动，配合了主力的进军。这期间，独立师和游击队，三面反击，消灭了部分敌人，保卫了根据地中心区。敌人采取轮番的战术，不让我有喘息之机。此时，东面的黔敌又开始进攻。黔东独立师组建时约五百多人，有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步枪三百余支（每枪子弹仅三至五发），加上各区、乡游击队一百多人，近七百人的武装力量与优势敌人苦战了十多天，虽给敌予部分杀伤，我亦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由于连续战斗，弹药已十分缺乏，加之敌人四面封锁，给养困难。黔敌又



发起了新的进攻，如果再与敌人于当地周旋，将继续消耗自己的力量，并难摆脱敌人的包围。在此形势下，特委研究，决定独立师采取外线作战，向梵净山转移，依托梵净山与敌人展开游击战；各区、乡游击队留在本地坚持活动，独立师从外线将敌人引开，减轻对根据地的压力，并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以利坚持长期斗争。这一战略方针确定后，我们作了下面的部署：由王光泽赴瓦厂坝，集中各区、乡游击队，进行组编，建立起统一的领导，在根据地内继续活动；黔东独立师各部到印江沙子坡集中，准备转移，以第一团担任左翼后卫，阻止黔敌姜兴尧和杨畅时部的追击，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秦育青率领的黔东特区保卫队和特区机关工作人员为右翼后卫，以防川湘敌人的追击，掩护主力撤离后随即向梵净山集中。并把重伤病员安置在根据地内。

十一月十日，我与王光泽师长率黔东独立师两个团从沙子坡出发，十二日，左翼后卫完成任务后尾主力前进，十五日，右翼后卫撤离，开始了外线作战的阶段。

我们率领的两个团从沙子坡经红溪到天堂。当地土豪薛三、倪洪昌平日欺压百姓，我们打了这两家土豪，向群众分发了他们的浮财，继续向木黄急进。敌李成章恐我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有倒击印江县城或进入江口县之举。急令第二团戴玉堂移驻朗溪至合水一线，令第三团周相魁配合驻永义至居龙一线与驻江口县境之柏辉章部控制梵净山区。十一日，我们抵达木黄，又经锅厂、芙蓉、平所进入了梵净山张家坝至护国寺一带。后卫第一团尾我们后

亦顺利到达。

另一支后卫部队秦育青部，十五日从白石溪撤离拟到沙子坡随独立师之后向梵净山前进时，途经枫香园（东风）遭敌人伏击。特区保卫队战士和机关工作人员，奋力抗击，我牺牲了八位战士。由于敌人的阻拦，他们未能赶到沙子坡，遂取道茅草盖、花园，准备入川去湘西寻找军团主力。十七日，行至胡家坝遇地方民团拦截，到下寨坝，又遭印江北二区民团大队长安永成部的袭击。他们且战且走，到达来安营塘房坳，为毛坝区伪区长陈文澜带领的民团夹击，牺牲二十多人，被俘二十四人中遭敌惨杀的二十一人。余部辗转经岩柯坝（鸣呵）、化稿坪进入四川秀山县境的百岁、坝芒一带，继续受敌截击，除少数战士脱险外，几乎全部遇难。

黔东独立师进入梵净山后，部署第一团驻守山脚的滥泥坳，第二团驻守苏家坡，第三团驻守大园子，师部设在护国寺。并派出警戒于钟灵寺、凤凰山、马槽河一带，以防敌人的偷袭。梵净山，是印江、江口、松桃三县的结合部，这里层峦迭嶂，古木参天，地形复杂，进可攻，退可守。打算以护国寺为中心的这一带作基地，开展游击战争，寻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立足后，积极备战，在各团驻地区域构筑了简易工事，砍伐树木拦截道路，开展筹粮。为解决弹药缺乏的困难，还搬来制作鞭炮的工具，自制了一些大炮仗，战斗时点燃爆响，以壮声威，迷惑敌人。与此同时，在苏家坡、大园子、团龙等地打了这些地方的土豪，所得物资一部分留作军用，一部分给当地穷人，深

得人民的拥护。

我们进山两三天后，敌人不断进犯。十五日，在苏家坡和关口岭，十六日在交流塘、二十一日在滥泥坳等地，小股黔军和民团进犯，均被我击退。二十三日，敌周相魁团在印江民团东防大队张汉如部的配合下，集中了近两千人的兵力进攻我驻滥泥坳的第一团。由于敌众我寡，我军后撤上山，以一个连于途中的帝母庙迟滞敌人。敌军占领滥泥坳后兵分三路，左路进攻苏家坡，右路进攻大园子，中路继续追击我军。我在帝母庙阻击敌人的一个连，受到从苏家坡、大园子两翼敌军的包围，未能撤上山，除十几人突出包围后下落不明外，其余伤亡或被俘。三路敌军追到护国寺，我与敌展开了战斗。鉴于此处较为开阔，不利歼敌，我们且战且退，至钟灵寺，预先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痛击敌人。敌狼狈后退，后又组织几次反扑，激战了一天，均未能攻上。我歼灭了敌军百余人，我军伤亡二十多人。这时，我们的弹药已所剩无几，粮食也吃完。同时，黔敌柏辉章部一路从江口德旺推进到梵净山脚的坝梅寺一带，另一路从松桃向寨英急进，江口县的民团已上山配合“清剿”我军，对我形成了包围之势。在此紧急情况下，特委研究认为，我们返回黔东根据地已坚持了二十七天的斗争，牵制了敌人，估计军团主力早已进入湘西，完成了掩护任务。根据目前的形势，必须抢在敌合围尚未就绪之前，撤出战斗，到湘西寻找主力部队。

在我们转移到梵净山的同时，留在根据地中心区活动的游击队也受到敌人的攻击。他们转入深山密林中进行游

击活动，不断袭击敌人，与我们在梵净山的斗争相呼应。敌人采取分割包围的办法，“清剿”游击队。虽然敌我力量的过于悬殊，但由于留在中心区的各区、乡游击队艰苦奋斗，一直坚持到十一月下旬，敌人才占领了根据地。

根据地沦陷，我们更难以在梵净山立足。按照特委的决定，十一月二十四日，黔东独立师撤出战斗连夜转移，越过梵净山顶峰，经回香坪、鱼坳、马槽河、瓦溪、快场、凯岩、凯文、落满到寨英。在这里捉住了柏辉章派到此地催办军粮的两名副官，得知孟溪敌人防御薄弱。我们在普觉宿营，封锁消息，二十五日凌晨，出敌不意，袭击了孟溪区公所，缴获十四支步枪，二百多发子弹，一面国民党旗帜。为了迷惑敌人，我们打着这面旗帜，伪装敌军，大摇大摆地前进，驻大路的民团，以为“省军”到来，不及提防，我乘势一举打垮了民团。十一月二十五日，我们进入了四川秀山县境的兰桥。军锋直指梅邑（梅江）。驻守梅邑的秀山县杨志鹏中队和镇公所乡丁，企图拦截，我军迅速占领了附近的飞山庙制高点，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一触即溃，仓惶向秀山方向逃去。在进攻中，我带领通讯班冲入梅邑镇，被埋伏于街边的乡丁杨光和放枪打穿右踝骨，枪弹在肉中爆炸，骨头碎裂，不能行走。战士们气愤已极，击毙乡丁一人，杀了反动盐商吴二毛，将盐巴分给老乡。

十一月二十六日，王光澤率部折向西南又进入贵州松桃的净岷北上，经瓦厂、五里牌、九龙向迓驾前进。抵张坝堰时，区长姚雨珍和当地民团龙海清尾追而来，企图截击我后卫部队，我因弹药缺乏和为了争取尽快到湘西，



未予还击，但敌人紧追不放。至新庄，又遭龙海清部与民团杨永成部袭击，我后卫五名战士牺牲。时已天黑，到迳驾附近的石号坡，民团麻秀臣部拦截，与后面尾追的民团夹击我军。独立师不得不进行还击，与敌展开激战。我牺牲战士二十多人，战斗持续几小时，未能甩开敌人。第三团团长马吉山率领一个排，奋力苦战，掩护部队撤出战斗。此时，弹药已消耗殆尽，马吉山英勇牺牲。由于夜黑阴雨，坡陡路滑，地情不明，我军除伤亡外，失散和被俘者有之。鉴于敌情和任务，王光泽流着眼泪，叫干部和战士将我抬出战场，率部进入四川秀山县境。我被安置在秀山县雅江乡车田村老乡李木富家养伤。李木富为避免敌人的搜索，将我藏在半月形小山洞内，送给我一些草药医治枪伤。藏了二十多天，我左脚冻伤和感染，失去三个足趾。当地几家老乡都很穷，无法供养，我只好离开这里。临行前，老乡苏士华请木匠做了两根“下”字形拐杖相送。我拄着拐杖，拖着伤脚，沿途乞讨回到茶陵，在家养伤，以后到了延安。

我留车田村养伤后，部队继续前进。经过长途跋涉，连续苦战的独立师指战员，在迳驾战斗一天粒米未进，艰难行军到达化溪已是半夜。为了不惊动老百姓，大家都在露天坝里宿营。次日晨，经过红岩等地时，老百姓已做好早饭，他们不知道来的是什么军队，都躲上山去了。我军战士路过这里虽已饥饿难当，但丝毫没有动老乡家煮在锅里的白米饭，只是弄了点喂猪的猪食充饥。十一月二十七日，我独立师沿悬岩攀上海拔一千多米的川河盖，进入川

湘交界的大板场，走过了出发以来最艰难的一段路程。二十八日凌晨，大雾弥漫，不辨方向和地形。黔东独立师准备最后离开根据地跨入湖南，遭到了原八十二师团长文代章部和地方民团头子刘九河、王西之、王尊禄、陈树生等地主武装的袭击。我弹尽粮绝的疲惫之师，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战斗失败了。为了尽可能地保存力量，王光泽师长和秦贞全团长决定化整为零，分路突围绕道向湖南永顺方向寻找主力。后来，贺礼保和彭仁山等少数同志找到了主力部队。王光泽师长在一位老乡家隐蔽住了两天后，十一月三十日，在化装向湖南转移时的上川路上，被涌洞民团发现，不幸被俘。

王光泽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党的好儿子。他是湖南衡山县吴集乡人，自幼家境贫寒。一九三〇年在茶陵腰陂镇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组织苏维埃政权，被选为腰陂乡苏维埃政府工会主席、赤卫队长。一九三一年腰陂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区警卫连，光泽同志先后担任副连长、连长。次年，调任茶陵县警卫营长。警卫营扩充为独立团，王光泽任团长。不久，独立团编入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为五十三团，他继任团长。一九三四年，红六军团奉命突围西征，光泽同志率部随军出发，与军团长途转战进入贵州。在与敌人作战中，他指挥沉着，不畏艰险，身先士卒，深受战士们的爱戴。被俘后，送到酉阳龙潭田冠五旅部关押，忠贞不屈。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临难时，光泽同志大义凛然，高呼“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英勇就义，时年三十一岁。他为中国人民的

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黔东独立师和游击队与超过自己数十倍的强敌周旋了一月之久，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的任务。在此期间，我二、六军团主力取得了龙家寨战斗的胜利，攻占了永顺、大庸、桑植，扩大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在坚持黔东的革命斗争中，我英雄的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为保卫根据地，配合军团主力的行动，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

红二、六军团主力撤离后，敌人进攻根据地中心区。为了消灭敌人，淇滩大队第一分队长黄海仁、杨家湾游击大队副队长何帮中等，在战斗中奋不顾身，英勇牺牲；在梵净山与敌人的战斗中，战士们在弹药缺乏的情况下，用滚木、擂石抗击敌人，拚死战斗；马吉山团长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临终之前还勉励同志们和敌人战斗到底，呼喊着“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根据地被敌人占领后，敌人疯狂进行报复，在刑场上，面对敌人的屠刀，我们的战士大义凛然，高声骂贼，慷慨就义。英雄的指战员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写出了中国革命史上壮丽的篇章。这里应当提到的，由深受压迫的农民为主体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官府的“神兵”，在红三军入黔时，他们就是可靠的同盟军。当其改编成红军和游击队后，始终坚决斗争。他们坚定地团结在特委周围，与黔东独立师一道，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我们将永远记下他们的历史功绩！

在艰苦斗争的环境里，人民群众与我们同甘苦，共患

难。他们为部队侦察敌情，传递消息，为我们煮饭，打草鞋。农民简才英（女）为了帮助我们生产火药，在失火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部队撤离黔东特区时，女游击队员张国云等许多人全家随军行动，帮助部队，有的被敌人打散后流落他乡。人民群众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收留红军战士。川河盖战斗后，被秀山人民收留和照顾的独立师失散的战士和伤员达数十人之多。有的被群众收留长达五年之久。战斗后，从雅江到川河盖一带，除王光泽师长被民团捉去外，没有一个红军战士遭到杀害。有的还被群众护送到湖南。黔东人民在为保卫苏区的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英雄的战斗，坚强的人民，他们的不朽业绩，将永垂青史。



## 我所了解的八路军南京办事处 成立前后国共合作的有关情况

钱之光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党、我军设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的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地下斗争，所有机构都处于严格的秘密状态。如果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公开机构，那么还应该从在西安设立“红军联络处”开始。

早在一九三六年春，我党已应张学良将军的要求，派有代表常驻西安，与东北军联络。一九三七年二月，周恩来、叶剑英在西安与顾祝同谈判，经国民党政府同意，在西安设立了“红军联络处”。地址在七贤庄一号，由叶剑英负责，李涛、宣侠父都在联络处工作。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就两党关系以及我党合法地位问题，还在继续进行谈判。在八月九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蒋介石之邀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期间，国共双方就红军改编问题达成了协议。八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并同意设立总指挥部。八月二十五日，中

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由叶剑英在南京组设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大报纸，包括中央日报、申报、新闻报等，都以大字标题，登载了朱德、彭德怀八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就职通电，并报导了“该路军现已派叶剑英组设办事处”的消息。实际上，办事处在这之前，已经开始工作，不过，这时才正式公布成立。九月十二日，按战时序列，八路军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司令，办事处也称为十八集团军南京办事处。南京办事处设在市区鼓楼附近的傅厚岗六十六号，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公馆里面。这是因为周恩来与张伯苓有师生关系找到的一幢楼房。南京办事处成立之后，由于西安当时仍然是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联系的一个重要枢纽，所以西安的联络机构仍予保留，只是把原来的红军联络处改名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我是在八月下旬到达南京的。自从一九三六年二、三月我与李克农到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就红军与白区通商事宜达成协议后，就时常奉派到白区处理有关经济事务，往来于延安、西安等地。一九三七年夏，我又奉派到上海协助毛泽民把国际工人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而捐募的外汇，设法由上海转去西安。“七七事变”后不久，有一天在上海毛泽民家中吃饭，在座的有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毛泽民，还有我和刘少文、钱希钧。恩来同志向我们谈了当时的形势。他说：现在芦沟桥已经打起来了，看来全面抵抗不可避免。国民党反共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但现在因为抗日，在政策上不能不有所放宽。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把抗日战争变成真正的全面抗战。仗一打起来，就不是短期所能结束的。将是艰苦的、长期的战斗。我们要注意积蓄革命力量，既要反对关门主义，也要反对冒险主义。在这次谈话后，周恩来就同秦邦宪、林祖涵到庐山同国民党谈判去了。我协助毛泽民完成了任务返回延安后不久，大约在八月二十日左右，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要我立即去西安。这时，他已同朱德从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回到西安。在西安他对我说：南京办事处只有叶剑英、李克农几个人，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你马上动身到南京办事处去协助他们工作。于是我就立即匆忙就道。

在西安上火车和我同行的有刘长胜。当时他穿了一套柞蚕丝的西服，戴着一副眼镜。面孔晒得黑黑的，看上去有点象日本人。加上他在车上很少说话，引起了坐在我们对面的一个国民党空军军官的怀疑。我和他攀谈并拿出恩来同志写给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的名片给他看，当这个军官知道我们是周恩来派到南京去的之后，立即对我们肃然起敬，态度变得很热情、友好。后来，我们一同在徐州下火车，他还特地为我们找旅馆，并代我们付了旅馆的房钱。第二天，我们也给他代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这一事实反映了当时国民党爱国军官厌恶内战，赞同国共合作抗日的心情。

我到了南京办事处，这时在办事处看到的人有：叶剑英、李克农、童小鹏、夏之栩、熊天荆、张月霞等。当时

南京办事处的人不多，叶剑英是八路军驻南京的代表，他要同国民党谈判，又要同各方面联系；李克农是办事处处长，外勤内务他都要管，因此，有关军需、财务等工作，他们要我负责。八月底，秦邦宪也到了南京，这时党中央刚开过洛川会议，他是中共中央代表。随同秦邦宪一起到南京的，有齐光、康一民、吴志坚等，这几个同志也都参加了南京办事处的工作。

这时，华北战场上平、津已经陷落，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八路军已改编完毕，正开赴抗日前线。上海方面战事在激烈进行，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在这举国沸腾的日子里，在南京，我们党要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也是十分紧张的。就其主要的来说，一是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就红军作战、国共两党关系及陕甘宁边区等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讨论，要求国民党承认我们党的合法地位，承认我们的边区和解决我们的防地等。二是要求释放政治犯。当时“七君子”虽已获释，但张学良仍被软禁。我们在白区的党组织被破坏后，许多同志被捕。要把被捕的同志营救出来，要重建党的组织。三是开辟宣传阵地，宣传我们党的抗日救国的纲领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此外，办事处还有领取军饷、军用物资，采办和运输陕甘宁边区所缺乏的物资等任务。

## 一、关于国共谈判

一九三七年二月至九月，国共两党代表先后在西安、



杭州、庐山、南京等地，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面，我对国共谈判这段史实，以问题为主，谈谈我个人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我到南京办事处时，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次，时间也不短了，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限共”、“溶共”和妄图对红军与陕甘宁边区实行控制的顽固立场，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如在有关红军的编制人数、指挥机构、出发路线和作战区域等重要问题上还迟迟不能达成协议。

“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紧，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了次要的地位。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党中央为了具体地建立国共两党的合作，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要求国民党向共产党保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共产党也向国民党保证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中共中央这个电报发表之后，得到全国各方面的热烈拥护。国民党在五届三中全会宣言中，表示愿意“和平统一”。蒋介石在谈话中，也表示将有限度地开放言论，集中人才和释放政治犯。

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派张冲到西安，与周恩来谈判，解释了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经过。三月初，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陕甘宁边区问题和红军改编问题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开始会谈，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决定由周恩来将双

方谈判的问题作一总结，变成条文，电蒋作最后决定。但事隔两天，顾祝同、贺衷寒单方面将条文进行修改，如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省政府，取消“民选制度”；将红军“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等等，提出一个我方根本不能接受的方案。双方发生激烈的争论。周恩来电告党中央，指出“这些争执，基本仍然是民主政府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贺可以能解决得了的”；并致书顾祝同，说明“一切有根本动摇的可能”，要他仍以原来商定的条文电告蒋介石，否则请张冲回南京向蒋介石当面对面陈述。

三月下旬，周恩来赴杭州与蒋介石本人会谈。党中央提出谈判条件确定为十五条。主要是中共方面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重申前提的四项保证；对国民党方面，则要求保证彻底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实现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释放政治犯，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等等。周恩来与蒋介石会晤时，将十五条当面提交。这次会谈，蒋介石未提出具体意见，表示几个月以后，中共可参加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关于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不隶属于陕西省，但为应付各方，要我方推荐南京方面的人，充当正职，要我方担任副职。

六月初，周恩来到庐山与蒋介石再次会谈，对两党合作问题，商谈结果为：中共发表宣言；边区政府由国民政府派正职长官（由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边区自己推荐副职，事情仍由边区自己办理；在狱中共人员由中共

开名单，分批释放；中共派代表出席国民大会；中共干部可参加国防会议等等。七月四日，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到西安（以后到南京和上海），代表党中央起草共同合作宣言。十五日到庐山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面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我方向蒋介石提出：中共宣言应允许各报刊载，国民党中央应发表书面谈话，赞成此项宣言；释放中共在狱党员，中共有调查之权；容许人民公开讨论宪法草案及救亡大计；召开国防会议，中共参加。蒋介石把我党起草的宣言，交邵力子看，邵表示无意见，蒋又交康泽研究。

八月初，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后，听从了康泽对中共中央宣言的修改意见，认为宣言提出四项保证以后，只要说明为什么共赴国难就够了，后面所提的政治纲领应该删去。当时我们党没有同意，中央决定“不忙于要求发表”。在八月九日南京的国防会议上，康泽对中共宣言提出不要提民主和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的意见，当即受到周恩来、朱德的批评。九月初，秦邦宪到南京后，向国民党提出，要求早日发表我党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使我党取得合法地位，并迅速解决陕甘宁边区问题。九月中旬蒋介石又派康泽与秦邦宪谈判，康泽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说“后面说的一大堆政治主张是多余的”。对此，双方曾发生激烈的争论。后来，党中央指示，宣言可以修改，但绝不照康泽的意见办。宣言经过修改后，有关纲领部分，基本上仍维持我党原来提出的三大纲领的精神。最后双方同意，于九月二十二日，中央通讯社播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也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样，两党合作的基础就算正式确立。二十九日，毛泽东发表署名文章，说：“共产党的这个宣言与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九月二十四日，孙夫人宋庆龄也在上海发表《国共统一运动感言》，高度赞扬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关于红军改编的问题。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在与蒋介石、宋子文谈判时，曾表示红军愿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当时就商定这个问题由张学良负责与周恩来洽商解决，原则上按实有人数改编。以后因蒋介石回南京后扣留了张学良，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一九三七年二月，顾祝同进入西安，才又把这件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在我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同顾祝同谈判期间，蒋介石为缩小红军编制，曾密电顾祝同，只准按四团制师编两个师，计八个团，兵力为一万五千人，不能再多。并提出各师的参谋长与师内各级的副职，都要由“中央派充”。当时陕北红军实有人数，有三万多人，即使按南京乙种师编制（每师二旅、六团，兵力一万人），至少也应编三个师。由于顾祝同不敢违背蒋介石的电令，坚持只准编四团制两师，多次商谈，均无结果。三月下旬，周恩来在杭州会见蒋介石时，蒋同意编三个师，人数四万多人，并表示总指挥部可以成立，他不派人来参与我们的部队。但六月八日，周恩来在庐山与蒋介石会谈时，蒋却推翻了在杭州会谈时的诺言，表示



在红军改编后，师之上不设指挥机构，只设政治部统率，由周恩来任主任，康泽为副主任。并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的荒谬主张，当即被周恩来严词拒绝，谈判无结果。后来，双方同意由国民党政府发表中共部队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照十二个团编制，人数四万五千人，设立政训处。但对指挥机构，仍未明确。六月十八日，周恩来返回延安。二十二日致电蒋介石，指出，中共中央认为：“红军改编三个师，上边如无指挥机关，无法进行改编。”同时表示：“朱德去留，影响极大，不能离开军队。”七月中旬，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到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时，蒋又令张冲转告，说中共部队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蒋介石使用这些手段，意图很明显，无非是想借此把红军主力分散，使改编后的红军各师，变为脱离共产党的领导、缺乏统一指挥的各个孤立的部队，可以任他调遣、摆布。为此，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表明：“这与我党主张，出入甚大，事难行通。”七月下旬，我党为作好抗战准备，主动将主力红军自行改编为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一万五千人。到八月二十二日，因战局越来越紧张，蒋介石才正式同意，颁发了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三个师的番号。要红军沿绥东察北向热河推进。但对在三个师之上是否设置指挥机关的问题，仍未解决。八月九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期间，经过协商，才最后确定在三个师之上设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原来，蒋介石还曾指令康泽物色人选，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及三个师的参谋长。康泽已拟派复兴社的李秉中为政治部副主任,并从“特训班”、“别动队”里挑选三个师的参谋长。当时,我方拒绝派政治部副主任,对参谋长问题,也只同意派联络参谋。这时,因“八一三”上海战争已经爆发,蒋介石急于催促红军开赴华北前线作战,所以只好同意派联络参谋;对派遣各级副职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我军为了迅速开赴抗日前线,早在八月四日,于红军改编问题尚未与国民党全部达成协议之前,周恩来、朱德、秦邦宪、林祖涵、彭德怀、任弼时等就在陕西三原云阳镇,研究了部队整编,就红军主力参加抗战的问题,向党中央提出报告。确定我军的方针是:参战不迟疑,但要独立自主担任作战任务,发挥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有补充与使用兵力的自由;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在察绥晋三角地区有便利补给联络的后方;作战序列坚持我军只属于一个方面指挥的原则,由陕西韩城、平民两路渡河,经同蒲路北上作战,后方分设于包头、大同。八月中旬南京国防会议后,周恩来与朱德于八月十九日返西安时,我军大部分已集中三原,待命出发。按照国民党参谋本部白崇禧、黄绍竑的意见,确定我军以两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沿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察南蔚县一带集中;另一个师沿陇海路转平汉线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蓟州、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我党中央认为国民党的这个方案,意在将红军主力分割出动,我们不能上这个圈套。所以坚决未同意。我们坚持作战序列只属于一个方面指挥的原则,最后确定大部分由韩城渡河,

沿同蒲路北上，不走陇海、平汉线。九月初，我军开赴山西前线，这时汤恩伯、刘汝明等部数万之众，已从南口、张家口退到蔚县一带。而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则先拟派一二九师到忻口，后又要红军开赴阳原、大同，都是意在使红军担任正面堵截，企图假手日寇，消灭我军。毛泽东当时电告周恩来，指出汤、刘等部集中察南，我原定防区已无法立足，对红军有利地区，应是繁峙、五台、浑源、涞源、阜平、唐县、平山等地。根据这样的战略部署，我军向晋察冀前线挺进。九月下旬在平型关首战告捷。这一次大捷，同国民党部队在华北战场接连溃败，形成强烈的对照。不但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我党、我军在全国军民中的威望，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许多国际人士看到红军的作战能力。我们在南京宣传我军在前方的胜利，人民群众看到八路军的人，都投以敬佩的目光。说到八路军，人人都翘大母指，当时我们在南京的八路军工作人员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接待。到十月份，我军在晋察冀成立了军区司令部，开创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谈判当中，我们对国民党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但同时我们也连续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控制、分割红军的各种阴谋。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既统一，又独立。

关于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当时大约有一万多人。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谈判时，商定将南方各省游击队的主力，编为一个军，

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党中央也基本同意。叶挺提议，红军游击队改编后叫“新四军”。北伐时，叶挺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独立团团长。当时第四军共产党员比较多，作战英勇，是北伐军的劲旅，号称“铁四军”。现在用新四军的番号，就是表示要继承铁四军光荣传统的意思。十月十二日，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了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由于项英长期与外界隔绝，对全局形势不甚了解。他在九月份到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准备将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九月二十九日，又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各地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点编”。当时党中央张闻天和毛泽东致电秦邦宪和叶剑英，要他们电告项英到南京一行，把中央的有关政策告诉他，指出南方游击队不宜无条件集中，应该保存在南方原有的战略支点。认为“项英同志似乎还不明白在统一战线中应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他在江西的做法是上了国民党的当。”并要他到南京后，再去延安同中央进行讨论。项英于十月二十三日到达南京，秦邦宪、叶剑英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他于十一月七日到延安。叶挺是在十一月下旬又到南京办事处的。这时南京形势已经紧张，他同叶剑英晤面后返回武汉，曾于十二月赴延安。以后叶、项由武汉赴南昌，新四军军部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在南昌正式宣布成立。在南京时期，新四军还处于组建阶段。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问题。由于实际主持国共两党关系



谈判的陈立夫，对边区政府的隶属问题，一直主张隶属于陕西省政府，不同意隶属于行政院。前面说到，一九三七年三月间，杭州会谈时，蒋介石表示“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可以不隶属于陕西省，但正职要由我方推荐国民党方面的人担任。在这以后，我方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表示可以在三人中任择一人，任命为边区行政长官，副行政长官由我方林祖涵担任。后来，蒋介石按照康泽的意见，改派丁惟汾担任正职，但也迟迟未发表。只是在七月十七日发表讲话，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可是，后来他任命朱德为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后，曾对朱德说过，“你抗战了还要边区！”他想给个总司令的名义，就可以取消边区，所以多方面设置障碍。这个时期，讨论的焦点除了行政长官的人选以外，还有边区的地位问题，边区行政首长是称长官还是称主任，边区政府是设厅还是设处，另外边区包括哪些县等等。九月二十二日，党中央张闻天和毛泽东致电秦邦宪、叶剑英，提出边区问题我们还是要林祖涵任正职，边区行政首长称长官不称主任，边区机构设厅不设处；边区应包括郿县、洛川、淳化、枸邑、正宁、宁县、西峰、镇原、预旺、安边、清涧、河口、瓦窑堡、宜川在内；边区每月经费，应为十五万元；要设保安部队八千五百人；国民党不得干涉边区内部事务等等。秦邦宪、叶剑英按这些意见与国民党谈判。一直到九月下旬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十月十二日第三百三十三次会议上，才通过丁惟汾为陕甘宁边区行政长官，林祖涵为副行政长官的任命，并说：在丁惟汾未到任前，由林祖涵代理。

但行政院在通过此项决议时，又注明：因边区问题“尚无章制以资依据”，“俟章制规定再发表”。以后所谓边区的章制，一直未见下文，所以对边区的任命，也被束之高阁。至于每月十五万元经费和保安部队八千五百人等，也均未承认。对边区问题，国民党虽采取拖延的方针，但我党中央已在九月六日将“陕甘宁工农政府”正式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并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决定民主选举特区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三八年正式召开特区代表大会。从此，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民主政治的先导。

## 二、营救“政治犯”和重建 长江中下游党的组织

“释放一切政治犯”，是我党提出的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个重要政治条件，也是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党禁、各党派一律平等、实现真正民主统一的一项重要政治主张。每次谈判，我党都要提出这个要求。但国民党方面，也是采取拖延的办法。象释放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问题，本来在西安事变蒋介石离开西安时，已表示同意，但以后迟迟未见行动。至于释放我党被关押的同志，在我党催促很急的情况下，陈立夫等人往往以“你们开出名单来”加以搪塞。直到一九三七年六、七月两次庐山谈判，就释放政治犯问题达成协议，我方提出“释放中共在狱党员，中共有调查之权”以后，再加上抗日战争日益扩大，情况才逐步改善。

七月三十一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对被关押在苏州的沈钧儒等“七君子”首先宣告开释。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叶剑英乘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之便，曾亲自到“首都反省院”探视在押的政治犯，向他们作了政治报告，并当场保释了王根英、夏之栩、熊天荆三个同志。本来，当场要求保释张琴秋，但院方借口张琴秋是顾祝同方面委托代管的，不便立即开释，所以改保熊天荆。当时，由童小鹏把她们接到傅厚岗南京办事处。王根英转移到别处，夏之栩、熊天荆就留在办事处工作。以后又陆续接出张月霞、黄文杰、陶铸、方毅、王鹤寿、钱瑛、吴仲廉、刘顺元、彭康、黄杰、周惠年、曹瑛、潘梓年、陶万蓉等，他（她）们出狱后，有的参加了办事处工作。陈独秀是在八月二十一日由国民党政府宣布从原判有期徒刑八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后释放的。

从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国民党军政、司法部门先后颁布了一些法令。如八月下旬国民党军政部指定苏、浙等十五个省为军事犯（包括被关在军人监狱的政治犯）保外服役暂行办法的施行区域；国民党司法行政部也决定原判五年以下徒刑的人犯，都可以交保释放。九月上旬，司法部又批准江苏高等法院临时处置监犯办法：“五年以上人犯，得酌商当地军事长官，编作输送队，派往战区服役”；情形紧张时，十年以下者也可“迳予开释”；“有病及年老、体弱者，除死刑、无期徒刑外，经过批准，也可以释放”。

根据以上这些规定，刑期较短的政治犯，于八月下旬

陆续释放；刑期较长的，就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以朱德、彭德怀或叶剑英的名义，写信给军政部长何应钦，指名要求调往战区“服役”。多是一封信写十来个名字，一般能放出七、八个人。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刑期不足十五年的，绝大部分都被营救出来，他们有的是办事处派人接出来的，我和童小鹏、齐光、黄文杰、夏之栩、熊天荆等，都到南京监狱接过人。张琴秋、陶万蓉、吴仲廉等就是我接出来的。也有的是出狱后看到报上有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消息，主动找到办事处来的，象张恺帆、林李明、林若冰、陈离、黄先、桂蓬等，就是主动同办事处联系，接上关系的。

九月中旬，国民党军政部以“疏散”为名，下令把关在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的一百多名刑期在十五年以上的重要政治犯和少数军事犯，集中解送安徽和县姥下镇；余下的一百多名政治犯，全部关到“狱中之狱”的南监。经过狱中的同志不断斗争，办事处的全力营救，加上战局日趋严重，这两百多名政治犯也在九月下旬、十月上旬陆续分批获释。到安徽和县去接大批政治犯的是萧桂昌，他刚从中央军人监狱中获释没有几天，就以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副官的身份，带着少校军衔，代表南京办事处去接人的。

起初，出狱同志很少，大都还住在傅厚岗办事处，有的参加了办事处工作。以后，获释人员增多，就在西流湾一号租了一家旅馆。出狱人员一般先安排在鼓楼旅馆中，由办事处派人前往登记、发钱，让他们更换衣服，并送文件和《解放》周刊供他们学习。还让他们书面汇报狱中情



况和一些同狱人员的具体表现，进行一般了解。这个期间，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出狱的大约有一千多人，其中大部分转送延安，少部分留在南京、上海、西安工作，也有一些让他们回本地开展群众工作。对少数自首、叛变的，就发路费让他回家。

在营救大批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出狱的同时，在秦邦宪的领导下，又开展了重建长江中下游党组织的工作。当时办事处协助秦邦宪搞组织工作的是黄文杰；夏之栩、王凯负责秘密交通联络。

开始重建党组织时，首先是就近建立南京市委。原中共南京市委自一九三四年八月被敌人破坏以后，南京只有很少几个党员在活动，但组织已不存在。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大批平津的流亡学生在党组织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领导下，陆续到达南京。秦邦宪指示由北平来的几个同志组成南京市委，以后又陆续发展了一批人入党。

为了恢复和建立长江中下游各省党的组织，在秦邦宪、董必武的统筹安排下，将在南京出狱的陶铸、钱瑛、方毅等派到湖北，与中央派往湖北的郭述申共同组成湖北省工作委员会，郭述申任书记，钱瑛任组织部长，陶铸任宣传部长。刘宁一、刘顺元出狱后，有一段时间在南京帮助工作，以后被派往上海。十一月，刘顺元又由上海被派往浙江，到嘉兴因火车不通，折回南京，以后去了武汉。由苏州出狱的张恺帆、林李明等六人，因找不到组织关系，就同到张的家乡安徽无为搞抗日宣传。他们在无为听到中共在南京设有办事处的消息，主动写信来联系，办事处发电

报要他们来宁。后来，派张恺帆回家乡工作。十一月，又派李世农去无为，同张恺帆、桂蓬组成皖中工委，李世农任书记。黄文杰对他说，你们先成立皖中工委，恢复一个县的组织就建立县委，有三个县委就组成特委，有三个特委就成立省委。到一九三八年五、六月，成立了安徽省工作委员会，由彭康任书记，李世农任组织部长。当时，党的许多工作不但对外是由办事处联系，对内有许多事情，如恢复党组织问题，也都是用办事处的名义传达、布置。

经过这一段建党工作，使我党在长江中下游的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 三、开辟宣传阵地与开展统战工作

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党报，也是我党与国民党长期交涉的一个问题。因为陈立夫坚持不允许我党公开办报，一直未能解决。当时南京办事处主要靠散发《解放周刊》和油印宣传品以及通过邹韬奋主办的《抵抗三日刊》等，不断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各种政治主张，宣传八路军前线的战绩以及传达各种消息。九月下旬，经过交涉得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的同意，开始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因为邵力子对中共的态度比较温和，所以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新华日报》社由出狱不久的潘梓年负总责，有章汉夫、许涤新、徐迈进、吴敏（杨放之）等参加。经理部由我负责，还有寿松涛、赖祖烈等参加工作。筹备期间，我出面请于右任先生写了《新华日报》的报头。此

外，由王超北到上海买了大批白报纸；又在中山路租了一处房子作为营业部，还通过地下党员沙文威（史永）请原南京《朝报》的同学租到一个印刷厂。这些筹备工作已大体就绪，但因战局逆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等撤退到武汉以后再筹备出版，因此，潘梓年、章汉夫、杨放之、徐迈进等人，在十月十九日就离开南京前往武汉筹备。《新华日报》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正式创办出版的。因为在南京不能出版，所以就把买来大批白报纸，还有其他一些物资，派赖祖烈、寿松涛、钱生甫押车运往西安，再由西安设法转运延安。为这件事，我曾亲自出面交涉，到铁道部和下关车站联系。这时，下关码头已极为拥挤，还随时有敌机空袭。我找到下关车站的站长，让他协助，他们很快调拨了车皮。搬运工人们听说是八路军的東西，他们不辞辛苦，不怕空袭，而且还只肯收一半运费。工人们讲：“拥护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八路军抗日，到处受到人民群众欢迎和拥护的情景。

这个时期，我党的统战工作还比较多地是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接触。周恩来在南京与宋美龄、宋子文、邵力子、张治中、孙科等来往比较多。他同蒋介石谈判，就是在孔祥熙家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因北伐时期，同国民党高级将领、黄埔军官接触很多，有不少熟人。周恩来在南京时，白崇禧、黄琪翔都曾到他的住处拜访或回访。朱德也曾到龙云住所拜访龙云。叶剑英因参加军队将领的宴会，也接触许多高级将领。他在军事会议上，几次阐述了我们

党在对日作战问题上的战略思想。在南京，我们办事处没有电台，就是借用第二战区阎锡山驻京办事处的电台。

除了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外，我们在日常工作接触中，也做统战工作。当时南京办事处要向国民党军需署及兵工署领取军饷及军械，还要采购物资转送延安。向军需署领饷是由我负责的，每月军饷大约是五十万元。领饷的手续很繁琐，要填写五联单，盖十七个图章。因为当时军需署长周骏彦，曾任两浙（浙东、浙西）盐运使，军需署里盐运使署的人不少。我因曾在盐运使署工作过，所以周骏彦和他下面的许多工作人员和我都是熟人。通过这个关系，工作联系比较方便。我们采办的布匹、纸张、军鞋、药品等，都是通过火车运往西安转运延安或前线的。对这许多物资或军用品，只要说是八路军的，车站很快就给我们拨车皮。当时同铁路及军需、兵工、军医等各方面联系工作，都比较顺利。

南京办事处当时已十分注意对青年的工作。在抗日救亡的形势下，大批革命青年询问如何去延安。办事处就在《抵抗三日刊》上以公开答问的方式，详细介绍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情况。有些青年到解放区去，办事处为他们开介绍信。这时八路军的通行证，是沿途通行无阻的。

我们在傅厚岗六十六号（现在是青云巷四十一号）大约呆了三个多月。一九三七年八月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时住在傅厚岗姚琮的公馆。姚琮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副主任，负责接待。因此，就



在姚宅的附近找到这所张伯苓的公馆。当时住在傅厚岗的有秦邦宪、叶剑英、李克农还有我和童小鹏、齐光、李应吉、吴志坚、康一民等。袁超俊在十月下旬，由上海到南京就留在办事处工作。黄文杰、刘顺元、王鹤寿、钱瑛、方毅、喻屏、夏之栩等搞党的工作，住在西流湾一号。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失守，十九日苏州又沦陷。国民党政府在二十日宣布以重庆为陪都，迁都重庆。同时国民党的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一些主要部门都迁往武汉办公。因此，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也决定分批撤往武汉。

《新华日报》的人员在十月十九日已先期赴武汉。秦邦宪是同章汉夫一起乘船先去武汉的。我和齐光、李应吉、康一民、夏之栩等在十一月十九日乘火车赴徐州经郑州转赴武汉。叶剑英、李克农在十一月二十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张闻天汇报，信中说：“在现在的情况底下，京中负责人员均已离京，我们留此已无意义，将于二十二、三日由陆路经芜湖转赴武汉，小廖（指廖承志）同行，钱之光等先头人员业于十九日前赴武汉。新华日报在京已无可能开办，报馆人员均先赴武汉，汉夫先去，梓年随后亦到，到武汉后即继续办理合法手续。”

叶剑英、李克农、廖承志、童小鹏、袁超俊、吴志坚还有司机王应絮共七人，于十一月底乘两辆旧小轿车由南京经芜湖、南昌、长沙转赴武汉，在十二月十日到达长沙。因为汽车坏了，袁超俊、王应絮留在长沙修车，叶剑英等改乘船去武汉。

南京于十二月十三日陷落。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虽然从成立到撤退总共不足四个月的时间，但我们党在此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的领导下，在两党谈判、建党、军队改编、统一战线以及宣传与动员群众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党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八路军在前线旺盛的战斗意志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所取得的光辉战绩，我党工作人员艰苦朴素、同群众打成一片的革命作风，拆穿了国民党长期歪曲我党形象的反动宣传，给国民党统治区带来了崭新的革命气象。各阶层人民群众，包括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都对我党另眼相看，加深了对我党的认识，对我们党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段时间的工作为我党进一步团结广大群众，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

# 解放战争时期云南武装斗争概略

郑伯克

解放战争时期，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同时，为要有个安定的后方，疯狂镇压云南人民革命运动。七月，在昆明暗杀了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以后，又进行过几次大逮捕。然而富有革命传统的云南各族人民，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解放区军民的胜利反击，在城市里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在农村燃起了熊熊烈火，建立了革命武装，展开了武装斗争；最后，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主力部队，消灭了负隅顽抗的残匪，解放了云南。

## 一、准 备

云南的党组织是在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土地革命时期遭到破坏，一九三五年至抗战前夕又恢复重建。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间，南方局先后派我、侯方岳、刘清来云南，组成第三届云南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委员侯方岳、刘清。在此期间，根据党中央关于荫

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省工委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城市和农村积极开展群众工作。

一九四五年秋，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内战危机却严重存在。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布置云、贵、川等省农村据点作好将来打游击的准备，以免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一九四六年二、三月，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旧政协决议，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三月初，我到南方局汇报云南地方工作，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二楼上，王若飞指示：对于战争与和平，要作两手准备。在谈到开展农村武装斗争时，他说，条件成熟的地方要发展武装斗争；条件不成熟的要准备发展，切勿过早暴露目标。

遵照若飞同志的指示，中共云南省工委当即从各方面积极准备武装斗争。

滇东北宣威宝山乡等地，农民生活非常贫困，遇到年景不好、青黄不接的时候，更难以过活。一九四四年以来，省工委先后派许南波、蒋永尊、张伯林等到这个地区工作，并在农民中发展党员。一九四六年春，侯方岳又到这里布置工作。一九四七年夏，当地农民党员以自发的形式组织了一支小规模の武工队。

在沾益播乐中学，党组织也做了许多宣传、组织工作。党员樊子诚在这里有一定的工作基础，省工委先后还派李德仁、杨弘光等到学校工作。这里的学生大都来自贫苦农民家庭，在学校受到了党的教育，在党的影响和推动下，



他们回到农村发动农民，做农民的工作。

滇东南罗平等地农民，在反动政府与土豪恶霸的压迫剥削下，生活日益贫困，荒年有些人被迫卖儿卖女。一九四一年前，党在金鸡乡、板桥镇、中山乡一带已建立了支部，发展了农民党员四十多人，以兄弟会、互助会等方式，团结了农民群众。自抗战初期，罗平中学即是我党地下工作的据点。党先后派了些干部去当教师，在学生中传播进步思想。这些学生毕业后陆续被输送到农村工作。党员宋维业、张鸿逵、任学源、张树岗等，先后经党决定以群众面目出现，经过民选和反动政府委任，到罗雄镇、板桥镇、中山乡等乡镇中心小学当校长。党还派过一些党员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直接做农民的工作，或经过学生家长做农民的工作。为掩护党的工作，党还派张执中、张鸿逵、张蕴朴等进入国民党县党部，并担任了重要职务；派任学源、陈忠弼经过民选当了中山乡正、副乡长，张鸿逵当了板桥镇副镇长；派刘国林、赵玉清等经过活动当了保长、壮丁队长。还调农民党员和进步青年去扛枪，掌握武装。

一九四六年冬，刘清到罗平蹲点。这时，罗平旅昆（明）党员亦陆续回乡。到一九四七年，党员已发展到一百多人，党在农民中已掌握八百人枪。同年十月，县常备队与地主武装进犯中山乡。党动员了四百余人枪上山对抗，敌人被迫撤兵。

路南圭山、弥勒西山绵亘数十里，聚居着勤劳勇敢的阿细、撒尼族贫苦农民。多年来，他们以各种方式反抗汉族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一九四一年以来，省工委即派党员、

民青成员到这里工作。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的党员骨干马千禾（识途）、李晓（曦沐）、侯澄、陈彰远（刘新）、王松声、马如瑛（黎勤）等先后组织进步青年到这里。他们深入群众，以结拜兄弟、姐妹等方式交朋友，团结群众；还把有培养前途的彝族青年送到昆明上学，让他们学文化，在民主运动中锻炼成长。后来，这批青年有些成了革命骨干，如毕恒光先后在昆明中山中学、金江中学上学，入党以后，一九四六年经省工委派回路南圭山，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斗争。

一九四四年，省工委调党员宋文溥到弥勒县。经民选等合法手续，宋被选为竹园镇镇长。党又派党员彭克昌、吴昌宗当了保长。以后，陆续调阿细族和汉族进步青年到镇公所，把枪杆子掌握在手里。

一九四六年冬，长期同党有联系的原滇军新三军军长张冲（彝族，当时未入党），借参加伪国大的机会，离开昆明经南京去延安。他在离开云南之前，向省工委报告，他有一百多条枪，隐蔽在圭山、西山彝族旧部属骨干手里，归何献龙（彝族）联系。省工委经欧根约何面谈，何遂根据省工委的意见把人枪逐步集中起来，待机而动。

一九四七年六月，省工委派祁山到弥（勒）泸（西）地区（包括路南、陆良）工作，积极准备武装斗争。

一九四七年初，省工委派岳世华、陆琼辉（陆毅）、吴士霖、舒守训（文庄）、宋启华（宋树言）等去文山地区开展工作，并派舒守训、吴士霖在边疆建立交通线，以准备这个地区游击战争开始后，有回旋余地。

滇南地区，从一九四五年秋以来，先后由滇南工委成员马胜之（识途）、张华俊等负责，积极地进行了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滇南建水建民中学校长刘宝煊，长期同党有联系。一九四一年以来，省工委先后派党员和进步分子方仲伯、孙仲宇、陈家震、岳世华、廖必均、何以中、卢华泽等在该校任教。他们在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秘密组织读书会，发展党员、民青成员，然后输送到农村去开展工作。

滇南还有石屏师范、石屏宝秀中学、墨江中学和宁洱磨黑中学等学校。党先后派锺风彩（君劭）、齐亮、高彤生（高志远）、周锦荪、吴子良（显钺）、黄知廉（黄平）、陈盛年、董友松、曾庆铨、蒋仲明等在学校工作。经过党培养教育的青年学生，分批输送到建水、石屏、元江、墨江农村去，发动、组织农民，从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逐步发展到武装斗争。

为了利用合法形式进行工作，在元江，傣族党员范嘉乐利用其舅父（岔科乡乡长）刘士纯的关系，到刘处工作，掌握其武装。党员黄源昌在建水，经过民选，任乡合镇镇长，掌握武装。党员刘光卿在石屏宝秀镇任镇长，掌握武装。元江彝族党员方金城，利用其姑父（青龙镇镇长吴泽）的关系，任副镇长，掌握其人枪。

在滇西，一九四七年省工委先后调黄平、欧根、王以中、徐菊英等去剑川工作。以后又调陈家震、廖新伦、陈海等去楚雄、祥云等地工作。他们以鹤庆师范、剑川中学等校为据点，将在学生中发展的党员和民青成员派到农村，

在纳西、傈僳、白、藏、彝、汉等族农民中秘密组织抗征会、联谊会、兄弟会、姊妹会等外围团体，发动群众，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使当地乡保政权逐步陷于瘫痪或半瘫痪。

省工委在积极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同时，对非党武装进行了调查了解，并确定了对策。云南境内有力量大小不等的地方实力派和地主武装，例如滇南有所谓“四大天王”、“十八路诸侯”，仅罗平一县即有“四路诸侯”。省工委按照“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等原则，对他们分别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省工委经过滇南工委，派干部了解了在建水、石屏、龙武等地活动并揭出民主旗帜的龙永和、白小七、李存周等部的情况，派廖必均了解曲溪王庭珠部的情况。这些武装，其头目大都是惯匪，其部属大都是破产农民。一九四八年春，原滇军退伍军官段英在大姚、姚安等地揭出民主联军旗号，不少破产农民和青年学生前去参加。省工委派岳竞先调查了解其情况，以非党面目，鼓励其反蒋，并对其部队纪律、军民关系等提出过好些意见。段未接受，后失败，被捕杀。

## 二、展 开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末，我到上海向上海局和钱瑛<sup>①</sup>汇

---

<sup>①</sup> 钱原任重庆局、南京局组织部长，后任上海局组织部长，仍分管从重庆转至各地的组织关系。



报工作。钱瑛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她说，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为配合解放军的胜利反攻，牵制云南的蒋系部队，我党应在云南全省大规模地展开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由于党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大规模展开武装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具备。钱瑛询问了干部情况后，决定组织游击队，让朱家璧负责军事指挥，张子斋等负责政治方面的工作。并指示，建立起游击队时，要鲜明地打出旗帜，待中央批准后，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一九四八年一月，省工委在建水召开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参加会议的有郑伯克、侯方岳、张华俊<sup>①</sup>，列席的有王子近。由于考虑到滇东南地处三省接壤，敌人统治较弱，我党又有长期工作基础，会议决定在这个地区发动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由滇南工委负责接朱家璧等同志回云南，然后加速准备在建水、石屏、元江地区发动起义；滇西等地亦积极准备开展武装斗争。

一九四八年二月，朱家璧等接到省工委通知后，化装成马帮，经思普地区、元江，到达石屏宝秀。在朱家璧等到来之前，这里已经组织起了一支基干队伍。这支队伍是由滇南工委从宁洱、建水、石屏等地农村抽调出来的农民、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从个旧矿区抽调出来的矿工和民青成员约七十多人，枪二十多条和省工委从昆明民主运动中抽调出来的党员干部董友松、牛琨等政治骨干合并组成的。

---

<sup>①</sup> 一九四七年经上海局和钱瑛决定，张华俊为云南省工委委员。

随即由朱家璧带领，分批秘密地越过铁路，转移到路南、弥勒之间的圭山、西山地区。

当时，滇东南地区正是农忙季节，国民党政府借口禁烟、铲烟苗，派军队下乡敲榨勒索，民不聊生。彝、汉族农民中，到处燃起反抗的烈火。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民青成员刘诚、张望等迫不及待，率领青年学生和武装农民数十人，在泸西旧城暴动，进攻乡公所，号称中国民主联军西南纵队。可是暴动队伍在地方保安团的进攻下，寡不敌众而失败了。由此，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国民党中央军二十六军五七九团和地方保安团、保安营、城防队联合向圭山、西山地区“扫荡”。地下党武装为维护群众利益，出动阻击敌人。阿细族党员杨治廷在指挥作战时被俘，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圭山、西山各族农民“抗捐”、“抗铲”的群众斗争蓬勃发展，方兴未艾，旧城事件又招来了敌人的进攻，武装暴动犹如箭在弦上，势在必发。经省工委紧急决定，在地方党的组织动员下，很快组成了一支拥有百余人枪的游击队，其中有宋文溥掌握的竹园镇公所的几十条枪，有何献龙掌握的张冲留下的几十条枪。扛枪的大都是彝、汉等族青年农民，政治、文化战士大都是从昆明下乡来的青年学生。游击队转战弥勒、路南、陆良、罗平等县，所向披靡。到罗平时，地下党派任学源带领一百五十人枪参加了游击队。敌军向罗平板桥镇等地进攻，游击队转到外线作战，迂回攻占了师宗县城。当敌军气焰嚣张，到处烧杀抢劫时，游击队在弥勒西山包围了尾追之敌，经过激战，毙敌八十余

人，缴获步枪五十余支。游击队南下到邱北境内时，宣威武工队几十人枪参加进来。陆良绅士杨体元所属反蒋武装，在杨守笃推动之下，亦南下支持。到达开广地区时，在陆琼辉等地下党员的密切配合下，游击队占领了广南县城。地下党员孙太甲率领城防大队起义，参加游击队。游击队到达文山地区时，已是一支拥有人枪千余的部队了。

一九四八年五月，省工委在昆明西山高峣开会，听取了张子斋、祁山的汇报后，为了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势力的矛盾，集中力量孤立打击蒋介石，决定将这支游击队命名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朱家璧为司令员，何献龙为副司令员，政治工作由张子斋、祁山负责。

省工委把游击战争开展情况向钱瑛作了汇报，钱瑛告知了华南分局。

一九四八年五、六月间，粤桂边工委委员郑敦来昆明，口头传达了华南分局并钱瑛的通知，要云南省工委把滇东南地区，即昆明经开远到河口铁路线以东、昆明经曲靖到平彝线以南地区划归粤桂边工委，把这地区发展起来的游击队亦划归粤桂边工委领导。

省工委遵照上级指示，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及刘清负责的罗（平）盘（县）地区、祁山负责的弥（勒）泸（西）地区和岳世华负责的开广（即文山）地区党组织和工作交给粤桂边工委。是年六月，游击队南下同粤桂边纵队会师。

农村游击战争的展开，震撼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一九四八年七月初，昆明警备司令何绍周在营以上军官和特务

参加的会上布置，要千方百计地从“学潮”中破获中国共产党在云南的首脑机关。七月十六日晚，何绍周又在昆明大中中学校长、报社记者座谈会上说，在“进剿”圭山、西山地区中发现游击队里有不少昆明下乡的学生，因此要在镇压“学潮”中，找到共产党的首脑。在一九四八年“反美扶日”运动中，昆明一千多革命师生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绝大多数人坚持了革命气节，党组织未遭到破坏，敌人阴谋未能得逞。

游击队主力部队南下后，省工委照原定部署，在省内各地全面开展游击战争。

滇东南：罗盘地委将埋伏的地下武装，以中山乡的几百条枪为基干，建立起一支游击队，编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一九四八年春至一九四九年夏，他们先后粉碎了敌中央第八军、二十六军五次进攻，共毙、伤敌近四百人，争取了敌副营长以下三百六十多人枪起义。经过五次反“扫荡”的胜利，罗平已成为较巩固的根据地。之后，主力部队即转入外围开辟新区，转战师宗、平彝和贵州的盘县、兴义、兴仁、修文、水城等县，以及广西西隆、西林地区，在滇黔桂边境建立了根据地。

弥勒、泸西地区，杨守笃、杨体元所部在南下后，又折回陆良，组成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第三支队继续在泸西、陆良等地发动群众，坚持斗争。

“自救军”第一纵队南下同粤桂边纵队会师时，不少指战员因染疟疾病死。十月，粤桂边负责同志庄田与“自救军”一纵队司令员朱家璧，率领“自救军”的六百多人、粤



桂边部队的二百多人进入云南后，“自救军”一纵队的独立大队在广南、西畴等地歼敌数百人，缴获机枪四十五挺、大炮六门、步枪六百余支。十一月，粤桂边书记周楠又率领粤桂边部队的一百五十多人和“自救军”一纵队的六十多人进入云南，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摧毁伪政权，解放马关等县城，建立了滇东南根据地。

滇东北：一九四八年秋，在杨守笃率部奔袭支援下，宣威宝山中学、沾益播乐中学师生及附近有组织的农民，由李德仁、高怀等率领，组成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永焜支队，转战沾益、宣威、会泽等县，发动群众，清匪反霸。一九四九年二月，永焜支队奇袭会泽雨碌，俘滇东“剿匪”指挥部五百余人，缴获步枪三百余支。之后，乘胜前进，解放了会泽县城，缴获步枪四百余支及大批物资，部队发展到二千余人，建立了滇东北游击根据地。

滇南：一九四八年初，省工委即派刘宝煊、方仲伯等党员到元江农村，准备开展武装斗争。他们以建水、石屏、元江等县反“三征”斗争中培养出来的农民积极分子为基础，加上利用合法关系掌握的武装，又经民青成员李宣明争取到她父亲李和才（元江米里崇善乡乡长，哈尼族）的支持，于一九四八年夏，在元江蓬扯建立起游击队。这支队伍有哈尼、彝、傣、汉等族农民五百余人。游击队建立后，首先在窪底消灭了反动地主杨华林部。同年秋，猪街伏击，全歼新平专署保安独立大队，俘获保安副司令，并粉碎了蒋系中央军九十三师的进攻。之后，又攻克石屏、阳武、墨江等县城，歼灭了反动地主武装“元墨剿匪大队”，

游击队发展至一千六百人枪，乘胜由滇南直逼滇中，震动昆明。

一九四八年冬，我到上级机关汇报工作返昆后<sup>①</sup>，即到峨山甸中召开临时会议，向滇南游击队及滇中地区负责同志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会上决定游击队主力立即南下到敌人控制力量薄弱的思（茅）普（洱）车（里）佛（海）南（峽）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不久，省工委派袁用之到这个地区加强工作。一九四九年一月，游击队已发展到一千六百余人，在元江编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二纵队，刘宝焯任司令员，余卫民为副司令员，张华俊为政委，唐登岷为政治部主任。这时，以省工委委员李雨枫、张华俊并原昆明市工委成员高彤生（志远）组成的工作组也到这一地区工作（按：一九四九年一月，侯方岳调离，上级调李雨枫补上，省工委成员仍为三人）。在归侨党员的积极参加下，游击队争取到开明绅士罗正明的支持，部队发展到六千余人，先后解放了思茅、宁洱、江城、景谷、镇沅等县。

第二纵队留在元江等地的一部，加上彝族农民所组成的游击队合编为一个支队，解放了元江等县，在建水、石屏、元江地区建立了根据地。

对云南武装斗争发展的情况，省工委及时向上级作了汇报。党中央、毛主席十分关怀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一九四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指出：党

---

<sup>①</sup> 这时钱瑛参加了华南分局的领导工作，原南方局所属组织关系仍归钱继续联系。

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在南方几个大区域内（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粤桂边区，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和浙江东部南部）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使这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发展到了三万余人。”<sup>①</sup>

滇西北：经工委黄平、欧根等准备后，这一地区也于一九四九年初展开了游击战争。以白族贫雇农为主要成员的洱源乔后自卫中队（当地党组织是利用乡政权合法关系建立的），在盐场税警队地下组织的配合下，袭击了税警大队，缴获二千八百多银元和十三万元现钞。剑川、兰坪、鹤庆等县暴动后，洱源县长甘彝（我地下党员）率领常备队起义。起义队伍由小到大，组成了一千多人枪的游击队，先后攻占剑川、兰坪等县城。省工委命名这支游击队为“滇西北人民自卫军”，由黄平、欧根等负责。他们在白、藏、纳西、傈僳等族人民的热烈参与支持下，粉碎了拥有几千人的反动武装“滇康共革盟民主联军”的叛乱，壮大了自己。几个月中，自卫军陆续解放了剑川、丽江、鹤庆、永胜、华坪、洱源、邓川、兰坪、维西、中甸、碧江、贡山、福贡、德钦等县，建立了滇西北根据地。

滇西：祥云、楚雄、镇南地区，在滇西工委陈家震等领导下，一九四八年冬，以彝、汉等族农抗会员、贫苦农民为基础，团结开明绅士李鉴洲，组成了一支游击队。这支队伍在清匪、反霸斗争中成长，并争取了弥渡自卫队和云南驿教养院武装起义。经过袭击云南驿防空站战斗，队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86页。

伍更壮大了。一九四九年五月，游击队攻克盐丰县城，俘敌七十余人，缴获步枪七十余支，机枪两挺。部队在战斗中已扩大到上千人，经省工委批准，命名为“滇西人民自卫团”，陈家震负责政治，李鉴洲负责军事。他们发动群众，摧毁了部分区乡政权，建立了人民政府，建立了滇西根据地。自卫团先后打退了中央军二十六军两个团和地方保安团的“清剿”，解放了祥云、弥渡、景东等县。

昆明周围：一九四八年冬，当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二纵队从元江挥师北上时，玉溪、峨山、新平地区的反动势力纷纷向昆明逃窜。在滇中地方工作的温宗姜、董治安、杨一堂等趁机发动彝、汉等族农民，组织峨山中学进步学生，建立了一支近千人的游击队。游击队击溃反动地主武装，并争取到玉溪、峨山联防队的起义，建立了滇中游击根据地。

元谋、罗次、禄劝等地，一九四九年夏，在李天柱、孙林、王元昌等领导下，组织了武定县自卫队起义，加上李方英等在安宁、罗次等县组织的游击队，建立了一支近千人的队伍，在滇西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根据地。

综上所述，云南从一九四八年初，大规模武装斗争展开以来，到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游击战争已有很大发展，游击队活动遍及全省九十多县。滇池边上的昆阳，昆明远郊的安宁、大板桥、大小连山等地都有游击队的活动。游击队已解放六十多个县，根据地正日益巩固，有条件的正在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云南已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



云南武装斗争的开展，是与城市地下工作的配合与支援分不开的。以学生运动为主的昆明民主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一九四五年“一二·一”运动后，全市四十四所大中学校，绝大多数的学生自治会都在党的秘密领导下（经过民青）。秘密学联在学生中有很大的号召力。在党的号召下，学校师生一批批地到农村去，到游击区去。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先后从昆明输送到农村和游击区的师生达两万人以上。他们到各族农民中生活，同战士一起跋山涉水，浴血战斗。许多人后来成了开展武装斗争的骨干，好些青年师生为云南人民的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从一九四七到一九四九年，昆明工人中有党员、工盟成员三百多人参加游击队。兵工厂工人一百二十人，在党员带领下，组成一个大队，到滇中游击区参加战斗，并担负修理机械的工作；电讯局党组织先后派出十四位电讯工作人员到游击队架设电台，担负通讯联络工作。他们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中英勇战斗，兵工厂工人在战争中牺牲的就有三十多人，地下印刷所的董士荣，一九四八年在陆良被俘，坚贞不屈，慷慨就义。

昆明市职工在党的领导下，以各种方式支援武装斗争。国民党政府中央航空公司、电讯局、第四运输处职工给游击区送去了几部电台；大成实业公司职工秘密生产炸药供给游击队；马车工人、长途汽车公司工人不断地输送革命干部和进步青年到远郊区，经过农村中据点，转送到游击区；昆湖轮船职工输送过大批革命干部和青年到昆阳等县，

这些同志由此再转道去游击区；铁路职工在朱枫、陈敬思、魏赞章等组织下掩护过大批革命同志去滇东北、滇东南和滇南；铁路沿线，都设有地下接送站，革命人员和武器、药品在铁路革命职工的掩护下，顺利通过关卡，从未被特务和敌人的岗哨发现过。

### 三、解 放

一九四九年八月，解放大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广东进军。在云南境内，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已发展到三万余人，地方护乡团、游击队和民兵已有十万多人，游击战争遍及全省。国民党的许多县长（约近七十人）不敢或不能到任就职。两广解放后，解放大军将直指云南，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云南全省解放已指日可待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粤桂边纵队和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庄田、朱家璧为正副司令员，周楠为政委。粤桂边工委改称桂滇边工委，滇东南和左右江游击根据地合称桂滇边区。

一九四九年六、七月，华南分局派林李明来昆明<sup>①</sup>，传达分局通知，撤销云南省工委和桂滇边工委，成立滇桂黔区党委。一九四九年八月中下旬，在滇东南邱北召开区党委扩大会议，正式宣布了华南分局的通知。会上决定，按分局通知，三省游击队均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

---

<sup>①</sup> 这时钱瑛已北上到解放区。

纵队（简称“边纵”），庄田、朱家璧任正副司令员。下辖十二个支队，两个独立团。其中除两个支队在广西左右江外，云南境内计十个支队、两个独立团——滇中、滇北独立团。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区党委会结束。会上决定派我去昆明，代表区党委处理昆明、滇东北、滇南、滇西、滇北、滇中等地工作，到滇南布置打通滇南和滇东南的联系，周楠亦经昆明去分局工作。

这时候，蒋介石仍妄图以云南横断山脉地区为依托负隅顽抗，一面调集八军、二十六军、八十九军及地方部队七十四军、九十三军对“边纵”“围剿”，分几路向我根据地进攻；一面在昆明制造“九九整肃”事件：在国民党军统局长毛人凤、西南保卫处处长徐远举直接指挥下，从九月九日起，几天之内在昆明逮捕杨青田、李群杰等共产党员以及民主人士、军工工人共四百多人。妄图彻底破坏我地下党组织，以挽救其垂死的命运。

针对敌人的最后挣扎，区党委决定让朱家璧率领西进支队两个团挺进滇西，以转移敌人对滇东南的进攻。这时，“边纵”各支队和独立团齐力反击敌人的进攻，敌五个军的“围剿”终于被粉碎。

九月中旬，我在昆明处理了工作之后，立即南下，在滇南阳武召开边纵九、十支队和滇中独立团军事会议。这次会议拟定了打通两个根据地的进军计划。会后，以十支队为主力向东南挺进。在胜利进军中，粉碎了地主武装的阻挠，解放了红河、元阳地区。

中央指示，争取以“绥远方式”解决云南问题。早在一九四九年八、九月，“边纵”即派朱家璧、张子斋、郑敦为代表同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代表龙泽汇、宋一痕会面，争取卢汉起义。卢汉支援了游击队轻重机枪、步枪、电台、弹药、银元。“九九事件”后，郑伯克、郑敦（从滇东南来昆明）与陈盛年（昆明市委书记）在昆明碰面，也曾经同卢汉代表宋一痕联系过。十一月，卢汉经李宗仁（当时代总统）批准，宣布无罪释放了“九九事件”被捕人员。十二月八日，昆明市委根据上级指示，派杨青田按照已约定的暗号同卢汉联系，对其起义作了具体安排。十二月九日，卢率部起义。我因工作需要，从滇南游击区回到了昆明。

这时，蒋介石以云南为其“反攻大陆基地”之心仍然未死，令其嫡系部队第八军、二十六军六万人向昆明反扑，并纠集川康残余部队配合反攻。为了打击敌人占领昆明控制云南的企图，“中央军委即令滇桂黔边区纵队结合当地人民，保卫昆明，又令解放贵阳的第五兵团，以其一部迅速入滇驰援。”<sup>①</sup>

遵照中央电示精神，为配合起义部队打击残匪，“边纵”西进支队驰援昆明。昆明市委发动人民，组织了“昆明市人民义勇自卫总队”，由王维彩负责，武装了几千名工农和知识分子，配合起义部队，保卫昆明。

解放大军进抵沾益、曲靖，靠近昆明，游击队配合反攻，昆明人民协同起义部队奋勇抵抗，敌人发现情况不妙，

---

① 陈赓：《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战》，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三日《解放军报》。



立即仓皇撤退南逃。

在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指导下，解放军第四兵团从广西兼程前进，进入云南歼灭残匪。云南游击根据地军民筹集了粮秣给养和慰问品，修桥筑路，沿途设站，迎接亲人解放军。在敌人经过的地方，群众坚壁清野，使敌人找不到粮食和带路人，以迟滞其行动。

一九五〇年一月，区党委及边纵负责同志林李明（区党委书记、边纵政委）、庄田（边纵司令员）、张子斋（边纵政治部主任）等从滇东南经广西，郑伯克（区党委副书记）从昆明经贵州盘县到达安隆，迎接陈赓、宋任穷率领的第四兵团入滇。二月，在安隆，宋任穷主持召开云南省委会议，会上宣布滇桂黔党委结束，“边纵”游击队归省军区领导，分别编入分区部队。会后，朱家璧即率西进支队从滇中南下元江，抢占元江桥头阵地，以配合野战军歼敌；“边纵”游击队六个支队主力配合野战军第四兵团阻击逃敌；地方民兵凭险设滚木擂石袭击敌人。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和各族人民的支援下，野战军在滇西南地区全歼敌第八兵团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两万余人，俘敌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敌军长曹天戈等。残敌仅三千人从金平外逃，六百余人从车佛南外逃。接着，“边纵”七支队配合四兵团进军西康，参加了西昌战役。

汤尧曾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八日委任新平恶霸李润芝为“反共自卫义勇军”总指挥，并派出第八军一七〇师前去与李部汇合，妄图退到哀牢山区建立反共基地。由于游击

队与起义部队的进攻，迫使李部投降，敌一七〇师被迫南逃。我第四兵团十三军三十七师在“边纵”第九支队的配合下，于镇源境内将该师歼灭。至此，敌人妄图建立反共基地的阴谋彻底被粉碎了。

云南解放了。几年来转战在横断山脉崇山峻岭间、经过浴血奋战的“边纵”指战员们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当游击队和解放大军会师时，许多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往事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这篇回忆只是粗略的素材。由于记忆不详，史料不完备，对各地区的叙述难免详略不等，仅供参考。好在当年直接参加这场斗争的战友们大都健在，希望给予批评、指正。

#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大事记

黄 修 荣

## 一 九 一 九 年

五月四日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七月二十五日 苏俄政府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宣言在中国报刊上发表后，受到中国各界群众赞扬。

八月七日 因广州军政府投靠北洋军阀，私下议和，践踏“护法”旗帜，孙中山正式辞去军政府政务总裁职务，愤然宣布：“文决不与之共饰护法之名，同尸误国之罪”<sup>①</sup>。

十月十日 孙中山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废除旧总章，采用新规约，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孙中山任总理，综览党务。

## 一 九 二 〇 年

四月 共产国际同意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威处领导人之一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建议，派魏金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俄共党员）等人来华了解

---

<sup>①</sup> 转引《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页。

中国情况，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五月十六日 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本部发表讲演，指出：“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真中华民国由何发生？就是要以革命党为根本，根本永远存在，才能希望无穷的发展。”<sup>①</sup>

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代表大会详细讨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列宁为大会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为大会所采纳。列宁认为：在十月革命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就变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sup>②</sup>。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也为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八月 马林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九月二十七日 苏俄政府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的宣言》，重申以前对华宣言的原则，建议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和缔结友好条约。

十月二十九日 粤军攻克广州，桂系军阀退出广东。孙中山决定重组军政府。

十月三十一日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致函孙中山，建议苏俄和中国间恢复贸易往来。

十一月二十九日 孙中山重新组织军政府，举行了第一次

---

①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3页）。

②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5页。



政务会议。

十一月 魏金斯基根据陈独秀的建议,在上海会见孙中山,交谈了两个多小时。孙中山询问了苏俄十月革命的情况,并提出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东北某处建立大功率电台,以便联系。

## 一九二一年

四月七日 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四月 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动身来华。

五月五日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六月三日 马林抵达上海,调查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几天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接替魏金斯基工作的尼科尔斯基也到达上海。

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当时,由于对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缺乏了解,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缺乏认识,所以大会主张“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sup>①</sup>。

七月二十九日 张太雷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写信,建议让中国所有无产阶级的及民族革命的组织都选派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表示他特别地注意到了在中国南方的国民党的民族革命者。

八月二十八日 孙中山复信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表

---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示：“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sup>①</sup>

十月 马林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建议国民党选派代表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表示希望与国民党建立联系。国民党邀请马林赴华南访问孙中山。

十二月四日 孙中山到达桂林，在这里建立北伐军大本营。

十二月中旬 苏俄政府派出的裴克斯使团到达北京。

十二月二十三日 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到达桂林。在桂林逗留的九天中，马林曾同孙中山三次长谈“关于苏俄承认他以及与之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问题”。马林建议孙中山：（一）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工大众。（二）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通过这次会见，孙中山在同苏俄的关系上，虽然“只表示愿与苏联建立非官方的联系，不再前进一步”；在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也只是表示“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sup>②</sup>；但孙中山已经开始看到：“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他决心“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sup>③</sup>这次会见增强了共产国际、苏俄与孙中山之间的相互了解。

---

① 孙中山《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3页）。

②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21页）。

③ 孙中山《在广东旅桂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7页）。

## 一九二二年

一月二十一日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由三十九名正式代表和五名非正式代表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这些代表来自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其他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共产党人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等问题。大会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张国焘、邓培和张秋白（国民党代表）。这表达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怀和希望国共两党进行合作的愿望。

二月 应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邀请，青年共产国际派达林来华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二十二日 马林从中国南方到达北京，向苏俄驻华使团团长裴克斯提交两份报告。一是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介绍有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材料，一是建议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派一位代表到中国南方去。

四月初 裴克斯通知达林到北京，向他转达了莫斯科要他同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并了解孙中山内外政策、对苏俄态度和最近计划的指示。

四月六日 陈独秀写信给正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的维经斯基，反对马林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他要求魏金斯基代向共产国际陈述以下理由：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宗旨及所据的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其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政纲，在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看来，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政党；共产党如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

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机会。四、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甚烈，我们如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已无加入之可能。

四月二十三日 马林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

四月二十七日 达林在张太雷等人的陪同下到达广州。

四月二十九日 达林首次见到孙中山。从四月末到六月中旬，他每周至少会见孙中山两次。会谈中，不仅讨论了苏俄同孙中山的关系，也谈到了国共合作问题。当时，孙中山一方面表示愿意联合共产党，另一方面又反对国共两党平行合作。

四月底五月初 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了工作会议，参加的有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谭平山、林伯渠等二十余人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会议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讨论。达林在会上强调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提出在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独立性的条件下整个组织加入国民党。张太雷和瞿秋白也认为：“在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与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和国民党联合以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都是必要的。”<sup>①</sup>与会者多数反对加入国民党，但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

五月一日至五日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一百六十二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国民党、无政府党派和无党派的工会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

---

<sup>①</sup>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1页）。



五月五日至十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的团纲指出：鉴于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应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的压迫。

五月九日 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

六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提议“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它比党“一大”的纲领、决议在理论上和策略上都进了一步。

六月十六日 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企图谋害孙中山。孙中山脱险后，率海军舰队讨伐叛军。

六月三十日 陈独秀在给魏金斯基的信中表示：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

七月十一日 马林在莫斯科完成了《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在报告中，马林阐明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进步作用和国共合作的必要性等问题，汇报了他在中国南方访问时得到的印象。他说：“由于华北华中一带为军阀所统治，只有孙中山国民党所控制的南方可以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民族革命运动和年轻的中国工人运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认为国民党就是“民族革命运动”的力量。马林主张中国共产党不要对国民党采取排斥的态度，应该同国民党人合作，而合作的途径就是“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sup>①</sup>。

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sup>①</sup>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39页。

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分析了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制订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明确指出现阶段的任务是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次大会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而且还提出了实现这个纲领所必须采取的联合战线的政策，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sup>①</sup>，但无产阶级应该在共产党的旗帜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sup>②</sup>。在这个议决案中，还确定了建立联合战线的实施计划和步骤。党的“二大”关于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的决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七月十七日、十八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马林提交了《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对马林报告给予很高评价。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采纳了马林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决定要“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和菲力浦同志（斯内夫利特）紧密联系下进行。”<sup>③</sup>

七月二十六日 苏俄政府正式任命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

七月二十七日 马林与越飞离开莫斯科来中国。

八月十五日 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言，揭露陈炯明叛变经过，重申为共和国奋斗的决心。

---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③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6页。

八月二十三日 李大钊由北京到达上海，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sup>①</sup>。

八月二十五日 马林在上海会见孙中山，介绍了他去莫斯科的情况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孙中山表示他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马林劝孙中山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去收复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宣传运动。

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 根据马林的提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全会，讨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经过两天讨论，多数人表示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接受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会后，李大钊经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率先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接着，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也相继加入。

八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指出：一、根据马林的报告，代表的所有活动必须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为基础。二、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政党，这个政党坚持辛亥革命的使命，并渴望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三、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在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之外，建议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创建民族独立的中华民国以及组织反对中外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主张。四、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地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

---

<sup>①</sup> 李大钊《狱中自述》，（《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六期第7页）。

独立性。由于国民党在南方政府中负实际责任，它暂时需要避免与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冲突。<sup>①</sup>

八月 孙中山委派王京歧赴法国筹建国民党旅欧支部，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协助。

九月四日 孙中山在上海召集改进国民党会议，商讨改组国民党问题。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五十三人出席了会议。他们是：孙洪伊、张秋白、张继、王法勤、朱霁青、李希莲、田铭璋、丁惟汾、王乐平、刘积学、刘荣棠、王用宾、于右任、焦易堂、张宗海、张凤九、杨庶堪、黄复生、赵铁桥、谢持、吕志伊、叶荃、马君武、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黄展云、宋渊源、陈曹楠、陈峰、蒋尊簋、杭辛斋、张人杰、叶楚伦、茅祖权、方潜、邵力子、管鹏、柏文蔚、杨赓生、徐苏中、鼓素民、陈荣广、肖炳章、田桐、蒋作宾、谭延闿、程潜、覃振、周震麟、王伯群、陈独秀、张椿。

九月六日 孙中山指定丁惟汾、茅祖权、覃振、张秋白、吕志伊、田桐、陈独秀、管鹏、陈树人九人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不久，因丁惟汾、田桐、吕志伊、覃振赴北京参加国会，另增补叶楚伦、刘芷芬、孙科、彭素民四人为起草委员。

九月十三日 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创刊。蔡和森在《向导》第一期发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对孙中山过去幻想利用军阀力量，企图从联络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中取得胜利的错误的批评；并诚恳地指出：“国民党过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后的生命还是在革命”。“为使这种革命运动贯彻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

---

<sup>①</sup>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6页。



二的同盟”。

十月 中共党员杨匏安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政权尚握在军阀官僚手里，目前革命第一步，就是打倒封建特权。为增大革命势力起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应联合作战”<sup>①</sup>。

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五日 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中心议题是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会议通过了《东方问题提纲》，指出在殖民地东方，必须提出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陈独秀、刘仁静和王俊代表中共出席了大会。瞿秋白为大会的工作人员。刘仁静就中国形势和国共合作问题在会上发言，他说：“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想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国民党内许多有组织的工人中进行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一边；第二，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力量同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打击帝国主义，我们打算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sup>②</sup>

十一月十五日 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会议，审议中国国民党改进案，经修改后，予以通过。参加会议者共五十人，其中除九月四日的与会者五十三人外，还增加邓泰中、伍朝枢、吕超、徐绍桢、吴公干、林伯渠六人。会议推定胡汉民、汪精卫为中国国民党宣言起草人。

---

① 杨匏安《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珠江评论》第3期，1922年10月出版。）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

十二月十六日 孙中山再次召集会议，审查中国国民党宣言及党纲党章。参加会议者共六十五人，其中除十一月十五日的与会者五十九人外，增加了李烈钧、黄大伟、陈少白、郭泰祺、张乃燕、周然六人。

同月 孙中山致函列宁，表示拟派遣全权代表于近期前往莫斯科，与你和其他同志磋商合作事宜，以俾俄中两国之合法利益。

## 一九二三年

一月一日 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指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sup>①</sup>

一月二日 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及《中国国民党总章》。会上，孙中山发表了《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的演说，指出国民党今后的工作主要是：一、政治进行；二、军事进行；三、党务进行。他认为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也已多年，靠它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孙中山指出：自民国成立以后，党务反不如前，成了一盘散沙，从前革命精神都无形丧失，所以就大遭失败。现在要从党务进行，就是要恢复以前革命党的精神，当以宣传为主。宣传的效力，比军队还大。

一月十日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

一月十一日 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从福建到达上海，与国民党各省支部代表商谈国民党改组事宜。

---

<sup>①</sup> 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1日增刊。

一月十二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决议指出，“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决议强调，“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的旗帜。”<sup>①</sup>

一月十六日 由滇、桂、粤军组成的西路讨贼军进入广州，陈炯明率部逃往惠州。

一月二十一日 孙中山以总理名义任命中国国民党本部各部部长：彭素民为总务部部长，林伯渠为副部长；陈树人为党务部部长，孙镜为副部长；林业明为财务部部长，周佩箴为副部长；叶楚伦为宣传部部长，茅祖权为副部长；张秋白为交际部部长，周颂西为副部长。

一月二十二日 越飞在上海首次会见孙中山。

一月二十三日 孙中山委任居正、孙洪伊、杨庶堪、杭辛斋、覃振、张人杰、于右任、吕志伊、周震麟、廖仲恺、田桐、戴季陶、陈独秀、刘积学、张继、谢持、王用宾、詹大悲、丁

<sup>①</sup>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77页。

惟汾、黄复生、朱之洪等二十一人为参议。

一月二十六日 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宣言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sup>①</sup>这个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公开确立。

一月二十七日 越飞自上海赴日本养病，孙中山派廖仲恺同行，与越飞进一步商谈中国国民党同苏联合作的问题。“彼此在热海同住了一个月。此时东方人未知道的许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详。如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与俄国何以想同中国携手之原因，都已十分了解，所以十二年春间廖同志由东京回广州帮助总理做联俄的工作，当时许多同志怀疑，而廖同志却很勇敢很坚决去干，其中实有缘故的。因为有一个月之久和越飞互相辩论，把各种问题通通研究过了。由此总理与苏俄的关系更日深一日了。”<sup>②</sup>

一月 蔡和森发表文章指出：帝国主义的政治目的是“要把国民党根本推翻”，“所以国民党更应与共产党亲密的联合前进”<sup>③</sup>。

二月一日 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武力镇压。

二月三日 孙中山委任柏文蔚、蒋介石、吕超、黄大伟、蒋作宾、顾忠深、朱霁青、路孝忱、叶荃、吴介璋、朱一鸣、

---

① 《民国日报》1923年1月28日。

② 《汪精卫先生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五期1926年3月出版。

③ 蔡和森《赔偿问题与帝国主义》（上），《向导》第16期1923年1月出版。



熊秉坤、吴忠信十三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本部干事、书记及国内总支部、分部的负责人，也一律重新委任。

二月四日 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

二月七日 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这一事件也深刻教育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要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努力，只有这样，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联合战线。

二月二十一日 孙中山从香港抵广州，并设立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职。

三月一日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正式成立。孙中山委任谭延闿为内政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程潜为军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杨庶堪为秘书长、朱培德为参谋处长、古应芬为法制局长、刘纪文为审计局长、林云陔为金库主任。

四月十日 孙中山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委任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

四月十六日 桂军沈鸿英勾结直系军阀在北江叛变，分兵三路进攻广州。孙中山督率滇、粤、桂诸军予以击退。

四月二十日 蒋介石任大本营参谋长。

五月十三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十三点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扩大与国民党的合作，指出：“在孙中山与北洋军阀内战的问题上，我们支持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应当要求尽快地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问题，应当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指示认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强调指出：“在

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领导权应当归于无产阶级的政党。”<sup>①</sup>由于路上耽搁，中国共产党直到七月十八日，即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大约一个月，才收到这个指示。它虽然对这次大会本身没起到什么作用，但对中国共产党以后的革命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五月十七日 李大钊在日文《北京周刊》上发表《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一文，指出：“现在的国民党还没有什么实力，然而这个团体有容纳我们想法的拥抱力，而且孙文氏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加之我们对它的不适当之处的改良，从而使该党形成更加有力的团体。”

六月十二日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大会中心议题是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大会发表的宣言指出：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议决案指出：“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决议，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决议。”同时指出：共产党员虽然加入国民党，但仍应保持党在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性，“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

<sup>①</sup>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8—80页。

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保持“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sup>①</sup>。

六月二十日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经过热烈讨论，代表大会决定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把国民党改组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六月二十一日 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团到达北京。顾问团成员有波里亚克、格尔曼、捷列沙托夫、斯莫连采夫、切列潘诺夫。

六月 周恩来、尹宽应邀担任国民党旅欧分部筹备员。

八月五日 马林在上海会见蒋介石、张继、汪精卫、林业明等，商讨蒋介石奉孙中山派遣去苏联考察的有关事宜。随后，在马林等建议下组成了包括蒋介石、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在内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八月十六日 在马林协助下，蒋介石率代表团由上海启程赴苏，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洽谈苏联援助问题。

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八月 周恩来致信即将回国述职的王京歧，表示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在欧洲开展工作：1. 宣传当时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及其行动方针；2. 吸收留欧华人中的革命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60页。

分子加入国民党；3. 努力为国民党做组织训练方面的工作。

九月二日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苏联政府代表加拉罕抵达北京。

九月三日 苏联政府发表第三次对华宣言，重申以前对华宣言的原则。

九月五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会见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九月七日 苏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鲁祖塔克受苏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委托，接见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接见时，鲁祖塔克详细介绍了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以及他们发展工业和组织红军的措施。

九月九日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受到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梁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的接见。

九月十六日 孙中山致电加拉罕：“我们两国的真正利益要求制定一个共同的政策，这一政策可以使我们生活在和其他大国平等的条件下，并可以使我们摆脱凭借强力和以经济上的帝国主义方法而行动的国际体系所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政治与经济的奴役。”<sup>①</sup>

九月二十三日 加拉罕为鲍罗廷去见孙中山写了介绍信，信中说：鲍罗廷为我党元老同志之一，曾长期致力于俄国革命运动，他对整个情况都很熟悉，在他去南方前，我们曾进行过一番长谈，他会将我的想法、希望与感触转达给你。

九月 苏联政府委派鲍罗廷为驻广州常设代表。同月，马林完成使命回莫斯科。九月末，鲍罗廷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和其他中共负责人。

---

① 《与孙中山交换的外交信件》（《史学译丛》，1958年第三期第132页）。



十月八日 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召开会议，决定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通告各国使馆，对伪总统不予承认。

十月九日 孙中山举行欢迎鲍罗廷的招待会。

十月九日、十一日 鲍罗廷在广州与共产党员瞿秋白、谭平山、阮啸仙等人谈话，研究改组国民党计划。

同日 孙中山致电上海国民党本部，令各部即行裁员，准备改组，废除正、副部长，各部设主任一人，干事书记各二人，原设于上海的总理全权代表及总理办公处，亦一并裁撤。

同日 孙中山在国民党广东支部党务讨论会上发表演说，总结过去失败的原因，强调今后应“以党治国”，“效法俄人”。

十月十五日 国民党党务讨论会研究了建立军官学校的问题，通过了“建立陆军讲武堂于广州”的提案。

十月十八日 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十月十九日 孙中山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办理国民党本部的改组事宜。同时，孙中山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令其密电北京李大钊赴沪会商国民党改组问题。

十月二十四日 孙中山委派廖仲恺、邓泽如召集特别会议，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他要求这次会议对国民党改组一事“详为审议，悉心擘画，务期党基巩固，党务活动，以达吾人之宗旨目的。”

十月二十五日 中国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讨论改组的必要性和计划，参加者约一百余人。会上，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九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为候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中国国民党全面改组的筹备工作。同时，孙中山正式聘请鲍罗廷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

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并请他起草中国国民党的章程。

十月二十八日 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着手办理国民党的改组事宜：起草宣言、党纲、党章草案；办理各地分部登记，建立广州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并着手在广州进行党员登记；调查工农群众状况；统一宣传机关，出版《中国国民党周刊》；设立讲习所，训练各区分部执行委员等。同时，还决定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省代表名额为六人（孙中山指派三人，各省党员推举三人），海外总支部、支部的代表十二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自成立至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九日，共开会二十八次，议决要案四百多件，做了大量的工作。

十一月初，魏金斯基再度来华，接替马林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十一月十日 孙中山听取廖仲恺关于改组工作的汇报后指出，国民党“不进”的原因，“约有二事：组织之未备也，训练之未固也”。因此，他主张改善国民党的组织，使党员活动从过去的“由上而下”变为“由下而上”，并“从基础着手”，加强训练。

十一月十一日 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召开党员大会，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

同日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一行和孙中山派驻英国的非正式代表邵元冲再次会见了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斯克梁斯基详尽介绍了政治工作对于苏联红军克敌致胜所起的作用，介绍了苏联共产党依靠人民、领导人民的经验。

十一月十二日 孙中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在陈炯明占领石龙、政府军向广州退却的情况下国民党的对策。鲍罗廷在会上强调有目的的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并提议要通过决议动员全体国民党员保卫城市。鲍罗廷认为，前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国民党在农民中的工作薄弱，因而农民的态度消极，有的甚至去帮助敌人。

同日 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指出“中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国民党“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sup>①</sup>

十一月十九日 陈炯明部队分四路猛攻广州。孙中山指挥各军抵御，将敌军击败。

十一月二十二日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成立秘书处，中共党员谭平山被推举为秘书处秘书。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三届一次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罗章龙、王荷波、项英等八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并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同志们一并加入；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

十一月二十五日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应邀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状况与国民党内部情况的报告，表示希望共产国际派负责同志前来中国，研究

---

① 楚伦《介绍〈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2月7日。

中国的情况，帮助中国革命。

同日 孙中山在大本营对国民党员发表演说，指出国民党改组“就是希望吾党造成一中心势力”。他说：革命成功的最可靠因素是“革命精神”和“人民心力”，只有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sup>①</sup>。

同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作了切中要害的批评。会上，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会后，周恩来被委任为国民党巴黎通信处筹备员。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人积极参加筹建国民党巴黎通信处。

十一月二十六日 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

十一月二十八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目前正处于组织形成和集中力量的阶段，国民党必须同劳动群众建立密切联系，以巩固和扩大革命运动的基础，并把民族解放运动建立在人民群众支持的基础上。决议对三民主义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求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国民党，因为它所进行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斗争，将有助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成长和壮大，因为它将在使用土地和管理国家方面，把农民从封建专制的条件下解放出来。这个决议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解释，对孙中山由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起了推动作用。

十一月二十九日 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赴上海，与国民党

---

<sup>①</sup> 孙中山《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4、546页）。



各省支部负责人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

同日 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一人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国民党改组，说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俄人鲍罗廷之指挥”，“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并攻击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孙中山于十二月三日在信上批示：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纲党章等草案，“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参与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并且指出：“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常助反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sup>①</sup>

同日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启程回国。

十二月九日 孙中山在大本营对国民党员发表演说，指出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他认为俄之经验，殊可为我党师法。

同日 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在上海举行第十次会议，讨论有关改组问题。会上，廖仲恺报告了国民党改组的原因和措施，并成立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

十二月十五日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回到上海。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第二十四号通告，指出：国民党的改组符合全国革命者的要求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希望。因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努力同国民党合作，帮助国民党改组。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指出：有国民党组织的地

---

<sup>①</sup>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上海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301—308页。

方，中国共产党员立即全体加入，并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委员会联合组成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区，将可以加入国民党的人数及可以负责者报告中央局，以便请国民党派人前往成立分部。

十二月三十日 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员发表《宣传造成群力》的演说，指出：这次国民党改组，变更奋斗的方法，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他希望大家从今以后，要“注重宣传的奋斗，不要单注重兵力的奋斗。”

同日 孙中山电催蒋介石来粤，报告赴苏考察情况，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

十二月 李大钊到达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一九二四年

一月四日 孙中山在大本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建国政府、出师北伐、统一财政，并为重组建国政府通告全国人民。

一月初 中共中央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鲍罗廷、瞿秋白、陈独秀等出席了会议。会上，鲍罗廷介绍了自己作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工作情况，他说：“现在的任务是要使民族革命运动真正地依靠人民群众。国民党的改组正在朝着这个方面进行。”“这项工作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拟定的、得到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赞同的、经过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讨论的计划进行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按照共产国际关于支持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建立起来的。”<sup>①</sup>

<sup>①</sup>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一月上旬 鲍罗廷由上海回到广州。

十月十四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开会，主要讨论宣言草案中有关“民族主义”的内容。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鲍罗廷和瞿秋白参加了会。鲍罗廷认为，如果民族主义不包含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内容，那末就难以动员群众。廖仲恺认为，民族主义应表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外国资本家。

一月十五日 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鲍罗廷、瞿秋白继续讨论修改国民党“一大”宣言草案。他们主要讨论了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工人和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问题等。鲍罗廷认为，宣言草案在谈到工人、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问题时，应讲清以下三点：1、我们承认工人和农民的革命力量；2、我们支持工人和农民的组织；3、国民党希望得到工人和农民组织的支持。

一月十七日 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召开成立大会，周恩来以通讯处筹备员的身份报告了筹备经过，聂荣臻当选为通讯处长<sup>①</sup>。

一月十九日 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决定大会会址和大会议事日程，推定说明人。会上，廖仲恺发言，指出国民党的改组要点在于修改党纲，制订党章。

一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一百七十三人出席了开幕式。大会代表中，有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沈定一、谢晋、林伯渠、毛

---

<sup>①</sup> 根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章程》第18条规定：“国外党部组织，总支部等于省，支部等于县，分部等于区，通讯处等于区分部。”国民党巴黎通讯处也就是国民党巴黎区分部。

泽东、李维汉、夏曦、袁达时、张国焘、胡公冕、宣中华、廖乾五、朱季恂、韩麟符、于方舟、王烬美、刘伯垂、李立三、陈镜湖、李永声等共产党员二十三人。孙中山担任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他说：从今天起，要把以前的革命精神恢复起来，把国民党改组。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政纲）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随后通过了三项议案：第一，确定大会主席团由孙中山指定的胡汉民、汪精卫、林森、李大钊和谢持五人组成。第二，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会议规则》。第三，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秘书处组织规则》。

下午，孙中山作了题为《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报告。大会秘书长刘芷芬宣读了《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并由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戴季陶、恩克巴图、叶楚伦、黄季陆、王恒、茅祖权、于树德、李大钊组成宣言审查委员会，对大会宣言进行详细审查、修改和作必要的补充。大会还讨论通过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讨论时，孙中山强调指出此次大会之目的有二：一、改组本党，二、建设国家。

在二十一日会上，谭平山代表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关于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活动情况的报告，并由大会主席林森指定谭平山、廖仲恺、谢持、孙科、张秋白、王法勤、彭素民、邓泽如、刘芦稳九人组成党务审查委员会。戴季陶、胡汉民代表宣言审查委员会作了关于大会宣言审查情况的报告。孙中山作了关于民生主义问题的说明，认为“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此外，大会还听取了浙江代表沈定一、天津代表韩麟符所作的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工作报告。



在二十二日会上，《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提交大会审查。大会授权林森指定谢持、何世桢、谭平山、丁惟汾、廖仲恺、茅祖权、孙科、朱霁清、李大钊、肖佛成、汪精卫、张知本、戴季陶、居正、于右任、毛泽东、石英、邓泽如、谢英伯十九人为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大会听取了华侨代表陈觉梦等的国民党海外工作报告，柏文蔚的军事报告，通过了《纪律问题决议案》和《海关问题决议案》。

在二十三日会上，听取了叶楚傖关于《出版及宣传问题》的说明，成立了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由孙中山指派戴季陶、胡汉民、叶楚傖、李大钊、冯自由、黄泳台、黄右公、刘成禺、白云梯九人组成。再次听取了胡汉民、戴季陶关于宣言草案审查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之现状》，指出中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内反动军阀和“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与其主子共同压榨中国人民。宣言分析了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和商人政府派的主张，认为只有实行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第二部分为《国民党之主义》，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采纳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不仅是国民党改组的基本方针，也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第三部分为《国民党之政纲》，阐述了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和主张。随后，孙中山作了《对于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指出今后对内要打倒军阀，“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决不能又蹈从前之覆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以后应当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

在二十四日会上，宣读了苏联驻北京代表加拉罕的贺电和决定大会主席团起草复电。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大会宣言加上“厘定各种考试制度”条文。汪精卫作了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的审查报告。黄馥生作了海外工作情况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刘伯伦提出的《制定党歌案》，并决定将韩麟符提出的《北方军阀所辖各省区之党务进行，应否许党员对于本党章程有伸缩案》交章程审查委员会参考。

同日 孙中山下令筹办陆军军官学校，并以大元帅名义指派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以黄埔旧有的广东陆军学校与广东海军学校为校舍。

在二十五日会上，通过了《出版及宣传问题案》。这时，孙中山得知列宁逝世消息，立即向大会报告，并发表了演说，指出：“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所未有”。他称赞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之最好模范。”“列宁先生之思想魄力，奋斗精神，一生功力，全结晶在党中。他的身体虽不在，他的精神却仍在。”“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为悼念列宁逝世，大会决定：电唁苏联致哀；休会三日，以志哀悼；广泛宣传列宁的生平、事业，广州各机关下半旗三天。鲍罗廷向大会致词，对大会哀悼列宁逝世表示感谢。

在二十八日会上，汪精卫作了《中国国民党章程案》的审查报告。讨论中，方瑞麟等少数代表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大会主席团成员、中共党员李大钊发言指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

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吾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sup>①</sup>李大钊的发言，受到大会欢迎，挫败了少数代表的刁难与阻挠。接着廖仲恺发言指出：“吾人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如对于我们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且加入本党的人，我们只认他个人的加入，不认他团体的加入；只要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思，其意何居？彼等也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革命工夫的。请大家思之，重思之！”<sup>②</sup>这时，毛泽东要求此案停止争论，“请付表决”。胡汉民即以“党员不得加他党，不必用明文规定于章程，惟申明纪律可也”付之表决<sup>③</sup>，获得通过。

在二十九日会上，通过了《党务审查委员会报告》，讨论了《本党设立研究会案》、《请采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案》、《感化游民土匪及殊遇革命军人案》等。讨论要不要在国民党中央设立研究会或研究部时，毛泽东表示反对，说：“因本案根本意思，把实行与研究分开，但本党为革命党，不能如此。本席

---

①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

②③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十四号，广州1924年印本，第41页。

意思，本案精神，可以成立，条文则不能成立。”<sup>①</sup>夏曦也发表类似意见。讨论要不要实行比例选举制时，毛泽东表示反对，指出：“现在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sup>②</sup>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会的重视与称赞。

在三十日会上，廖仲恺对国民党“一大”宣言对外政策部分提出三点补充意见：“一、租界制度于二十世纪之今日，尚任其存在于中国，实为中国人民族之耻辱，应由中国收回管理。二、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内，应服从中华民国之法律。三、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sup>③</sup>孙中山听后表示：“本案加入政纲中，本总理非常赞成。”大会通过了廖仲恺的提案。大会选举了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决定在保留孙中山为“总理”的前提下实行委员制。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和代表的推举，选出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傖、于树德二十四人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伯渠、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傅汝霖、于方舟、张苇村、瞿秋白、张秋白、韩麟符、张国焘十七人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其中李大

---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十四号，广州1924年印本，第77页。

② 同上，第81页。

③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十六号，广州1924年印本第95页。





2 023 2972 9

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林伯渠、韩麟符、沈定一、于方舟为中共党员，共产党员约占总数四分之一。大会还选举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下午大会闭幕，孙中山致闭幕词。

国民党“一大”闭幕第二天，即一月三十日，孙中山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于二月六日结束。会上推选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各部，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戴季陶任宣传部长，邹鲁任青年部长，廖仲恺任工人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长，曾醒任妇女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上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参加国民党的原则，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改组了国民党。这样，这次大会就成为首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的标志，成为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兴起和发展的起点。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也是孙中山的伟大历史功绩。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